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日本留蘇學生座談蘇聯
現代修正主義的實況

(增譯本)

新谷明生・足立成男 著
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

余以謙 譯

香港三聯書店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增譯本)

*

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香港威靈頓街二十八號

大千印刷公司印刷

香港英皇道六五七號五樓

*

1970年10月版・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日本留蘇學生座談蘇聯

現代修正主義的實況

(增譯本)

新谷明雄・尾崎成男 著
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

余以羅 譯

香港三聯書店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毛澤東

各國的人民，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

毛澤東



在以帕特里斯·盧蒙巴命名的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大門前。

參觀克里姆林宮，在列寧的辦公室。





六五年春，在莫斯科國民經濟博覽會進行農業經濟的實習。

六五年夏，在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的集體農莊和農民舉行聯歡會。





一九六六年三月舉行的“日本晚會”，各國留學生和蘇聯人參觀介紹日本人民鬥爭的展覽。

在“日本晚會”上和越南學生聯歡的情景，交換北越的國旗和日本的刺綉。





非洲留學生身穿民族服裝參加“五一”節游行。

拉丁美洲的留學生。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使館前面抗議美帝國主義轟炸北越。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學習的中國留學生一齊撤回祖國。中國學生在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的站台上，揮動《毛主席語錄》，歌唱《東方紅》。





一九六六年二月，各國留學生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反對轟炸北越，在美國大使館的圍牆上貼了表示抗議的標語；蘇聯軍隊把各國留學生包圍起來，注視着他們，使他們不能接近美國大使館。

舉行抗議轟炸北越的示威游行時着火燒起來的轎車。





一九六六年三月，蘇聯軍隊鎮壓參加抗議蘇炸北越的示威游行的各國留學生，目的是要保護美國大使館。

爲了鎮壓抗議蘇炸北越的示威游行，被動員來的騎警隊戒備森嚴



從莫斯科坐公共汽車走三小時左右，那裏有一座名叫扎戈爾斯克的城市，這座城市是俄羅斯正教的老巢，隨時都可以聽到莊嚴的禱告聲。農婦恭恭敬敬地吻神父的手。



在黑海之濱的“休養之家”，批判斯大林以後，原來塑在列寧的銅像右邊的斯大林的銅像被拆掉了。攝於一九六三年夏。

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中心廣場（瓦茨拉夫廣場）。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侵略的時候，捷克人民在這裏舉行集會，遭到血腥的屠殺。



再版說明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書為日本留蘇學生新谷明生、佐久間邦夫、足立成男、原田幸夫等合著，首先在日本山口縣《長周新聞》登載。一九六九年三月由東京大安書店出版。後經余以謙譯成中文，題為《留蘇聞見錄》，於六月間開始在香港《大公報》連載。為徇讀者要求，本店於十二月中旬譯校出版。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書譯校出版後，頗受讀者歡迎。此次再版時，又根據原著作了校訂，增補了部份內容，加印了原著的圖片，以饗讀者。

香港三聯書店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

前 言

最近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真正是一個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過程，接踵發生了按歷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常識判斷所無法想像的事件。我們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在莫斯科留學期間，遇到了這種大動蕩的風暴。在這期間發生的最重大事件有：由加勒比海危機直接引起的中蘇公開論戰，締結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和隨之而來的日蘇兩國共產黨之間的公開爭論，赫魯曉夫下台，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而對這些事件，當時在莫斯科的日本留學生採取什麼態度呢？蘇聯學生和蘇聯人有些什麼反應呢？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留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國的學生是怎樣對待這一連串重大事件的呢？我們在這個座談會上只是把我們的體驗如實地說出來。

今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的大動蕩，牽涉到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所有共產主義者，要求他們作出抉擇：是向左呢，還是向右？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截然分成革命的和機會主義的兩個壁壘。毛澤東思想代表了革命的、左派的、布爾什維克的潮流；而赫魯

曉夫修正主義正代表了機會主義的、右派的、孟什維克的潮流。這一事實擺在世界億萬人民面前，已經愈來愈明顯了。

爲了判斷什麼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科學的共產主義，有必要研究論戰雙方的理論及其實踐。在理論上，無論如何都必須回到馬克思、列寧的經典上來，看一看是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是誰以“形勢的變化”爲藉口，抽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靈魂，篡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要用這個觀點一檢查，就不能不承認今天日本共產黨宮本領導集團的路綫，是不折不扣的現代修正主義路綫。在此以前，有誰會料到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蘇聯，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會被現代修正主義者所篡奪，而開始復辟資本主義呢？然而現實就是現實。

對於現代修正主義如此猖獗跋扈的情況，我們不能只是發出慨嘆。我們必須勇敢地起來同國內外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摧毀它，使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獲得勝利，在日本也實現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這個有關蘇聯實況的簡單的報告，如果能對激烈進行着的反帝反修鬥爭起一些作用的話，那就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這個座談會的一部份內容，經過歸納，曾經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的《長周新聞》上

刊登。後來，大安書店問起可否出版座談會的全文，於是確定對原文作一些加工，交付出版。在本書出版的時
候，謹對大安書店、長周新聞社及其他各位有關人士所
給予的巨大幫助和關照，深表謝意。

作者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 錄

前 言

一、我們為什麼留學蘇聯…………… (1)

各國人民友誼大學創建的情況 各國人民友誼
大學的學生生活 留學的經過 抱什麼目的
留學 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國際性 對蘇聯
人民的感謝

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現實…………… (14)

蘇聯青年的精神面貌 對政治漠不關心 毫
無意義的紀念大會 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有興
趣 不良少年的出現——“游蕩兒” “有洋
房，有汽車，沒有老人” 修正主義從思想和文
化的變化開始，西方廣播可以自由收聽，却不准聽
北京廣播 “托瓦利什”(同志)這個稱呼正
在消失 自卑感與優越感 “紅場”上的妓女
一看電影就明白社會真相 野營中的荒唐
事 剝開皮來看 正經人被認為是笨蛋，貪
污腐蝕着整個社會 官僚主義壓制創造性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節前夕 黨和人民的
關係 入黨是穩定社會地位的保證 只要人
民服從的黨的領導 忘掉了“為人民服務”和
“羣衆路線”的觀點 新特權階層的形成和黨的

變質——喪失了黨的領導作用——屈服於“和平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失去了對黨的信任
俄語中沒有“羣衆路線”這個詞——黨員的條件——不論思想好壞，“有能力的人”就行——能動地獨立思考的重要性——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人民民主——不進行自我批評，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組織羣衆討論——否認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學校當局對日本的想法——反對日本駐蘇大使來校事件
蘇聯的政治笑話

三、蘇聯的對外政策——援助越南和敵視中國…（57）

到美國大使館前舉行抗議示威的隊伍遭到大鎮壓——蘇聯當局對越南留學生施加壓力——蘇聯認為美帝國主義比越南人民更重要——宮本集團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辯護——事實說明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蘇伊士運河事件上蘇聯提供的政治援助和對越南的援助的差別——蘇聯當局竟審查越南拍攝的新聞紀錄影片——逼人說“感謝蘇聯援助”——日本留學生明白了聯合行動的虛偽性——把印尼留學生引渡給蘇哈托反動政府——拋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蘇聯——在以色列侵略問題上出賣阿拉伯人民——蘇聯不顧道拉了美洲的武裝鬥爭——連經濟地理教科書也把蘇聯“援助”寫進去——蘇聯“援助”印度的成就——以“恩人”自居激怒了非洲學生——古巴事件時的“援助”——已有固定內容的蘇聯式“支援各國人民集會”——爲了滿足私欲，蘇聯學生希望被派到國外去——蘇聯和中國對非洲援助的不同——在

國外過着貴族生活的蘇聯技術人員們——中蘇兩國對革命學生的態度的不同——九·三〇事件後印尼留學生的分裂——蘇聯人民怎樣看中國——徹底的反革宣傳——連“紙老虎”和“東風壓倒西風”也不懂——日本留學生被誤認為是中國人而吃了苦頭——當中蘇論戰剛開始的時候——對暗殺肯尼迪事件的反應——宮本顯治也是一丘之貉——也有了解中國的人——感情用事地敵視中國

四、赫魯曉夫下台及對這一事件的反應…………… (105)

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委——“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及中蘇兩黨和日蘇兩黨的關係——報道赫魯曉夫下台的前後——失魂落魄的蘇聯學生——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同赫魯曉夫毫無二致——由赫魯曉夫下台引起的校內動蕩——完全投降了的宮本集團——一九六四年的“五一節事件”——睜着眼睛撒謊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學校當局對學生施加壓力——蘇聯與中國在對待人民羣衆態度問題上的分歧——思想鬥爭和修正主義——報紙是兩黨關係的晴雨表——按政治風向招收外國學生——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日本留學生——“蘇聯派”各國留學生增加——志賀一伙的末路——宮本一伙的轉變方向——“學生不得對抗黨中央！”——被外國學生拋棄的宮本修正主義的路綫——同現代修正主義決裂——“修太郎”壓制批評——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人民的團結大會——蘇聯的政治笑話

五、毛澤東思想和各國留學生的動向…………… (154)

毛澤東思想給各國學生的影響 驅逐非洲留學生事件 我們同各國留學生們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和“修太郎”的孤立 各國留學生對“日本暗會”的援助 同中國學生的友誼 宮本一伙的“獨立自主”路線 學習毛澤東思想 從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發展到同自己的修正主義作鬥爭 蘇修和日修的反華大合唱 世界性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破“私”立“公” 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六、斯大林問題和現代修正主義…………… (181)

以實用主義改變對斯大林的評價 戰爭與和平問題 德國問題對蘇聯所具有的意義 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和現代的根本區別 “蘇維埃選舉”和先鋒黨的變質 斯大林沒有培養革命接班人 斯大林的缺點和毛澤東的觀察路線 從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到勃列日涅夫的“法西斯黨” 宮本一伙的“組織原則” 蘇聯軍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根本區別 東歐的政治笑話

七、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217)

社會主義各種制度的變質和消滅 “共產之家”的實況 人口集中大城市和房荒 “物質關心”和“物質刺激” 作學問也搞“物質關心”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 資本主

義的“集體農莊市場” 什麼人掌握着生產資料
騙人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 人
的因素的重要性和蘇聯對它的輕視 修正主義
毀滅了社會主義

八、東歐各國的印象和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241)

保加利亞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東德
南斯拉夫 羅馬尼亞 蘇聯國內的民族
問題 同反社會主義聯結在一起的反蘇情緒
西方的思想、文化乘機而入 沒有權威的東歐
各國共產黨 比蘇聯早一步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的東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和東歐各國的
關係 蘇聯實力政策的失敗 倒向西方的東
歐各國——旨在賺取美元的遊覽事業 來自西
方的經濟侵略——引進外資 南斯拉夫是修正
主義的老前輩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青年、
學生的示威游行 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
“獨立自主”路線 從諾沃提尼到杜布切克——
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的發展和蘇聯等五國軍隊
的侵略 西德的威脅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
作為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與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阿爾巴尼亞人民 真正
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定會起來反對修正主義

一、我們爲什麼留學蘇聯

新谷：首先，我們想從我們曾經度過了五年留學生活的莫斯科各國人民友誼大學是什麼樣的大學等話題談起。談談我們當初抱着什麼樣的目的、通過什麼途徑進入這所大學的？我們在赴莫斯科之前，對從未見過的社會主義國家抱着什麼樣的印象？我們對蘇聯原來抱着怎樣的希望和期待？以及度過了什麼樣的大學生活？

各國人民友誼大學創建的情況

原田：我們上的這所大學，正式名稱是“帕特里斯·盧蒙巴各國人民友誼大學”。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開辦。帕特里斯·盧蒙巴是剛果前總理，是民族解放鬥爭中卓越的戰士。一九六一年爲比利時和美帝國主義者所殺害。

這所大學是赫魯曉夫在任時，作爲他的“和平共處”、“裁減軍備以援助不發達國家”政策的一環而開辦的。意思是說，只要裁軍，就能做出這種好事。蘇聯作出了這樣的例子，利用裁軍節約下來的開支創辦了這所大學。

所以，剛創建時，就原封不動地利用了原來的陸軍大學的校舍。現在正在莫斯科郊外建築校舍、宿舍、醫院、體育館。將來，在這裏要建成一座大學城。當初宣佈創建這所大學的時候，真成了世界青年男女嚮往的所在，那時，據說有世界八十多個國家的四萬多人報名，以印尼學生為最多，一度接近五百人。現在有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國的青年，加上蘇聯的青年，共約有三千學生。沒有錄取除古巴以外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學生。古巴也從一九六四年起，沒有再向這所大學選派學生。社會主義國家的學生，似乎是根據政府間的協定，在我們這所大學之外的另一些大學就學。

足立：本來，這所大學是在赫魯曉夫的倡議下建立起來的，他一下台，學校當局就很擔心這所大學是否會撤消，結果沒有撤消。但是，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後，蘇聯方面好像對這所大學很快地就失掉了熱情，當初蘇聯學生只佔全體學生的一成到兩成，後來却逐漸增多，外國學生佔的比例不斷減少。日本學生每年平均有十五人入學，現在總共不過七十多人。

我們這所大學，一九六五年六月送走了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典禮是在克里姆林宮裏舉行的，不過，印象很深的是，出席致詞的不是赫魯曉夫，而是柯西金總理了。

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學生生活

佐久間：這所大學是像日本也有的那種擁有各類院系的綜合性大學，學生全部住校。一般的院系，入學後首先要讀一年的俄文預科，本科學習期限為四年，整個學習期是五年，僅醫學系是七年。

原田：蘇聯方面負擔入學時赴莫斯科的旅費和畢業時回國的旅費。五年中間，每月發給九十盧布的獎學金。當然是不需要還的。由於莫斯科的冬季每天都是零下十幾度到二十幾度的氣溫，所以在入學以後還發給三百盧布的大衣、鞋帽費。因為學費、宿費、醫療費全是免費，所以，像我們這些日本學生，獎學金的大部份都用在吃飯上面了。吃飯一般需要六十盧布，剩下的三十盧布買書籍和日用品，或者用作暑假旅行的費用。

足立：日元和盧布的官定比價是一盧布兌四百日元，大致計算起來，實際上是一盧布兌二百日元左右，這大體上是不錯的。在我來說，只要不浪費，生活是蠻可以的。

新谷：稍微說一下我們讀的經濟系，從預科到本科畢業共五年，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從早晨九點到下午三點上整整六小時的課。當然，講課都用俄文。到了高年級，為了寫學年論文，除了星期日以外每星期還有一

天休息。檢查上課或缺課是很嚴的，所以是不可能缺課的。不准學生自己選修課程，有關經濟學的一切學科都作為必修課來學。這是和日本的大學很不相同的。

原田：蘇聯是從九月一日開始新的學年，六月底結束這一學年。一學年分為兩個學期，一月和六月有兩次考試。在一月的考試以後有兩個星期的寒假，在六月的考試以後，七月和八月是暑假。假期內，或者是到莫斯科以外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到學校的“休養之家”去。這樣可以詳細地參觀了解蘇聯的國內情況，直接同蘇聯人民接觸。在暑假期間，到歐洲去旅行的，或者是回日本的人也很多。

佐久間：當然，我們在五年中間，都是用俄語，不但聽蘇聯人的課，有時因實習也到各種各樣的企業去，這不像接待外國代表團那樣，沒有譯員，是一個人自己去，所以不單單是表面上的“參觀”，還可以接觸社會的實際。暑假到蘇聯國內旅行時，雖然也必須照外國人一樣辦手續，但是也可以到那些短期參觀旅行者所不能到的地方，而且，可以同任何人談話。所以能從不同於一般旅行者的角度來看蘇聯。

足立：各國學生都分別組織了學生會 ЗЕМЛЯЧЕСТВО，用日本話來說，就是“某某國同鄉會”。日本 ЗЕМЛЯЧЕСТВО（日本人學生會）的全體學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態度並不都是一致的，但在作為日本民主力量

的一員而行動這一點上，是思想統一的。我們的學生會，從新生的歡迎直到畢業生的歡送，自始至終都是整個留學生活中相互幫助的組織。日本留學生在它的組織下，積極地開展了示威游行、增進國際團結的活動。日本人學生會，還在提高日本留學生的政治思想和促進國際團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留學生活成為非常有意義的事。

留學的經過

新谷：如果想上這所大學，只要有蘇聯方面認為是有影響的政黨、民主團體、工會或個人的推薦就行了。我是通過日蘇協會的推薦而入學的。當時，日蘇協會公開招募希望得到推薦的人，經過考試，我合格了。

足立：我也是同樣。

佐久間：因為我當過國營鐵路工會總部的書記，就要求工會推薦我，我是一九六三年去的，去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回國。後來就同其他各位一樣，通過日蘇協會作了留學的準備。

原田：我在高中讀書時積極參加了“反對評定職務鬥爭”和“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高中畢業後在日蘇協會高知縣聯合會工作了三年。由於年輕，充滿了正義感和火一般的熱情，幹得非常起勁。在這三年裏，我模模

糊糊地對日蘇友好運動、民主運動有了一些認識。我覺得爲了使運動發展得更有意義，仍然需要讀書。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將來一定會有局限性，所以要認真考慮一下上大學的問題。我也考慮到了上這個各國人民友誼大學。很幸運，當時的高知縣日蘇協會領導人對我那三年中的工作評價很好，全力幫助我，實現了我留蘇的願望。因此，在留學期間，我爲了報答這些領導人的期望，腦子裏總是在想，我是高知縣民主力量的代表，非好好學習不可。

可是我現在却成爲一個毛澤東思想的熱烈擁護者回國了。回國後有些從前的朋友問我：“如果去中國成爲中國派還說得通，像你這樣過去搞日蘇友好運動的親蘇派，去蘇聯之後竟變成中國派回來，究竟是什麼道理？”

足立：這一點好像是誰也感到奇怪，不容易理解的。在我們看來，這是明明白白的，因爲五年來，我們在蘇聯每天每天都看到十月革命的祖國不斷在變質、腐敗、墮落；而現在，要說共產主義，除了按毛澤東思想去做以外，沒有別的道路。關於這一點，我們還要把今天蘇聯的現實告訴那些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抱有幻想的人們，宣傳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這也是我們的重大任務。

抱什麼目的留學

佐久間：我對十月革命的祖國蘇聯，過去是很嚮往的，也曾經是參加日蘇友好運動的一個小小的活動家。在日本的時候，我無論怎樣設想，都無法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實感。例如：沒有資本家、沒有剝削的好社會，具體地說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呢？無論怎樣也是想像不出來的，只不過是有些抽象的概念而已。到底在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人，想些什麼？喜歡些什麼？日常生活中有些什麼看法？我對這些都是很感興趣的。

存在決定意識，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關係變了，當然人的意識也要變。我非常想看看，在受共產黨的領導、理應一直進行思想教育的蘇聯，特別是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在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裏成長起來的青年，究竟有什麼不同？也就是說，儘管還沒有完全變為共產主義的人，但已接近於這樣的新人的形象，在蘇聯的青年中是怎樣形成的呢？所有這些，我都很想親眼看一看，親身體會體會。我自己也很想在這樣的社會裏得到改造。

我留蘇的另一個理由是，以前稍微學了一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但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經濟理論却一竅不通。如果我能直接生活在社會主義社

會，就想專攻社會主義經濟。我是想學習很具體的計劃經濟是由誰、在什麼地方、怎樣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就進了經濟系。

但是，我想到，比什麼都更為重要的是，在列寧的國家，一定要通過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方面，把革命思想好好地學到手。所以，從一開始我就根本沒有考慮過要從蘇聯學些什麼知識回來好做工作。

足立：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到蘇聯留學，一九六七年回國。一九六二年正是《莫斯科聲明》發表之後的兩年。正如聲明中所說“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是反帝民主力量壓倒帝國主義的時期。加加林成功地進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宇宙飛行也是在這個時候，正是蘇聯的發展狀況引起全世界的人們注意的時候。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一個國家接着一個國家取得了獨立。在這樣的時代，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和期待到社會主義蘇聯學習。那時，我感到我的責任和使命重大，我考慮到我是從日本的鬥爭着的很多希望學習的人們中挑選出來的，因而在回國以後也就必須為這些人而努力工作。

那時候我充滿了幻想，我想，我將和代表全世界戰鬥的人民匯集到一起的青年們共同學習，我能夠和他們結成知己。

但是，蘇聯的現實，每天都叫我失望，進而使我憤

怒。倒是從最近幾年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中，正像印度尼西亞的艾地說過的那樣，在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學校”中，我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毛澤東思想。

原田：我留學蘇聯，原先抱有四個目的：第一，我想正確地了解世界上第一個使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成功的蘇聯，向它學習。第二，通過專攻經濟學，學習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第三，希望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下的新社會的蘇聯男女青年共同生活，學習他們的為人；第四，希望和那些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青年加深交流，使自己具有正確的國際感。我抱着這四大目標，滿懷希望，同時也意識到任務的重大，離開橫濱前往蘇聯。

剛巧，我在一九六三年到蘇聯時，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了。這時，中蘇兩黨開始公開論戰。我這個被稱為日蘇協會高知縣聯合會的青年活動家，當時感情上是親蘇的，和我一起去的留學生，我想也是親蘇的。

關於共產主義運動這一場國際大論戰，我在日本時每天收聽北京和莫斯科的廣播，試圖盡可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判斷：誰是正確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分歧？當時我滿心希望，就是為了日蘇友好運動，也非弄清楚不可。可是，我當時隨隨便便地作了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和判斷：“蘇聯的和平共處政策像是誰都支持的，

所以它似乎總是正確的”。到莫斯科以後，目睹蘇聯的種種現實，這才發覺今天的蘇聯已是現代修正主義，決心要徹底地和它作鬥爭。

新谷：我留學蘇聯的目的，是希望在世界第一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學習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和理論，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各種理論和實際。

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初到達莫斯科，這年年底就爆發了衆所周知的中蘇公開論戰。第二年七月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下台，這樣，我遇到了留學初期時連做夢也無法想像的大動蕩，我們在這個大漩渦中學習到種種非常寶貴的經驗。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開始之後，特別是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後，日蘇兩國共產黨的關係惡化了，蘇聯當局對日本留學生的態度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赫魯曉夫下台前夕，我們已陷入隨時可能被驅逐回國的境地。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這時起，日蘇兩黨關係又開始恢復好轉，到我們一九六七年畢業回國時，日蘇兩黨關係已非常好轉了。我們在蘇聯留學的五年期間，遇到了日蘇兩黨關係前所未有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

我們在這個期間，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生活體驗方面，都非常深刻地懂得了什麼是現代修正主義。正因為這樣，現在我們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正在中國取得勝利

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

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國際性

佐久間：對我們來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這就是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國的學生一起生活，一起學習，一起思考，一起鬥爭。我很長時間和拉丁美洲的學生住在同一個房間。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到莫斯科以後，巴西發生了反動的軍事政變。如果是在日本，我可能對這件事不那麼關心，可是和巴西學生住在一起，就實在不能當作是別人的事情了。

那時候，巴西的民主人士大量被殺害，被抓進監獄。在莫斯科的巴西留學生都是曾經和他們一塊兒進行過鬥爭的，是他們的親人。他們有一個星期左右徹夜不眠，搜集消息，商討對策。因為對於他們來說，也就是發生了由於祖國發生政變，即使畢業之後也有國不能歸了。這次事件使我們感到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就像在自己身邊一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這類事情應該放在什麼位置上？要深入了解形勢，同學們在一起議論紛紛。這在理論上也是一次很好的學習。

新谷：由於亞非拉三大洲的反帝和民族獨立鬥爭猛烈展開，從這些地區到蘇聯來的留學生對政治問題都是非常敏感的。他們說政治和他們的關係就是生命攸關的

關係。在這一點上，我們日本學生就存在着到頭來只是口頭上議論議論的弱點，所以我們從中獲得了深刻的教益。只須略一想想，巴西、印尼、加納和阿爾及利亞等許多國家的政變，越南戰爭，以色列的侵略，這類事實實在太多了。

佐久間：碰到這類事情，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當事國學生立即組織鬥爭。我們也必須明確表明我們的立場，參加他們的鬥爭。這些問題迫使我們認真考慮，展開討論。

足立：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裏，各國各種政治立場的人都有。他們又各有不同的情報網。像巴西政變這類事情發生後，能够很快就獲得來自各方面的詳細情報，幫助我們相當正確地判斷事物。而且，那種不容許有任何敷衍了事的判斷的踏實精神，已成為我們的寶貴的經驗。

在留蘇五年期間，我曾先後和俄國人、印度尼西亞人、坦噶尼喀（現在的坦桑尼亞）人、古巴人、哥斯達黎加人、厄瓜多爾人同住一個房間。從地圖上看，這些國家大多是小國，過去對它們不大關心。回國後再在報紙上看到刊載這些國家的消息，就想起這些同學，對那些新聞也有了親切之感。

新谷：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裏，值得回憶的事情當然很多，但其中最值得提到的就是我們和來自亞非拉三

大洲、現在從事民族解放運動的青年們結成了親密的友誼。我可以斷言：這些國家的正在從事鬥爭的學生們，都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他們已經認識到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

對蘇聯人民的感謝

新谷：在蘇聯居住期間，對蘇聯人民質樸、偉大、善良的性格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蘇聯人民現在雖然在現代修正主義者統治之下，但是毫無疑問，蘇聯人民總有一天會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恢復和發揚列寧、斯大林親手培育起來的社會主義精神。

對給了我們在莫斯科學習五年的機會的日蘇兩國人民，我們衷心表示感謝。我們將遵從列寧指出的“十月的道路”，為日蘇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工作。

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現實

蘇聯青年的精神面貌

新谷：首先，我們還是談談蘇聯青年的精神面貌吧。今天，經過革命後五十年的蘇聯，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的人生觀、世界觀是怎樣形成的……

佐久間：簡單說來，一句話就能解決問題。只要你想一想在日本我們周圍的那些對政治毫不關心的人，就知道了。

具體地來說，譬如戀愛觀、人生觀、從興趣出發關心政治的程度等，無論哪一點，可以說都和日本的那些毫不關心政治的人一樣。包括共青團的團員，對政治也表現出驚人的漠不關心。我們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也常常舉行政治集會。但是跑到莫斯科大學看看，那裏的學生最多，幾乎是清一色的蘇聯人，學校當局和越南留學生多次召開支援越南人民的集會，在有幾百人參加的集會上，蘇聯學生只不過有一、二十人。因此，我們如果要使這種集會成功，就要依靠非常可靠的外國留學生；他們不認真去幹，就不會成功。但是在這個會場的

隔壁，第二天舉行了一次舞會，全場擠滿了蘇聯男女學生，他們在舞會上大跳扭擺舞、查爾斯頓舞。

看到這種事情實在令人生氣。而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裏，和我住一個宿舍的蘇聯學生，也完全一樣。

原田：就這一點來說，蘇聯的母親們的一般想法是，自己這一輩人已經吃盡了苦，好容易到這個和平時代，可不能讓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種苦了，青年們願意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吧。這種想法是從哪裏來的呢？一句話，就是從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的黨和政府的“和平共處”政策來的，並且越來越濃厚了。

所以，青年們的想法也就是進大學，就高職，拿高薪，娶個漂亮的老婆，過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別是大學生和中上層家庭的子女，這種想法非常強烈。

對政治漠不關心

新谷：不限於青年，在一般蘇聯人之中，不關心政治的風氣也是根深蒂固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當我畢業後辦理完回國手續向學校告別時，一位蘇聯教授對我說：“好啦！再見！”於是他向我說了一句最美好的臨別贈言，他怎麼說的呢？他說：“你回到日本後找個好的職位，拿高薪，有了錢，就討個漂亮的老婆”。（笑聲）我簡直是無言以對了。

那位教授在蘇聯可說是最標準的正經人。他說這些話並沒有惡意，完全是他的真心直言。蘇聯全體的大學教育工作者都抱着這種想法，不僅是教授、講師如此，蘇聯的青年和學生的生活理想，就是夢想進第一流的大學，最好是著名的理工科學府，學成之後成為專家、高級技術人員；在大學學習期間，最好能入黨，畢業後就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去，住高級豪華的別墅，家庭用具全部電氣化，出入有汽車代步，這些就是蘇聯青年人夢寐以求的東西。在蘇聯，大學畢業後找到職業並不難，那裏有一條尖子路線，踏上這條路的人就不再有除此以外的想法。

從這點來看日本，許多青年人不是儘可能不參與學生運動和政治運動，一心要做一個高級技術人員，將來過舒適安定的生活嗎？可以說，蘇聯青年不關心政治的傾向比日本青年還要普遍。蘇聯沒有像日本、西歐那樣的學生運動，也沒有日本那樣的私立大學，用不着交學費，所以蘇聯的教育體系就是徹頭徹尾地培養不關心政治的人。

毫無意義的紀念大會

新谷：因此，即使有種種政治集會，也是幾乎誰都不予理睬，不去參加。講政治經濟學，去聽的人也非常

少。只是上最低限度的課，爲了應付考試。不過是臨考試之前翻一翻講義。幾乎完全不深入研究思想問題、理論問題。

在蘇聯，“五一”勞動節和十月革命節是最重大的節日，每年都要盛大慶祝。黨政機關、大學當局也在自己的單位舉行慶祝集會。在蘇聯，這類集會是分成兩部份的：第一部份是開會儀式，講話、致節日祝賀等；第二部份是餘興節目，唱歌、跳舞等。但是第一部份的集會，會場幾乎是空的；到第二部份時，觀眾還要看是否有著名的歌手演唱，或者是否放電影，如果有，才決定入場參加。據參加過克里姆林宮集會的人說，那裏的集會也是如出一轍。在一些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出席的集會，預定開會的時候到了，只見座席上放着一方方的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則是空的。演講人只是對着一方方手帕講話，到第二部份餘興節目開始時，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陸續進場。這在十年之前就已經如此了。

像現在這一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甚至在這個時代，我的目睹這種狀況的朋友就感到：“真是怪啊！”

足立：一個原因是，那些儀式、部份的致詞也好，演說也好，全是枯燥無味的東西，沒有意思，沒有內容，不過是原封不動地重複一遍上級的決定，連詞句都

一樣，當然使聽的人感到厭煩。而且，連演說的人本身都不是把要講的問題認真地思考之後再講的。講的人是，如果講這個問題，那麼只要這樣說就行了，這已成為定規；聽的人則是對那些話早就知道了，倒並不是真懂了。那些話已經成了毫無內容的虛有形式的空架子。

不僅僅是青年人，蘇聯一般人也對政治極端地不關心。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蘇聯政府的宣傳，就叫人民羣衆不要關心政治。他們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蘇聯的黨和政府領導人是人民的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沒有矛盾。政治是領導人的事情。工人們只要去採煤、煉鐵、分担一種生產任務，放心地將政治全部交給政府辦理就行了。

其次，例如批判斯大林，赫魯曉夫下台，這類事件常常發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人民大衆完全被蒙在鼓裏。領導層內部爭權奪利，領導人就老是換。從被稱為斯大林時代的那個時候起，一般老百姓就是一涉及危險的政治領域，就閉口無言，對政治具有恐怖之感，都想遠遠離開政治。可以說，今天的蘇聯人民大衆，無論老少，是在走與關心天下大事完全相反的道路。

足立：我們到蘇聯一看，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對待人民大衆的態度，用中國式的語言說，就是工作作風吧，決不是要求人民大衆革命化，或者是教育他們，發動他們自己站立起來，而是採取“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辦法。他們就是要羣衆盲目地跟着走，這樣才容易統治。所以是不進行教育。因此造成了現在這樣不關心政治的狀況。羣衆自己就不會自覺地起來鬧革命。這和中國革命青年們放眼世界革命，從事祖國建設，考慮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我隨便可以舉出蘇聯青年人對政治是怎樣漠不關心的例子。有一次，我到格魯吉亞旅行，那裏是斯大林的故鄉。遇到一個十八九歲模樣的青年，我們便攀談起來。他見我是一個外國人，就說他“對世界政治很感興趣”，他突如其來地說：“日本在兩三年前已經爆發革命了。”這位自稱關心世界政治的青年，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如果換了個不關心的人，豈不更要鬧出笑話。我問他關於日本的現況，他却什麼也不懂。

我又曾向一個蘇聯少年問：“你能談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麼不同嗎？”這位十五六歲的少年竟木然不能回答。連這類資本主義存在剝削、社會主義沒有剝削的最基本的答案，這個蘇聯少年也說不上來。他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對於日本人民的鬥爭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等問題，他們更是無法了解，也不會去注意。

佐久問：我也來舉個例子，我舉的不是蘇聯一般人，而是共青團裏面擔任領導職務的人。

一個共青團的領導人對我說：你們老是說“我們反對在日本的美國軍事基地，日本人民正在為撤除這些基地而鬥爭”，這是真的嗎？我回答說：“正是這樣。”他又問：“一直都是這樣的嗎？”我回答說：“一貫就是反對的。”他接着問：“為什麼不能把美國趕出去呢？”我向他解釋，因為“日本有反動政府……”。他又質問我：“人民既然反對美國軍事基地，為什麼政府不把那些基地撤消？”我便和他談起政府的情況，日本社會的階級組成，反動政府的階級性和反動性。我說完之後，那位共青團的領導人却說：“你們那裏實行民主選舉的制度吧。人民既然反對，通過選舉把政府推翻不就行了？！”

作為一個共青團的領導人，連階級鬥爭的起碼常識也不懂，看來對他必須從階級鬥爭課的ABC的A字教起。

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有興趣

佐久間：在蘇聯青年普遍不問政治的同時，對於西方頹廢的資產階級文化，却處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種傾向非常強烈。

他們如果從哪裏弄到一兩張西方的音樂唱片，明明有手提袋可以裝進去，他們却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招搖過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國

唱片。

他們如果開唱機，住在樓上的，一定把窗戶盡量打開，把聲音放得大大的，好讓左鄰右舍知道他在“欣賞”西方音樂，並引以為榮。（笑聲）他們跳起舞來，不是扭擺舞，就是查爾斯頓舞，以此為時髦。

過去我在日本曾參加過歌聲運動，會唱一些俄羅斯民歌。有一次我和蘇聯青年在一起時，我唱起俄羅斯歌曲，不料無人附和。我感到奇怪，忙問個究竟。那些蘇聯青年回答說：“唱那種沒有意思的古老調子做什麼，我們要聽新歌。”接着他們就唱了起來。所謂新歌，就是那些毫無意義的流行歌，這些歌曲拿到日本來一樣可以通行。

我穿的西裝褲褲腳是有摺邊的，一個蘇聯姑娘竟指着我的褲腳說：“你們日本人為什麼還穿這種老式的褲子？”（笑聲）好像不效法西方，不穿那種褲腳沒有摺邊的緊身腰的阿飛褲，就不算“時髦”。

不良少年的出現——“游蕩兒”

佐久間：現在蘇聯也出現了終日游蕩的孩子，由於父母參加工作，孩子丟在家裏無人教養，變成小流氓，成為社會問題。在我們看來，還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問題而已。

據我們所知，有這樣一個例子：我們大學宿舍的附近有一片森林。夏天每到夜晚甚至過了十二點鐘，還有大羣小流氓在樹林中聚集，有時大吵大鬧，有時發出可怕的尖叫聲。有一晚，兩個印度學生一邊談心一邊步向森林地帶，在黑暗中被一羣小流氓包圍，沒說上幾句話就爭吵起來。一會兒，一個印度同學飛奔跑回學校宿舍，帶領另一批同學到樹林中去，只見另一個印度同學已被小流氓殺害。這件事情就發生在距離我們學校宿舍二三百米的地方。

這一事件的發生，它的本身就不只是“游蕩兒”造成的問題，而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根本問題。這些小流氓之中有人還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長大後就加入共青團，再大就加入共產黨，如果在前面講到的不關心政治的環境下成長，他們將來會變成什麼樣的人，細想下去真是令人感到可怕。

現在，蘇聯也有大量的“硬殼蟲”出現，資本主義的毒素充斥頭腦、頹廢、消沉、過一天算一天的年輕人，正在急劇地增加。少年犯罪問題，確實成為蘇聯今天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有洋房，有汽車，沒有老人”

足立：日本婦女選擇對象時不是都說，要“有洋房，

有汽車，沒有老人”嗎？想不到在蘇聯，也有類似的話。

原田：在蘇聯，是這樣說的：大學畢業，是黨員，有洋房，沒有雙親。就是說，沒有老人。

佐久間：有一個在政府機關中工作的年約四十歲左右的蘇聯婦女，在和我談天時問我：“你們日本也有婆媳之間的問題麼？”我說：“當然有的。我也要問問，你們也有這個問題嗎？”她說：“可厲害啦。”這時我又談起日本婦女選擇對象時的三個條件：“有洋房，有汽車，沒有老人”。她聽了後格格大笑，然後說：“我們這裏的閨女的出嫁條件，和你們那邊可說是一模一樣啊。”

新谷：今天蘇聯社會的不斷蛻化變質，除了當局有意識地促成之外，有些是環境影響的結果。例如忽視思想鬥爭，結果，特別是青年一代中，逐漸產生了一種叫人啼笑皆非的情緒和氣氛，那就是醉心於美帝國主義的文化，憧憬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而且對此完全喪失了警惕性。蘇聯青年對爵士樂的瘋狂迷戀，也反映了這種情況。我們原先以為，到蘇聯以後可以到處聽到真正的、地道的俄羅斯民歌。相反，不但聽不到，而且我們會唱的俄羅斯民歌和蘇聯早期的革命歌曲之多，竟使蘇聯人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爵士樂。這些人在唱歌藝術上一竅不通，只是狂熱地喜好爵士樂。到了這種程度，已經不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所能制止得了的。舞蹈也是一樣。他們嚮往種種美國生活方式，嚮往西方的各種物品。這種

風氣越來越發展。

例如在我回國的一年前，一首日本流行歌《花生米》在蘇聯非常流行。這首由一對雙胞胎歌手合唱而走紅的日本歌曲，不僅在俄羅斯共和國，在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也流行，一年不到，在全蘇聯都流行起來了。

有一年夏天，我們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幾十個學生，到一所在海濱舉辦的濱海暑期學校去參觀。一羣從幼兒園到小學低年級的學生出來歡迎我們，並且唱歌表示友好接待。唱的竟是那首《花生米》，而且反覆唱那歌詞中“愛情的假期”的一段。（笑聲）他們看到我是日本人，就再三要求我用原文唱給他們聽。我對他們說：“這不是在衆人面前唱的歌。這是受美帝國主義頹廢、墮落文化影響最深的東西。日本的正派青年也不唱這種東西。”我的這番話，竟使他們感到詫異。

兒童唱歌這類小事可能會被忽視，但是幹革命也好，搞反革命也好，首先總是要造輿論的。在蘇聯，資產階級的風氣已經泛濫，正在腐蝕着人民的思想。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思想被腐蝕，是社會變質的第一步。我曾經和蘇聯共青團的中央委員們面談，我問他們：“你們對於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究竟採取什麼對策？”他們對這個問題，可說是完全不懂，所以無法回答，大概是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佐久間：有的共青團領導人這樣說：“好的東西就是好的，不管是美國的還是哪國的……”這是一次我們學校組織代表團到一個加盟共和國首都訪問，和一個市的共青團組織的書記會談時，他說的。這個代表團不僅有日本學生，也有其他外國學生，我們大家都向他提出：“青年人大跳扭擺舞，你認為是好的還是不好的？你們怎樣去指導青年？”不料他竟反問我們：“你們為什麼要提這樣的問題？好的東西就是好的。”反而使我們好幾次都無言以對了。

修正主義從思想和文化的變化開始 西方廣播可以自由收聽，却不准聽北京廣播

原田：回顧在蘇聯五年來的生活，我們痛感到：蘇聯變成修正主義，迅速地垮下去，其缺口首先仍然是文化、藝術和意識形態這些方面。

例如，我們到莫斯科之前，爵士樂隊雖然已經有了，但還不像今天這樣橫行無忌。當時只是一些青年人圍在一起，聽聽唱片，跳跳舞。但是它逐漸逐漸地毫無控制地蔓延開來了。

蘇聯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個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每年都舉行爵士音樂演奏會。在黑海沿岸一個叫索契的城市，每年夏天都舉行有東歐國家參

加的爵士音樂會。在會上取得第一名，就可以到美國和法國去。這樣，爵士樂自然就更快地流行起來了。

在這以前，蘇聯政府對西方國家的廣播是限制收聽的，例如“自由柏林”、“美國之音”、倫敦“BBC”電台的俄語廣播節目，都不能隨便收聽的。可是從我們到了那裏以後，就大大地放寬了限制。相反，對於北京廣播，却採取發射干擾訊號等等越來越嚴厲的限制措施。最近，在莫斯科已經完全不能自由自在地收聽北京的俄語節目了。而西方的這些電台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地播送爵士樂。

佐久間：講到廣播，今天，“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兩個電台的世界收聽率，恐怕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最高。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收聽。蘇聯人說是要聽聽這些電台的爵士樂，實際上不過是遁詞，他們也收聽這兩個電台的政治宣傳節目。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文化侵略，却完全處於不設防的狀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就這樣被葬送了。

“托瓦利什”（同志）這個稱呼正在消失

佐久間：還有，在我們回國之前，蘇聯出現了一個新的話題，就是連我們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

志)的稱呼，正在消失。《文學報》上刊出的一個作家的倡議，認為“托瓦利什”這個字眼是個不文雅的稱呼，應該停止使用。他主張使用俄國貴族使用的古老稱呼“蘇一達利”或“蘇達魯尼亞”，代替“托瓦利什”。“蘇一達利”、“蘇達魯尼亞”相當於西班牙語中的“塞尼約爾”、“塞尼約里達”。

(“塞尼約爾”，SENOR，意即先生。“塞尼約里達”，SENORITA，對女士、小姐的尊稱。“蘇一達利”，意即老爺。“蘇達魯尼亞”，意即太太。)

這一問題正在人們議論之中，看起來，“托瓦利什”這個稱呼十分可能將在十月革命的國家中消失。

原田：談到青年人不關心政治這點，例如莫斯科大學，是蘇聯高級知識分子的巢穴，學生差不多全部是蘇聯人。莫斯科大學的政治經濟問題討論會，許多人都拒絕參加，或者參加了而不發表自己的意見。最近西方資產階級報紙也有報道，蘇聯是今天世界上唯一沒有學生運動的國家。蘇聯青年也看報，問他們為什麼看報，他們說：“有人問起時，如果不知道一點蘇聯政府的說法，那就很難為情。”而且，他們根本沒有自己的看法。他們是政府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所以，他們認為，可以不出席政治集會的第一部份，因為那些發言無非是重複政府、黨的機關報上發表的言論，參加了也是浪費時間，而集會的第二部份，看電影、舞會，參加了會心曠神怡。

由於這種緣故，現在去參加政治集會的第一部份的人真是屈指可數的。

自卑感與優越感

足立：羨慕、崇拜美國和西歐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已經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有蘇聯領導人在這方面事事帶頭，上行下效，理所當然。赫魯曉夫穿的衣服，就是特地到英國定做的；中國的領導人一貫穿人民裝。兩相比較，人們就清楚地看到了這兩個國家所走的不同方向。

例如，我們在莫斯科“紅場”就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紅場”是革命的聖地，直到幾年以前，到蘇聯的人都想到那裏去一下，那裏有列寧的陵墓，人一到紅場，心情就嚴肅起來。但是，今天的紅場，已經沒有莊嚴肅穆的氣氛了。我們看到許多栽着假睫毛，塗上藍眼圈，臉上塗着厚厚脂粉的蘇聯女人。她們見到外國人，就馬上走近來問：“有沒有日本半導體收音機？”“帶着美鈔嗎？”我告訴她們：“什麼都沒有！”誰知她們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裝說：“就這個，你賣給我們吧！”

這些行爲表明：在蘇聯人心目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什麼都是好的，文化當然也是西方的好。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政治鬥爭的觀念。階級鬥爭的念頭更是烟消雲散了。在我們看來：自己成了國家的主人，並且正

在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向着共產主義邁進，該是多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只要有一點點這種想法，就不可能羨慕別人穿的西裝，更不會千方百計想要一架外國半導體收音機。也只有喪失了對建設自己祖國的熱情的人，才會覺得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蘇聯人一開口，就說什麼都是蘇聯的好。這個是世界第一，那個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按照他們說的，第一架飛機是俄國人發明的，無線電也是他們首先發明的，環遊世界一周，也是他們首先做出來的。但是在這種狂妄的優越感的背面，卻又暴露出這麼一副卑躬屈節的態度。我想，這可能是在他們的性格中，優越感與自卑感和平共處，而這兩重性格又不斷地交替表現出來。

“紅場”上的妓女

佐久間：這類例子，舉是舉不完的。我在“紅場”就碰到過“梆梆女郎”（妓女）。有一次我陪兩個日本遊客在“紅場”附近散步。遊客的樣子一望而知，特別是日本遊客少不了兩樣東西：照相機和眼鏡（笑聲）。那些女郎見到我們後，就從“紅場”上跟着，我們在克里姆林宮裏參觀完畢後，再度回到“紅場”中間，最後進入國營百貨公司，她們仍在尾隨着，當我們一回頭時，一個女郎趕

緊走攏來，用英語向我們搭訕着問：“你們住在哪個旅館？”我一看那些女郎的化妝就明白了一切，那些女郎的模樣和戰後初期日本的妓女完全一樣，我立刻用俄語說：“你們不必用英語講話，用俄語說吧。”我的話剛出口，她們面露驚悸之色，匆匆逃走。她們原以為日本遊客多數是說英語的，我的俄語一出，她們知道路數不對，吃驚地逃走了。這類事情，實際上俯拾皆是。

一看電影就明白社會真相

佐久間：有遊客自日本來時，我總是勸他們不要去遵照例安排遊客看的地方，而想辦法去看一場電影，就是言語不懂也不要緊，看看俄國人平時看些什麼電影，也就能够有助於了解蘇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至少我感到今天蘇聯上映的影片，大部份是描寫間諜、強盜、庸庸碌碌的小職員或頹廢悲觀的人之類。法國的阿飛、黑社會打鬥片在蘇聯上映得最多，美國的武打喜劇片，南斯拉夫和西德合拍的美式西部片等，都在蘇聯大大流行。觀眾看了這些影片，被資本主義思想腐蝕是必然的。我們在蘇聯五年多，還沒有看到過一部優秀的革命影片，充其量只是很早以前拍攝的早年的影片。所以說，從放映的影片，就可以了解到現實情況。如果按照原定的遊覽日程，是不能了解這些情況的，只有深入社

會觀察，才能一目了然。

野營中的荒唐事

佐久間：還有很多料想不到的事，剝開表皮就露出了真相。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有四十多年，從形式上看，它的成就至今仍然存在。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的《赤旗報》原封不動地大力宣傳這些東西。例如，某工廠的共青團組織，夏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用工廠的汽車載運大批帳篷，到森林去野營。把這種照片刊登出來加以宣傳。日本的青年工人看到以後，感到每星期都能到野外去野營實在是太棒了，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好哇。可是，到那個工廠去實習過的日本留學生，被邀請參加野外野營回來之後，却氣得滿臉通紅。問他為什麼這樣，他說：“所謂野外野營生活就是唱那些無聊的歌，跳那些下流的舞。如果到此為止，倒也罷了。可是，到了深夜，這些男女就一對對步入叢林深處，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在帳幕中，那些人直胡鬧到天亮才回來。第二天整個白天就在帳幕中蒙頭大睡，到了晚上，整理整理帳篷再回工廠，這就是共青團主辦的、每周讓團員過着的有組織的生活。”如果說，你只聽了前半半話，那當然你就要說，“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好哇！”（笑聲）可是你聽了後半半話，那你就會問，“這到底是哪個國家呀？”（笑聲）像這

類剝開表皮就露出真相的事情，要說起來真是多得很。

剝開皮來看

新谷：最近一個時期，日本到蘇聯的遊客特別多起來了。這樣一來，凡是日本遊客常住的旅館、常到的港口、車站和風景勝地，總是圍聚着大批想買日本商品的人。他們看起來都很年輕，絡繹不絕地向日本遊客糾纏，要買這個要買那個。還有不少小孩子則伸着手圍着日本遊客說：“給我一片口香糖！”“給我一支鋼筆！”看到這種情形，使人想到蘇聯青年已把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情和自豪，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最近日本大企業陸續在蘇聯設立分公司和商行，並在莫斯科索科爾尼基公園，舉行了多次日本商品展覽會。日本是個善於宣傳的國家，商行對每一位入場者都贈送一個印有日本商品廣告的塑料袋，不料許多人入場者竟為了一個薄薄的塑料袋互相爭奪起來。一些在蘇聯的日本商人也嘆息說：“太淺薄了，太不要臉了！”

在旅店或其他場合，一給小費，服務態度馬上轉變，沒給小費時那副冷冰冰的態度頓時換成了熱情接待的態度。總之，從上層領導集團起，整個蘇聯社會是越來越走向腐敗、墮落和變質了。

正經人被認為是笨蛋， 貪污腐蝕着整個社會

新谷：由於蘇聯社會的不斷腐敗、墮落和變質，正經人就會被人譏笑為笨蛋，甚至被認為是瘋子。於是，正經人也覺得，自己不幹得妙一點就弄不到好處。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從最下層的工人到上級，層層都各幹各的壞事，越是爬到上層，壞事幹得越多。最為普遍的就是貪污瀆職。這樣發展下去，蘇聯的經濟機構、社會機構就會無不被腐蝕而霉爛。這一類例子，實在不勝枚舉。

貪污發展到不止個別的人，而是集體地、有組織地進行，有不少企業從門房到最高的領導層，人人貪污。

例如我從蘇聯回國時，有些行李需要處理，一部份行李交由國際郵政局托運。我把行李拿到國際郵政局，一個司磅的人故意少算我的行李重量。他告訴我可以省二十個盧布，我便給他十個盧布作為報酬。這種事情在社會上已司空見慣，人們毫不為怪。這還是屬於最起碼的找“外快”，越往上層領導，貪污的規模也就越大。

這樣的腐敗、墮落，在今天的蘇聯整個社會中，是普遍地存在着的。這樣下去，列寧所創造的，斯大林所撫育的這個社會主義的蘇聯，就將被這些人完全盜空了。

官僚主義壓制創造性

新谷：在蘇聯，每年最大的節日是五一勞動節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節。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日本學生雖然不過八十人，但總是舉行一些富於創造性的慶祝活動。如針對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提出不同的標語口號，使每年舉行的慶祝活動有所不同。但是，這種創造性的建議或行動，在蘇聯是絕對行不通的。日本學生提出一些創造性的慶祝口號，每次都要遭到蘇聯當局的刁難。標語口號一字一句全部要事前檢查。最省事的辦法，當然是按照蘇聯當局所交代的去做，比如拿着官方製好的標語口號參加游行。

足立：反正就是一個“和平”，一個“友好”，超出這一範圍就不行了。

新谷：對，如果只是這些，就不會有問題；但要是發揮一些創造性，就必須經過一番激烈的鬥爭。

原田：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六七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特大紀念的日子，過去，日本學生在蘇聯參加節日游行，只許打日本學生會的那面紅旗。可是，這次五十周年的游行，蘇聯官員竟告訴我們連那面紅旗也不准打，要去就得把旗子卸下來。我們說：“既然你們不准帶紅旗，那我們就只好帶旗桿去了。”

我們真的帶着旗桿去了，可是蘇聯官員一見到我們，又說旗桿也不准帶。我們說：“你們現在又說不能帶旗桿，可教我們怎麼辦呢？”他說：“那你們就回去吧！”我們說：“我們已經來了，你們又叫我們回去。不管怎樣，不管你現在怎麼說，我們不用旗桿，就用雙手高舉紅旗行進好了。”我們一邊說，一邊走進“紅場”，結果我們只用手撐着日本學生會的那面紅旗參加了游行。

在此之前，我們總是製作了許多創造性的標語口號，帶去游行；而這次却全部被禁止使用了。日本學生商定披着標語帶去游行，連這個也遭到禁止。

佐久問：蘇聯官員說：“因為今年是五十周年，多餘的東西統統不許搞！”（笑聲）這就是他們的理由。他們又說：“五十周年是大慶日子，全國都在慶祝，你們那些骯髒的標語口號，千萬不可拿到游行隊伍裏去。”（笑聲）這一年的慶祝，全部由當局規定，連顏色也講究統一。因為今年的顏色是什麼，是表示今年的政治基調的，隨便搞一種顏色是不行的。而實際上，在五十周年以前就已經不讓搞了。

但是我們的標語牌是照日本的方式，分別由每個人自己寫了以後帶去的，而莫斯科的區委會却硬說“那些是骯髒的東西，不准拿着游行”。我們說：“那我們就搞一些不骯髒的吧。”就要求學校當局提供材料，製作了一些講究的標語牌。有的標語牌正反兩面都用俄文和日文寫

着“打倒佐藤內閣！”我們舉着標語前赴大會時，途中一位蘇聯官員飛跑過來說：“拿着這幅標語，不許參加游行！”似乎是在說：我們和佐藤政府是建立了牢牢實實的外交關係的！（笑聲）

十月革命紀念節日，居然禁止提日本人民打倒本國反動政府的口號，當場就有許多同學不服。我們據理力爭說：“我們不能捨棄這幅標語！”那蘇聯官員說：“不捨棄就不准游行。”最後，蘇聯方面叫來了幾名大漢，把拿着標語牌的幾位同學連同標語牌一起帶走，到人們看不見的街角，強行將標語牌砸毀。

在莫斯科，今天已經不能喊着“打倒佐藤內閣！”的口號進行示威了。

原田：因為蘇聯領導人要討好日本壟斷資本，已向佐藤首相發出邀請他訪問蘇聯的請帖。所以，不能刺激佐藤政府就成了藉口了。現在，蘇聯政府和日本反動政府大講和平友好，僅僅這一點，已足以顯示蘇聯領導人不知天下有羞恥事了。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節前夕

新谷：“五一”和十月革命節前夕，總是要舉行預祝集會的。各國的學生都準備有自己的節目，在會上表演。日本學生一般是表演三支歌：一支是用日語唱的日

本革命歌曲，一支是用俄語唱的革命歷史歌曲，還有一支是反映日本人民鬥爭的歌曲或民謠。總之，無論是用俄語唱的革命歌曲，還是用日語唱的日本革命歌曲，在節日前夕唱革命歌曲，日本學生成了唯一的例外，因為在這種場合已經不唱這種歌曲了。

佐久間：他們覺得唱革命歌曲是不光采的事情。在學校裏舉行節日前夕祝賀時，樂聲喧天，吵鬧不絕，全是些爵士樂、扭擺舞音樂。有時想唱一唱《國際歌》，可是混雜在這種烏七八糟的氣氛中，是多麼地不倫不類啊！

新谷：當我們要唱那兩支革命歌曲時，蘇聯當局總是找出時間不多了，唱一支民謠就夠了等等藉口，不讓我們唱革命歌曲。

“五一”這一天，同學們清早五六點鐘就得起床準備參加游行。學校當局爲了催同學們起床，一大清早起就播放爵士樂。爵士樂竟成了起床號，真是不可思議。

原田：工廠工人的游行隊伍中的吹奏樂隊演奏的也是這一類曲調。一面滴哩哩滴哩哩地奏着“愛情的假期”之類的曲調，一面游行。我還想起一九六六年各國人民友誼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當時是在克里姆林宮裏面的大會堂舉行的。日本學生組織了合唱團準備演出。合唱人員早在考試期間，不管功課怎樣忙碌，也都盡量抽出時間練習。照例是準備唱三種歌曲，其中一支是俄語革命歷史歌曲《紅旗頌》。但是在上場演出之前，

蘇聯當局硬是不許我們唱這支革命歌曲。我們問他們理由，他們說這一天的畢業典禮和文娛節目實況，要通過電視向蘇聯和歐洲廣播，唱革命歌曲很不適合。我們聽了很是氣憤，結果只唱了日本歌曲。

新谷：正是因為蘇聯當局的諸多干涉，許多有革命意義的、有創造性的新事物，一概遭到扼殺。任何集會或活動，人們只要是不按照官方交下來的或官方批准的做法去做，而按照羣衆自己的創造，特別是牽涉到革命的事物，就必須進行殊死的鬥爭。作為外國人，一旦被蘇聯當局懷疑或不歡迎，還不致於立刻威脅到生活；但是，如果是一個蘇聯人被目為異己的話，那就要大禍臨頭，就會被迫害得走投無路。所以，人們的那種逃避政治和對政治的漠不關心，那種失掉了熱情和自豪感的情況，恐怕就要從這樣一些方面反映到制度上來。

佐久間：對於我們現在談的這些蘇聯見聞，有人說：“你們因為在蘇聯處境不好，你們恨之入骨，所以說話時感情用事，只揀人家壞的講。”照宮本顯治之流的說法，在國外住久了，由於對那個國家的現狀過分反感，就會忘掉“兩條路綫”的鬥爭。其實，在莫斯科的日本人，包括社會黨的人，甚至是“日本之聲”（指投靠蘇修的日共修正主義者志賀義雄一派——譯者）的人，每天飲茶、吃飯時，都在談論蘇聯這些腐化、墮落的現象。其他外國學生，每天也都以這些為話題。我們說的

這些，只不過是把每日的見聞照原樣如實地說出來罷了。絕對沒有誇大。

足立：有時說話太老實，人家反而不相信哩。（笑聲）

黨和人民的關係

新谷：在蘇聯，目前是蘇聯共產黨一黨專政，這是蘇聯憲法上規定的。這個制度自從革命以來，已實施了五十年。關於蘇聯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的關係，先不必從理論上去談，不妨從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來談。即究竟蘇聯的人民大眾對黨的看法怎樣？蘇聯共產黨員是怎樣對待人民大眾的？黨和人民的關係怎樣？我們來談談這些問題。

在蘇聯的大學裏，功課稍微好一點的學生，在畢業以前幾乎都入了黨。

足立：總之，所謂“優等生”都能入黨。

入黨是穩定社會地位的保證

新谷：日本過去有高等文官考試、外交官考試，許多人多年苦讀，一朝考取之後，就取得了學而優則仕的資格。今天的蘇聯，則以入黨為取得社會地位的保證。

當然，今天在蘇聯入黨比日本的文官考試要容易得多了。不入黨就不能夠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功課優良的學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如何，都發展入黨。這已經成爲一種形成社會的統治階層的制度。一個人在大學畢業，也就同時成爲黨員。入黨，對蘇聯人來說，是一個人一生取得高職優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缺少的一項保證條件。一個人某種技術高，就能入黨；學生只要在學校分數高，就能入黨。在蘇聯，黨員意味着優秀人物，高人一等。

只要人民服從的黨的領導

新谷：現在可以看看蘇聯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在蘇聯黨看來，所謂人民，就是接受黨的領導的工具，而這種領導是單方面的，就是黨發號施令，人民只能服從，這已經成了公式。人民決不准批評黨的不是。如果人民批評了黨，馬上就會遭到迫害。蘇聯的黨決不是毛澤東思想所指出的“人民——黨——人民”這個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的原則，而只是“黨——人民”這個公式。人民必須承認黨的絕對權威，並只能服從它。這種關係在東歐國家還不太多見。我們感到，長期以來，這種關係在蘇聯已經牢牢地培植起來了。在任何國家裏，鬧革命並奪取了政權的黨，都是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

權，去辦它的事的。在這種場合，這個黨哪怕稍有片刻丟掉“黨是革命的工具，是爲人民服務的”這個觀點，忘記“人民——黨——人民”這個公式，而僅僅保留了特權階層指揮廣大落後的羣衆，優秀人物指揮不太優秀的人物的形式，到頭來就會變成法西斯主義。

蘇聯現在實施各式各樣的經濟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來越高，採取越來越擴大工資差距的政策。騎在人民頭上的黨員以及領導階層的所作所爲，無不爲了保持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提出一個接一個的政策。

忘掉了“爲人民服務”和 “羣衆路線”的觀點

原田：爲人民服務的觀點，羣衆路線的觀點，對蘇聯共產黨來說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它所要維護的，就是現在這套專制主義的統治體系。層層領導人只圖一己的私利私欲，他們的腐化墮落是必然的，這也就必然地引起蘇聯社會的全面變質。

足立：宮本修正主義一幫傢伙中有人說什麼，只要不斷地發展黨員，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發展入黨，革命就成功了。而現在，在蘇聯豈止是百分之九十九，甚至可以把百分之百的人都拉進黨內。即使不是百分之

百，而是把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人發展入黨，那也決不會實現共產主義。

新特權階層的形成和黨的變質

足立：蘇聯的黨開始變質的一個轉折點，是入黨以後就能取得特權。按照列寧的原則，一個黨員絕對不應該比一般非黨勞動者取得更多的工資。但是今天的蘇共黨員的收入，遠比一般人多得多。因為當了黨員，地位就升得快。例如在工廠裏，黨員就能比非黨羣衆早當廠長。當了廠長，就可拿到比一般工人多不知多少的工資。有能力的人，不管腦袋裏的思想如何，只要當了黨員又有了地位，就能領取高工資。所以，普通人就拚命想成為黨員。青年學生也把入黨作為他們拚命爭取的目標，努力自我修養。可是，他們心目中實際上想的却是入黨就有了一切，根本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可是從表面上看却是很老實的、挑不出一點不是的人。這種黨和西方國家的政黨又有什麼兩樣？

喪失了黨的領導作用

——屈服於“和平的敵人”美帝國主義

足立：今天蘇聯的黨已經失去了作為黨的領導作

用，這在赫魯曉夫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觀點中已暴露無遺。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重大的損失。具體地說，人民的傷亡達二千萬人，物資財產的損失相當於其他歐洲國家所受戰爭損失的總和。斯大林格勒幾乎全城被毀滅。二十年來嘔盡心血才取得的建設成就，全部毀於炮火。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人民大眾希望和平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日本在第二次大戰後，人民的感情也是強烈地渴望和平。

但是赫魯曉夫却利用這一點，選擇了和美帝妥協的道路。如果真正要發揮領導人民羣衆的作用，就不應該要人民追隨和平的敵人，而應該向人民明確指出誰是和平的敵人，指出一條贏得和平的正確道路；就應該徹底地揭露和平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只有領導人民和美帝堅決鬥爭，才能防止另一次侵略戰爭。

但是蘇聯黨不是這樣，他們一味強調再打一次戰爭就要蒙受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無論如何都要避免戰爭。赫魯曉夫利用人民對和平的善良願望，選擇了向美帝屈服、妥協的道路。這是一個典型的事例，說明蘇聯共產黨已從根本上喪失作為黨的領導作用。

失去了對黨的信任

佐久間：現在談到的問題，實際上包含着好幾個問

題、如黨的問題、羣衆路線的問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等等。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大眾對蘇聯黨的信任越來越下降，特別是最近，可以說在各方面都再也清楚不過地表露出來了。例如，向蘇聯工人問到“你是黨員嗎？”很多人會這樣答覆：“我爲什麼非要入那個什麼黨？我已經分配到了公寓（笑聲），尤其是現在，我也沒有想要入黨幹這幹那，所以不入黨不是更好？”最近在蘇聯一般人中，採取這種態度的，出乎意料地多起來了。

原田：一般的工人還說，入了黨，開會就多，拿這個時間賺點盧布豈不更好？爲什麼一定要入黨？

佐久間：還有，一般蘇聯人對黨員們神氣活現，不肯做事的惡劣作風，十分反感。他們痛感黨的領導不好，對蘇聯黨的反感非常強烈。

我去年看過一部名叫《你的同時代的人》的電影。它十分有趣，包括了種種的問題。影片中有個場面，寫一個黨員和他的一個中年非黨同事在飯店裏談話。一方問：“你爲什麼不入黨呢？”那個回答說：“黨員是應該拚命爲別人辦事的人。成了我這樣的人，那也沒辦法啊！”這個人自然沒有說：“黨員要完全忘我，爲人民服務……”（笑聲）在我們聽來，他那樣回答也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出乎意料，不論是在我看這部電影的那個地方上的城市，還是在莫斯科，觀眾一聽到這段對白，就哄堂大笑，大鼓其掌。爲什麼呢？因爲觀眾都認爲，在蘇聯黨

中沒有忘我地爲人民服務的人。他們認爲這段對白是對蘇聯黨尖銳的諷刺和挖苦。所以大家就哄堂大笑，嘩地一齊鼓掌。蘇聯的羣衆明確地表示了他們對這個已經墮落的黨不信任的態度。

俄語中沒有“羣衆路線”這個詞

佐久間：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蘇聯根本沒有羣衆路線。說明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俄語中沒有“羣衆路線”這個詞。我曾經問過一些懂日語的蘇聯人：“羣衆路線怎麼個譯法好？”如果根據中國發表的俄文文件，那很簡單，羣衆路線就是“ЛИНИЯ МАСС”(唸法是“利尼亞—馬斯”)。但是那些蘇聯人還是不懂，他們說：“沒有聽過這個名詞”或“沒有那種說法”。我問他們究竟應該怎樣翻譯，他們支支吾吾，半晌說不出來，總之他們不懂這個詞的內容，從來也沒有想到過羣衆路線。我還是追問他們：“究竟什麼是羣衆路線？”他們在各種各樣的說明中，始終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其中一個解釋說：“就是站在羣衆的立場，爲羣衆辦事……”，別的人就說：“是嗎？那同林肯的想法是相同的囉。”（笑聲）

這件事情清楚地說明了蘇聯黨根本就不實行羣衆路線，他們心目中也沒有羣衆。

黨員的條件——不論思想好壞， “有能力的人”就行

新谷：在蘇聯，吸收黨員，只側重個人能力和努力讀書、努力工作的人。這和日本通過國家考試來吸收那些拚命用功讀書、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學生，本質上是一樣的。脫離思想、脫離政治去觀察一個人，就看不到他的短處。這種人，只是爲了自己而入黨，只是爲了自己飛黃騰達，有高的地位，有好的生活而入黨。這種人的心情，和日本那些爲了當上高級官僚而接受種種考試的人，是一模一樣的。他們沒有要把革命進行到底、要爲人民服務的觀點。因此，現在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共產黨人也好，將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共產黨人也好，如果不能無論何時何地都按爲人民羣衆服務的觀點辦事，按堅持羣衆路線的觀點辦事，那麼，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自然就是一點短處也沒有的優秀人物。但是，決不能說這樣的人就有資格入黨。假如一個黨由這樣的人組成，他們又處在執政地位，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是可想而知的。當然，我並不是說，蘇聯共產黨員都是居心不良的修正主義者，都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人。

蘇聯的黨，誰都知道是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黨，黨內

的確也有優秀的黨員。但嚴重的問題是這個黨已經變了質，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對這一點，我是在這次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才有了清楚的認識的。說實話，這一點是不容易認識清楚的。

原田：舉例來說，有些工人十分正派和老實，做出了別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有的成了勞動英雄，接着再有兩、三次就成了黨員，有些甚至成為最高蘇維埃代表。現在蘇聯一般的就是這樣做的。

足立：例如蘇聯滑冰運動員斯科布利科娃，在世界滑冰比賽中取得了三個項目的冠軍後，立即打電話給赫魯曉夫，你猜她說什麼？她對赫魯曉夫說：“我要成為共產黨員！”一個滑冰運動員得到冠軍以後，馬上就有本錢入黨。這樣的人，是否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黨員，則根本不理會了。

佐久間：從這點看，日本的大鵬（摔跤冠軍）馬上可以成為黨員了。（笑聲）

足立：如果說某一個人得了一個日本冠軍或世界冠軍的頭銜，就立刻可以入黨，這種做法顯然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員如果都是這樣的人，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但是蘇聯共產黨的入黨標準，就是完全抽去了一個人的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這樣的人入黨之後，慢慢成了黨的領導者，從長遠來看，必然把黨引導到錯誤的方向。就像現在這樣，無產階級專政也就變質，最後變成

了法西斯主義。

能動地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足立：赫魯曉夫下台時，蘇聯報紙上的報道，只說是由於年齡大和健康上的原因。這個解釋在外國人看來，誰也不會信服。我們曾和學校裏教授俄語的教師辯論這個問題。我們問他：“赫魯曉夫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而突然去職？”他說：“蘇共中央不是發表了公報嗎？我認爲那就是原因。”他堅持說：“赫魯曉夫除了年老和健康原因以外，不會有其他的原因去職。”

佐久間：這和宮本集團常說的：“只要是黨中央說的，都是正確的”的論調完全一樣。（笑聲）

原田：記得在赫魯曉夫下台的第二天，我們正好是上政治經濟學。當天出了號外，許多外國學生都爭着出去買報紙，教室裏的人幾乎都走光，課也上不成了。但是蘇聯學生怎麼樣呢？他們只是東張西望。大家談起這個問題時，他們則一味說：“當然是健康上的原因”、“這絕對沒有錯”。兩三天之後，西歐方面的消息傳入了蘇聯，事實證明赫魯曉夫的下台，絕對不是什麼健康和年老的問題。我們再問蘇聯同學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時，他們只是回答說：“我們不知道！”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蘇聯青年不僅不關心政治問題，就是對本國的黨和

國家的事情也冷淡到如此程度。無論你問他們什麼，他們都是這麼回答：“不知道！”

新谷：任何一個強大的黨，如果失去了爲人民服務的觀點，採取拒絕羣衆的批評和進行自我批評的態度，那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蘇聯今天的現實，就是一個具體的答案。特別是在取得政權以後，黨的問題更是重要。它關係到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蘇共在第二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推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認爲蘇聯已經沒有敵對的階級，階級鬥爭已經結束，這就是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可以說，這是使蘇聯從社會主義演變到資本主義的決定性的歷史事件。

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

新谷：前面談到了蘇聯青年的思想意識情況。更值得談的是和這個問題有關聯的思想領域鬥爭的問題，這是個重要問題。在蘇聯，地主和資本家是看不到了，但是階級鬥爭絕對沒有完結。在蘇聯生活過一段時間之後，確能使人重新認識到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從外表上看來是一些優秀的、居於領導地位的黨員，實際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他們把持了黨的領導權。這些人是促

使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主要因素，認清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思想領域的鬥爭，就不可能認清這一點。現在，中國正在進行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清楚地說明了思想領域的鬥爭的重要性。可以說這場大革命集中了人類的最高智慧，它意味着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人 民 民 主

新谷：談到思想領域鬥爭的問題，就必然接觸到民主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的民主，無論在其深度或廣度上，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比擬的。人民民主對推動思想鬥爭是絕不可少的，它必須是真正生氣勃勃的，真正能够激起羣衆革命熱情的民主。但是在今天的蘇聯，這樣一種民主已經喪失了。因此，對赫魯曉夫的下台，蘇聯人一句話也不說，也不提出疑問。這是環境使得他們不能說話，不能發問。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幹了那些事情的赫魯曉夫，到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未開之前就下台了。可是，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甚至連赫魯曉夫的名字都未提到。這個曾經是蘇共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就這樣由於“年老和健康上的原因”被趕下台了。與赫魯曉夫下台同時，以他的女婿阿朱別伊爲

首，凡是和赫魯曉夫關係密切的許多黨的領導人，也都以“工作上的過失”爲原因，同樣被免職了。試想，誰能相信赫魯曉夫是由於“年老和健康上的原因”而下台的呢？但是，在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隻字未提這個問題，無論這裏面是愚弄還是蒙騙，也沒有人提出質問。一般蘇聯人對此則更漠然處之，視爲常識上的當然事情。僅此一點，也能說明蘇聯社會的變質已經到了什麼程度。由於民主權利喪失了，蘇聯人民不能討論赫魯曉夫爲何失敗，它的原因何在，它的思想根源是什麼等等問題。這正是蘇聯的大悲劇。

不進行自我批評，不查明思想根源， 不組織羣衆討論

佐久間：不進行自我批評，不查明思想根源，不組織羣衆討論——這就是問題的本質。總之，蘇共過去，特別是從赫魯曉夫以來，就沒有認真地作過自我批評。他們把蘇聯的任何壞事，歸咎於一個原因，即指責以前的領導者，因此，根本不徹底查明錯誤發生的原因，絲毫不揭露發生錯誤的思想根源，再進行自我批評，從頭做起。更不說作爲一個黨，在某個問題上，是錯了。只是講，他那個時候，他幹了這樣的事，因此搞得一團糟。

在蘇聯，有一個時期，把全部的壞事，都說成是由

於斯大林的錯誤。有一部名為《晴朗的天空》的影片，一談到斯大林的死時，畫面為之一變，黑壓壓的滿天烏雲，遠處出現了一角晴空。他們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說成一片漆黑，斯大林一死，一切都好轉了。但是，這回赫魯曉夫下台，新的繼承者又把錯誤推在赫魯曉夫身上，這不過是轉移羣衆對執政者的不滿而已。他們從不揭露錯誤的思想根源，也不在羣衆之中展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以便不再重犯同樣的錯誤。我在蘇聯五年期間，從沒有看到過蘇聯領導人徹底地從思想上追尋問題的根源，而是完全相反，絕口不談思想鬥爭。

足立：決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追溯到思想根源，特別要重視思想鬥爭，要進行爭論，要揭露犯錯誤的原因。這樣的事，事實上是蘇聯當局沒有做，也不敢做。

否認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佐久間：再有一個是階級鬥爭問題。照蘇聯領導人的說法，現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已最後完成，開始步入建設共產主義的階段，因而階級鬥爭已不存在。他們說，只有資本主義國家才存在着敵對的階級矛盾，在蘇聯則是沒有的。其實，如果這樣下去，他們不僅不懂得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連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也不會懂。總之，按照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階級矛盾的觀點

推論下去，就會連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也完全不懂得。

我隨便舉出一個例子：在我畢業時，一位和我很親近、懷着善意的蘇聯人對我惜別說：“你回到日本之後，想必可以在政府機關中獲得一個待遇優厚的高級職位了。”我當時對他說：“不可能的，我們從蘇聯回去後，日本反動政府和壟斷資本家是不會僱用我們的。”

我這句話說出後，他竟然發怒了。我問他為什麼發怒，他說：“難道日本還不了解我們蘇聯的教育水平高嗎？”他居然以為日本政府和大企業不僱用留蘇學生，是由於看不起蘇聯的教育水平。於是我就向他說明，日本階級矛盾的情況是這樣的，對共產主義者的看法是這樣的，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優秀人物，不管你的技術多麼高超，只要被貼上“紅色”的標籤，不要說不會聘請你就職，就連已有的飯碗也會保不住，何況是在被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受教育而回國的人，日本的壟斷資本家和反動派更是不會僱用的了，日本是在進行着極其激烈的階級鬥爭，我無論怎樣對他說明，他還是不明白。

學校當局對日本的想法——反對日本 駐蘇大使來校事件

佐久間：日“韓”會談時，我們在莫斯科的學生，為

了聲援正在鬥爭的日本人民，在學校內張貼反對日“韓”會談的標語，舉辦了有關的展覽會。我們書寫的標語有“打倒佐藤內閣！”“粉碎日‘韓’條約！”等，這些口號是用俄文寫的，張貼在學校中。

荒謬的是，這時學校當局竟邀請日本駐莫斯科大使到學校來和學生舉行座談。我們就說，日本大使是日本反動政權的走卒，我們和他從來沒有關係。在這個時候開這樣的座談會，我們不參加；如果你們非要我們見，那我們不得不就日“韓”問題向這個日本反動派的走卒採取抗議行動。我們將這個意見通知學校當局時，學校方面立即對我們說：邀請日本大使到學校來，完全是爲了我們大學的畢業資格還未被日本政府承認這個問題。請代表日本政府的大使到學校來，第一是要他參觀一下學校的設備和教學，讓他了解這所大學的教育水平有多高，讓日本政府能承認這個大學的畢業資格；第二，比你們早畢業的學生回國後，就職不穩定，所以我們委托大使，希望他對本校即將畢業回國的日本學生，在就業問題上給予多方關照。我們聽了學校的解釋，簡直要笑出來，校長的“心意”，我們十分了解。可是我們的前途問題，牽涉到階級鬥爭的本質。這一點，我們的校長可說是完全不懂。但是，校方強調已請了日本駐蘇大使來校參觀，就下令我們把那些介紹日本人民反對日“韓”會談的展覽品和標語，統統取消。

我們堅決拒絕除下那些標語，拒絕收起展覽會的展品。結果，在日本大使到校的前一天夜晚，校方竟出動一幫共青團員，將全部展品收了起來。這一來，日本學生幾乎全體動員，當天就到校長辦公室外示威抗議，反對大使來學校，要求大學當局立即發還展覽品。由於這次激烈的示威，日本大使終於沒有來成。事後，學校當局竟對日本學生會作了“嚴重警告”的行政處分。日本學生立即舉行了學生大會，反對校方的處分。爲了這件事，日本學生和校方進行了多次交涉。這個事例可以證明，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消滅了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國家才有階級鬥爭的說法，實際上是表明他們的領導人根本就不懂得階級矛盾。他們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階級鬥爭的謬論，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流毒，邀請日本大使到學校訪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足立：這位校長，在蘇聯來說，也算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同時也是黨的領導人。他使人感到是一位真正的老好人。他雖然有大學校長的頭銜，但只要是不涉及政治，可說是一個非常容易接近的人。然而，一旦臨到他以公務的校長身份來同我們在政治問題上打交道的時候，那我們真感到實在是太差勁了。因爲他是脫離開階級觀點來考慮問題的。蘇聯人，特別是普通勞動者，一般的都較直爽、樸素。可是那種直爽、樸素如果脫離開階級性，不就跟資本主義國家中那種叫作好人的人沒有什麼兩樣了嗎！

蘇聯的政治笑話

這兒沒有什麼“真理”喲！

在莫斯科的街角上，有零售報紙的小舖子。一個男人走過來問：“請給我一份《真理》。”

小舖子的老太婆把頭一扭，說：

“這兒沒有什麼‘真理’，有的只是‘消息’（政府的報紙）。”

為了社會主義……

威爾遜、約翰遜、勃列日涅夫、諾沃提尼同乘一架飛機。但是，這架飛機的引擎在中途發生了故障，所以把重的行李都投下去了。儘管這樣，還有危險。這時，首先是威爾遜喊了一聲：

“爲了女王陛下！”就跳下去了。緊接着，約翰遜喊了一聲：

“爲了自由和繁榮！”也跳下去了。

最後，勃列日涅夫看了一眼，喊了一聲：

“爲了社會主義！”就把諾沃提尼推下去了。

三、蘇聯的對外政策——援助越南 和敵視中國

新谷：現在讓我們轉換一個話題，就越南問題來談談吧。我們留蘇期間，美國開始轟炸北越，而且，轟炸規模逐步升級。在蘇聯有許多越南學生，我們也和他們一起堅決地進行了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鬥爭。

到美國大使館前舉行抗議示威 的隊伍遭到大鎮壓

新谷：越南學生很快就得知美國開始轟炸北越的消息，於是立即呼籲大家說：“美帝國主義已經開始轟炸北越。讓我們舉行示威游行，請大家給予合作！”日本學生和各國學生都分別走出校門，到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前舉行激烈的抗議示威。可是，蘇聯當局竟對我們進行了非常殘酷的鎮壓。爲了阻止我們到美國大使館前示威，蘇聯出動了騎警隊乃至正規軍，在街道上如臨大敵般築起了街壘。而對那種衝破街壘進入使館區貼抗議標語的行動，則進行血腥的鎮壓。而且，下令馬隊全速衝向示威

隊伍，當場造成重傷，血花四濺。這種頗為激烈的示威游行舉行了兩三次，蘇聯當局每次都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從此以後，蘇聯當局採取了這樣的態度：不准許所有這種類型的示威游行，並且全面地加以禁止；如果再舉行反對轟炸北越的示威，就將所有參加者一律逮捕。蘇聯當局原本就不許舉行這種示威，以前不過是採取默認態度而已。

蘇聯當局對越南留學生施加壓力

新谷：這只是莫斯科發生的情形，在列寧格勒，鎮壓就更加兇狠了。列寧格勒並無美國的外交機構（後來根據美蘇簽訂的領事協定，美國決定在列寧格勒設領事館——譯者）。

這樣，在美帝轟炸北越已經開始的時候，在列寧格勒留學的越南學生們，決定舉行抗議集會，希望蘇聯方面批准在廣場舉行集會，蘇聯當局也許可了。這一天，越南學生到廣場開會，這是在得到蘇聯當局批准之後採取的行動。但實際上得知一批美國遊客坐的公共汽車，恰恰在相同的時間也要通過廣場。蘇聯當局感到很為難，臨時取消這個已經許可的抗議集會。結果蘇聯當局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將越南學生包圍起來，並一個不留地捉上汽車，帶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而且直到美國遊客

通過廣場到了什麼地方之後，才將這些學生釋放出來。越南學生當然抵制警察的非法逮捕，這一來就遭到警察的毒打，許多人受傷。

足立：從這樣的事實可以看出，按照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的說法，要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採取聯合行動，反對美帝國主義，是多麼的荒謬。我們通過這個事例，立刻明白了要反對美帝，不可能和蘇修“聯合行動”。

蘇聯認為美帝國主義比越南人民更重要

新谷：從這一個具體事例看來，蘇聯政府是真的支援越南人民，還是更重視美蘇和平共處路線？顯然，蘇聯是站在美帝的一邊的。它爲了不使和美國的關係發生哪怕一點點的損害，是悍然動用了武力的。而且，這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寧可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進行鎮壓、逮捕。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做法，從根本上顛倒了敵我關係，它以友爲敵，以美帝國主義爲友。從這一件事上也可以知道，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竟要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組織反對美帝的統一戰線，實際上是單相思（笑聲），根本不符合蘇聯的實際情況。它只不過在隨意解釋，主觀臆測罷了。

佐久間：那是宮本的痴心妄想。

宮本集團爲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辯護

新谷：由於宮本修正主義還未能執政，它的錯誤方針還未能引起十分嚴重後果，但是，蘇聯黨竊取了國家的權力，造成的後果就極其嚴重了。他們顛倒敵友關係，他們可以把他們擁有的巨大的火箭和軍事力量，從朝向那裏轉而朝向這裏，他們是真會殺人的。蘇聯黨的變質，和日本共產黨變質的影響不同。蘇共的變質，不僅對蘇聯本國人民造成可怕的危害，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也犯下了罪該萬死的嚴重罪行。對此，宮本修正主義集團還說：“現在蘇聯共產黨有了某種修正主義的傾向，但依然是‘瘦死的駱駝大於牛’，不能對列寧創造的共產黨，用極端的言詞將它罵臭，它仍然有好的地方。”這種說法正是不折不扣的爲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塗脂抹粉的謬論。

足立：二月四日的文章（註一）說什麼美帝侵越固然是出於它的侵略本性，但是美帝轟炸北越，與其說起因是它的侵略本質，毋寧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團結造成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不團結造成的。問題的本質是：蘇聯的黨和國家領導機構，已經被反革命分子所篡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和美帝聯合起來，背叛了世界人民。這件事情，特別是對蘇聯人民來說，對蘇

聯的社會主義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堅持革命的中國和背叛了革命的蘇聯之間，當然談不上什麼團結。宮本集團不把責任放在蘇聯修正主義身上，而放在這個“不團結”上，企圖找煞問題的本質，把責任推給中國。

新谷：例如中蘇大論戰一開始，蘇聯就把駐在東德的大量軍隊調到中蘇邊境，虎視眈眈，竭盡軍事威脅之能事；另一方面，同美國却默契將德國問題凍結起來。當中印關係惡化時，蘇聯立即以大量武器援助印度軍隊，慫恿印軍入侵中國。宮本修正主義對這些每天每天都發生的大量事實視而不見，恰恰說明它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辯護士。

這次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更是再清楚不過的了。照常識判斷，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蘇聯竟毫不猶豫地出兵，侵佔了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會這麼硬幹，正是出於現代修正主義的本質。它的政策就是那樣地在推行着。在繼續進行論戰的時候，在實際行動上却要統一，這樣的事（笑聲）蘇修是不幹的。他們的理論是見諸行動的。宮本顯治倒是幹得出言行不一的勾當的。

事實說明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新谷：宮本集團用謊言代替事實，遮人耳目，使口

本的共產主義運動走上了邪路。革命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問題。如果將敵友倒置，後果會怎樣？這已經是無須討論的了。從蘇聯的實際情況中，可以舉出成千累萬的實例來證明。宮本修正主義集團說可以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採取聯合行動的唯一論據，是蘇聯在援助北越。關於這一點，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留學生，都曾經異口同聲地這樣說。

蘇伊士運河事件上蘇聯提供的政治援助 和對越南的援助的差別

新谷：還是布爾加寧當蘇聯總理的時候，英帝國主義和法帝國主義藉埃及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的問題挑起了出兵埃及的事件（註二）。當時還有一點點好的地方的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政權就恫嚇英法兩國說，倘若你們進行侵略，我就要用火箭進攻你們。這樣一來，英法終於打消了出兵的念頭。資產階級報刊曾經喧囂一時，說這是蘇聯的威脅外交。把那時候的問題細細一想，就會了解，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不光是經濟援助、軍事援助。英法要出兵埃及時，當時的蘇聯並沒有給埃及一分錢，沒有給它一枝槍，也沒有援助一發子彈。可是，進行了政治援助，就是表示了堅決制止侵略的態

度，因此就一分錢不花地對阿聯人民提供了極巨大的國際援助。在越南問題上，也一樣。而宮本顯治之流却說什麼實際上蘇聯送去了炮彈，所以不是好事嗎？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蘇聯如果本身不變質，對美國侵略北越就會採取堅決的反對態度，把對北越的侵略看作是對自己的侵略。只要採取這種堅定的政策，這就比給北越幾萬枝槍或導彈不知有效多少倍。因為北越和埃及不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現在蘇聯進行假援助，一面却大吹特吹。實際上是和美帝國主義勾結，雙方取得默契，讓德國問題凍結起來，於是，蘇聯自東德抽調軍隊到中蘇邊境，美國也自西德抽調兵力到南越戰場去。蘇聯這種行徑，實際上是從另一方面援助美國侵略越南。

去年夏天，一架滿載侵越軍隊的美軍運輸機侵犯南千島的領空，蘇聯把它扣留了一小會兒，又立即釋放了（註三）。這個事例，又一次生動地證明：蘇聯領導人在衡量美帝和越南時，總是毫不猶豫地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行動的。

宮本修正主義集團對援越的看法，完全是經濟主義的觀點，他們對任何事情作出判斷，都要算一筆經濟賬。這些傢伙現在還從這個觀點出發，在搞什麼幾萬日元的募捐。可是，現實的世界政治並不是靠錢來解決問題的。

以日本為例，佐藤政府正在把日本的基地供美軍作侵略越南之用。日本人民不容許他們這樣作，並進行鬥爭，這就比募捐幾億日元送到越南去有更大意義。這是用金錢無法計算的巨大援助。蘇聯果真要援助越南，就應該停止目前這種騙人的“援越”障眼法，採取堅決不許侵略越南的立場和態度。

佐久間：美國在全面開始轟炸北越之前，恰巧柯西金到河內訪問。柯西金在河內曾公開宣佈：北越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成員，對北越的攻擊就是對蘇聯人民的攻擊，我們決不坐視。蘇聯將對攻擊進行堅決的反擊。不料他的話，語音未落，美國就開始全面轟炸北越了。這對柯西金來說，對蘇聯來說，是大失面子的事情。當時，我們外國留蘇學生自動起來舉行反對美帝轟炸北越的示威，以為蘇聯當局一定支持，並且會發動蘇聯羣衆參加。因為這件事情不僅我們憤慨，想必蘇聯人民也是憤慨的。但是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當我們示威時，蘇聯人竟質問我們說：“你們為什麼要在蘇聯搞這種示威？”

我們立即反問他們：你們為什麼不在蘇聯舉行示威？光舉行示威還不夠，你們的部長會議主席不是明確地說過，美國對北越的侵略得視為“對蘇聯的戰爭行為”嗎？為什麼你們對待示威的羣衆進行血腥的鎮壓？誰知他們竟這樣回答：“你們這種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前示威

的行動，不能把美帝國主義怎麼樣，所以蘇聯工人不喜歡示威。我們認為蘇聯工人與其參加示威，不如在機器旁多作些工作，對越南多一點物質援助。”

這種說法是徹頭徹尾的從物質主義出發，用金錢來衡量一切；而對人民羣衆採取的政治行動加以徹底的鎮壓。當全世界對蘇聯鎮壓留蘇學生的暴行發出越來越多的譴責時，蘇聯就慌忙地吹噓它“正在進行援助”，但是，給火箭也好，給別的什麼東西也好，一概沒有收到效果。

蘇聯當局竟審查越南拍攝的 新聞紀錄影片

佐久間：在美軍轟炸北越期間，北越拍攝了不少新聞紀錄影片，那是越南人民使用原始武器和用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與美帝戰鬥的真實紀錄，也有各國人民舉行抗議示威，反對美帝侵略越南，表示支援越南人民鬥爭的實況鏡頭。但是日本學生在莫斯科各國人民友誼大學舉行支援越南人民的政治集會要放映這些影片時，事前却受到蘇聯當局的無理阻撓。我們要求放映影片，學校當局就出來說話，要對影片加以審查。我們說這些影片是在越南拍攝的，是從越南大使館借來的，實在沒有審查的必要。可是學校當局堅持一定要審查，並聲言“這是

我們的義務，非審查不可”。

爲什麼蘇聯要審查北越的抗美援朝紀錄片呢？只要一看影片的內容，就一切都明白了。原來影片中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盛大的羣衆示威場面。各地示威羣衆人數一天比一天多，援越反美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漲，出現了許多激動人心的情景。影片中也有日本人民阻止美國核潛艇停泊的鬥爭。這種種的政治鬥爭和羣衆運動的場面，反襯出蘇聯的援越場面是冷冷清清的，毫無力量的，連一個羣衆示威的場面也沒有。本來就沒有嘛，叫人到哪裏去拍攝呢？如果想要有的話，只能是騎警衝散外國學生的示威隊伍的實況。所以，影片中只有柯西金在河內同胡志明擁抱的一個鏡頭。觀衆看到時，都不禁啞然失笑了。經過蘇聯的審查，影片中凡是不利於他們的鏡頭統統都剪去了，這是犯罪行爲。

有很多鏡頭描寫越南人民用步槍擊落噴氣式飛機的情景。這當然是對蘇聯大肆宣傳給越南大量現代化武器的極大諷刺，表明蘇聯的援助是何等地虛偽。因此，蘇聯當局就不許可這樣的影片放映。他們一貫大肆宣傳：“我們向越南送去了火箭武器。”

外國留學生就故意問蘇聯學生：你們援助北越的火箭，到底在什麼地方使用過？他們說：“現在還未曾使用，但是河內的周圍已完成了蘇聯火箭的防空網。你們看，美國炸了許多地方，偏偏沒有炸河內，就是因爲蘇聯火

箭保衛着河內的緣故。”但是，等到美機後來轟炸河內時，我們又問那些蘇聯人：“蘇聯的火箭到哪裏去了？”他們無言以對了。蘇聯援助北越的虛偽宣傳一次又一次被事實揭穿，一再被事實所駁倒，但是蘇聯當局還是要千方百計地辯解。

逼人說“感謝蘇聯援助”

原田：蘇聯援助越南，實際上是虛偽的，當這一事實一再被揭露之後，蘇聯竟說：“我們是送了許多火箭給越南的，但是由於越南人沒有使用過這種現代化的武器，所以他們不懂得使用方法。”（笑聲）

更可惱的是，蘇聯當局竟要我們學生在舉行援越政治集會時，每人在講話中都要加上這樣一句台詞：“越南在蘇聯的大力援助下，正在取得抗美戰爭的勝利。”蘇聯代表在講話中，更是從頭到尾，反反覆覆宣傳蘇聯的援助。這樣的集會實際上已經不是聲援越南人民的大會，而成了宣傳蘇聯援助的集會。

而且，如果外國學生講話時一字不提蘇聯的援助，事後就會被學校當局召去，對他提出警告。我們日本學生代表就是有意識地不提蘇聯援助，我們當時是這樣講的：“我們對越南不應該單單是同情者或援助者。越南人民的鬥爭是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份，越

南人民的鬥爭就是我們自己的鬥爭。我們不是越南人民的同情者，而是同一條戰綫上的戰友。現在正是我們和越南兄弟攜起手來，共同使全世界的反美鬥爭的火燄更加熊熊燃燒的時刻了。”我們常常因爲一字不提“蘇聯的援助”，而在事後被蘇聯當局多次召去訓斥。

新谷：方才說的是這麼一回事。柯西金爲了要在莫斯科召開那個衆所周知的臭名遠揚的三月協商會議（註四）、跑到平壤和河內去游說。越南拍攝了剛才說到的用原始的高射炮和步槍大打美國飛機的影片，還拍了東京灣事件發生後全世界人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支援越南的影片。這些影片中沒有蘇聯支援越南鬥爭的鏡頭。我們是在莫斯科看到這些影片的。大家對於影片反映了蘇聯沒有提供援助這一點，評價很好。實際上，蘇聯沒有援助，越南再想拍下有關鏡頭也無法辦到。蘇聯對放映這些影片非常惱火。爲什麼？因爲用那樣子的粗劣的老式武器打仗，就等於是在問蘇聯的援助在哪裏。蘇聯方面說，故意拍攝一部用那種粗劣的武器打仗的影片，是對蘇聯的惡意中傷，因此施加了非常大的壓力，不讓影片放映。

蘇聯政府不僅對越南人民實行叛賣，它對世界上所有爲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而鬥爭的人民，都是採取這種罪惡的叛賣行爲的。我們大學中包括日本在內的八十多個國家的學生，都面臨着這個問題。

日本的國內政治制度，算是比較穩定的。其他的國家的學生在留蘇期間，則是不知什麼時候自己的祖國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生政變或爆發革命等事情。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發生反革命政變後，蘇哈托—納蘇蒂安政權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的關係，不是惡化，反而比以前更加緊密了。

蘇聯在一系列問題上，包括越南問題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以及各國在蘇聯的留學生對此採取的態度，關於這方面的例子，由於我們每天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這裏，只能選一兩個典型的來談談。

日本留學生明白了聯合行動的虛偽性

原田：首先，在越南問題上，特別使日本學生對蘇聯的想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蘇聯政府對於勇敢地進行了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的日本學生，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美國全面轟炸北越後，日本學生和外國學生立即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前舉行了示威。示威剛完畢，蘇聯校長就把日本全體學生召去，用粗魯的語言斥罵我們。他說，在蘇聯國內舉行這種示威，真是豈有此理。如果想要支援越南人民的話，就拿錢出來買些坦克和飛機送給越南。如果認為這樣還不夠，就可以自己扛起槍到越南去，明天就去，蘇聯可以為你們準備赴越南的飛機。假

如你們做不到這些，却要在蘇聯國內，尤其在美國大使館前搞那些示威，簡直就是荒謬透頂。

這個蘇聯校長隨即宣佈，要對這次參加示威的日本學生給予處分，包括最高的行政處分——停學。

由於一再受到蘇聯的迫害，每一個日本學生從切身體會中深刻地懂得了這個道理：在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綫中，絕不能包括蘇聯。日本學生通過實踐，認識了蘇聯的權力已被現代修正主義者所掌握，蘇聯早已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倒不妨說，蘇修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敵人。這種種事件打開了我們日本學生的眼界，使我們懂得了現代修正主義是什麼東西，使我們得到了有益的經驗，懂得了和現代修正主義根本不可能採取什麼聯合行動，而只有和他們鬥爭並粉碎他們，此外沒有別的道路。

把印尼留學生引渡給蘇哈托反動政府

足立：我還可以舉出蘇修叛賣革命人民的最典型例子，那就是印尼問題。我在蘇聯留學期間，一九六二年夏季，印尼發生了西伊里安問題，還發生了加里曼丹的紛爭，一些印尼學生準備組織示威，並要求其他國家學生參加。日本學生準備了標語，決定聲援印尼學生，一切都準備就緒了。但是臨到舉行示威的前夕，蘇聯的中

等和高等教育部部長下令不許示威。當時是一九六二年秋，中蘇之間的公開論戰還未爆發，不過種種疑團已經出現，當時我就覺得蘇聯的做法很怪。當時我們認為，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留學，而且莫斯科就是世界的革命聖地。可是為什麼不許印尼學生示威呢？這件事使我們想了許多問題。首先是對蘇聯當局的做法，加深了懷疑。我就是從這件事上開始懷疑蘇聯的。而一般的人是不會想到這些的。那麼，怎樣來說明蘇聯當局的做法呢？當時還以為蘇聯當局這樣做，大概是顧慮到英蘇的外交關係。

那個時期裏，蘇聯當局還只是幹到那麼個程度。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就在九·三〇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印尼法西斯政權的外交部長馬利克，竟受蘇聯政府的邀請，到莫斯科來訪。我們當時還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至少屠殺了數十萬印尼共產黨員的外交部長，偏偏在這種野蠻行為正在繼續搞着的時刻受到蘇聯政府的邀請，跑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呢？而且，當印尼留蘇學生在莫斯科機場示威，對馬利克的到達高呼“馬利克滾回去！”的口號時，竟然遭到蘇聯警察的鎮壓。

馬利克的到訪，正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節的前後。印尼學生在游行時高呼“馬利克滾回去！”又立即遭到蘇聯警察的制止。類似這些事情，竟然發生在蘇聯，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佐久間：那時，印尼留學生就明確地說：蘇聯領導人居然用印尼人民的鮮血和印尼法西斯主義者一起乾杯了。

足立：如果僅止於此，倒也罷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蘇聯政府竟將印尼的畢業生直接從莫斯科送回印尼。這些印尼學生是從蘇聯回去的，命運到底如何，我們不清楚。蘇聯學校當局對印尼學生說，凡是要離開蘇聯的學生，學校當局只為他們準備直達印尼的飛機票。蘇聯這樣做是害怕這些學生不回印尼，而到中國或北越去。印尼學生和其他外國學生當然反對這種做法，並聯合起來向學校當局進行鬥爭。那些印尼學生一回到雅加達，就可能被抓起來，全部殺害。看到這種情形，和我們一起鬥爭的印尼學生說，在他們看來，現在的蘇聯政府究竟是敵人還是友人呢，確是一個問題。除了把蘇聯政府當作敵人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選擇了。宮本修正主義集團却說什麼要和這些傢伙搞聯合行動。

拋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蘇聯

足立：蘇聯修正主義對印尼問題、對越南問題、對世界革命運動的態度，可以從各個角度加以批判。一言以蔽之，今天的蘇聯，已經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了世界革命的觀點。我認

爲，即使蘇聯在經濟上有了無論多大的發展，也決不會到達共產主義。歸根結底，只有全世界人民起來打倒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全世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那個時候，蘇聯也才能進入共產主義建設。蘇聯是和世界革命運動不可分割的。越南人民在浴血奮戰，不真正給予援助是不行的。列寧也曾指出過，第一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應該對世界革命運動作出重大的犧牲。應該這樣做。可是今天的蘇聯當局完全不是這樣，根本沒有把越南問題和本國的共產主義建設任務聯繫起來考慮的觀點。因此，它認爲，只要在越南把戰火撲滅下去就是達到了目的，越南人民贏得勝利，實現解放，則可以不管。因此，它的援助，根本不是真心的。相反却是壓迫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不讓鬥爭開展起來，而要人民去和美帝國主義會談，達成妥協。

佐久間：蘇聯有不少人把越南人民看作是可憐的人，說越南人民成了殘酷的戰爭的悲慘的靶子，因而一再強調要結束這場戰爭。他們根本沒有要使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獲得勝利的觀點。一點火星會引起一場世界戰爭的思想牢牢地束縛着他們。他們的想法是：蘇聯已經不存在敵對的階級矛盾，只要沒有戰爭，再經過幾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就可以達到共產主義。如果爆發戰爭，那一切都會成爲空想。所以他們害怕戰爭到極點，不管是正義戰爭，還是非正義戰爭；而這種思想已經廣

泛地滲透到蘇聯的羣衆中間去了。世界上無論哪個地方的人民拿起武器求解放，蘇聯當局就嚇得不得了。世界人民一旦起來拿起武器進行解放戰爭，就一定遭到蘇聯的破壞。雖然他們還不得不作些給予軍事、經濟援助的姿態，實際上他們非常不願意這麼做。我們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亞、非、拉美許多國家的同學，都聽到過蘇聯方面這樣清楚地當着我們的面說過：“爲了援助你們，我們的共產主義建設可就拖延了。”蘇聯陷入了經濟主義的泥坑，喪失了重政治的觀點，拋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不再能從世界革命的立場上去考慮共產主義建設。因此，像前面講到的那樣，他們是什麼都靠金錢援助，藉以進行欺騙。

在以色列侵略問題上出賣阿拉伯人民

佐久間：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國家後，蘇聯政府立即將問題提交聯合國，要求談判解決。阿聯方面事前已覺察到以色列馬上要發動戰爭，就動員起來準備一戰。蘇聯連忙通過外交機構向阿聯施加壓力，要阿聯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動手，說是如果以色列先發制人，蘇聯就會立即將問題提到聯合國。結果使阿拉伯國家喪失了主動地位，任憑以色列發動閃電進攻。阿聯四百架戰鬥機整排地排列在機場上，還沒有來得及起飛就被以色列空軍

炸毀，空軍頃刻之間被全部消滅。

事後蘇聯千方百計隱瞞這一事實真相，在蘇聯國內還說什麼戰爭一開始，阿聯方面首先擊落以色列飛機三十架，又說蘇聯已將問題提交聯合國，並正在加強援助阿拉伯國家。

但是，在莫斯科的阿拉伯學生逐步明瞭事情真相後，對蘇聯的做法感到無比的憤怒。阿拉伯學生原本是各國人民友誼大學中最親蘇的一派，這時他們再也按捺不住，公開指責蘇聯的叛賣行為。於是，蘇聯發動了誣衊誹謗阿拉伯國家的宣傳攻勢，以擺脫自己所處的窘境。說阿拉伯國家的政府缺乏效率，說阿拉伯軍隊紀律鬆弛，腐敗墮落。這樣的軍隊，即使有蘇聯援助的飛機和坦克，也沒有戰鬥力，竟然一彈未發就被以色列軍擊潰，以致白白糟塌了蘇聯的援助。蘇聯叛賣阿拉伯國家於前，又誣衊、誹謗這些國家於後，這種行徑說明，他們已經一絲一毫也沒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觀點了。

蘇聯不報道拉丁美洲的武裝鬥爭

佐久間：蘇共領導對拉丁美洲相繼發生的武裝鬥爭，也是深惡痛絕的。在格瓦拉被害的時候，蘇聯的報紙就格瓦拉問題登了一點點虛應故事的消息，進行搪

塞，以後就什麼也不報道了。舉個例子來說，我有一次到地方上去，非洲的朋友們把一家法國雜誌上登的格瓦拉的照片拿給當地一所大學的共青團員看，竟沒有一個知道格瓦拉其人。他們問格瓦拉是什麼人。我們想，至少總該知道格瓦拉是古巴的領導人吧。可是他們連這一點居然也不知道。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爲蘇聯當局不願意讓人民了解拉丁美洲武裝鬥爭的實際情況，有關消息幾乎完全不予報道。

五年前，委內瑞拉游擊隊的武裝鬥爭已發展到形成國內統一戰線的規模，力量越來越壯大。但是，委共總書記這時從監獄中釋放後，立即去蘇聯，一面療養一面和蘇聯方面接觸，終於變成了一個修正主義者。他下了指示，要本國的共產黨走和平過渡的道路，說武裝鬥爭不符合委內瑞拉的實際情況，是極“左”的機會主義路線。他提出方針說：我們現在處於進入議會和平地展開鬥爭的時期。這樣，由委內瑞拉共產黨領導、深入山區活動的大部份游擊隊，離開了山區根據地，走下山來。游擊隊一暴露了據點，就失去了力量，被反動政府軍隊一次包圍總攻擊，遭到了很大的損失。

這個事實，說明蘇聯修正主義者不僅不支援各國人民的鬥爭，反而非常害怕它會發展成爲世界大戰，因此千方百計地撲滅各國人民的武裝鬥爭的火燄。這一點正

是蘇聯修正主義者的一大特徵。

因此，現代修正主義向全世界擴張，使很多的黨的領導層變了質。同時，必然有立志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共產黨人起來拋棄那些修正主義者，成立新的、真正的先鋒黨和革命左派，這就是今天世界的總趨勢。我們大學的各國畢業生，有不少人回到祖國後成為革命的左派，重新組織新的革命力量。這些人正在認真地考慮着怎樣進行本國的革命。現在還追隨修正主義的那些人，已墮落到連口頭上講政治或革命都討厭的地步。這是一個很大的特徵。

足立：黑海沿岸有個叫做瑪卡布塞的地方，我們學校在那裏設立夏季的“休養之家”，我也去參加了。那裏舉行了一個關於越南問題的集會。由於是蘇聯方面舉辦的，到會羣衆不多。因此他們就從附近的少先隊夏令營動員了許多小學生前來參加。結果，這次援越集會完全走了樣。阿拉伯學生中親蘇的人多，他們不斷在會上呼口號：“感謝蘇聯的無私援助！”蘇聯方面本以為這樣一來，我們也會跟着喊，可是誰也不喊。於是，那些少先隊員在台下就跟着喊。整個會場變成了“感謝蘇聯”的集會。在蘇聯組織的支援越南的集會上，阿拉伯學生基本上都要扮演吹鼓手，為蘇聯的援助大吹大擂，喊一些“堅決支持蘇聯政府的方針！”“感謝蘇聯的援助！”的口號。

連經濟地理教科書也把蘇聯 “援助”寫進去

足立：蘇聯的經濟地理教科書上，記載着世界許多國家的經濟和地理情況，例如談到委內瑞拉，教科書上介紹這個國家的資源情況，哪一種工業最發達等等，這方面和其他國家的地理教科書是一樣的。但是，蘇聯教科書却有一個與衆不同之處，就是在對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地理介紹之後，一定要詳細寫上蘇聯給這個國家多少價值的援助。在寫到非洲國家時，那就更熱鬧了，課文中記載着哪個工廠、哪個企業、哪座醫院是在蘇聯援助之下興建的，筆筆細賬，一筆不漏。對日本的援助，倒是一字不提。（笑聲）

作為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贈給人一點東西，總是盡量使對方不要爲此感到過意不去（笑聲），絕對不要求人家感謝自己。蘇聯在對外國援助上，許多是硬要人家接受的，等到人家接受後，蘇聯就認爲“你非得感謝我不可”，你不感謝，也要叫你說“感謝”。

蘇聯“援助”印度的成就

佐久間：考試時也必然要出這類試題。例如關於印

度問題的試題，除要求回答印度的資源、產業等情況之外，還規定學生必須回答蘇聯對印度提供了多少援助，修建了哪一條堤壩，蓋了哪一座工廠。你不回答，就不給你分數。在我們看來，最近印度的壟斷資本正在發展；但是蘇聯的課本上却說印度是正向着“非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的一個典型國家！它又說印度的國民經濟，在蘇聯的無私援助之下，已取得重大的成就。然而印度現實情況是，今天絕大多數人民還掙扎在飢餓線上。蘇聯的援助絲毫沒有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恰恰相反，蘇聯和美國競相援助，幫助了印度的大資本家，結果使印度產生了壟斷資本。而且蘇聯鑑於美國對印度提供比自己多得多的援助，也就對印度的壟斷資本和反動派增加了大量援助，包括送上武器，用來反對社會主義中國。因此，我們對試題中關於蘇聯援助部份，一句也不回答。日本學生在這種場合下，還可以免受追究，但那些多少受到蘇聯“援助”的國家的學生，就非得回答這些問題不可。

以“恩人”自居激怒了非洲學生

佐久間：對非洲國家，蘇聯竟說，你們國家今天之所以能够建立，全靠我們蘇聯的援助。在我們班上，非洲同學對這種說法大為反感，毫不含糊對蘇聯教師說：

“我們國家由於帝國主義的長期壓迫，獲得解放還不久，因此我們仍然很窮。如果拿人來譬喻的話，假設我是一個窮人，我連衣服也沒得穿。你給我一件衣服，我很高興，認為你够朋友。但是我穿着你給的衣服在街上行走時，你却指着我的衣服，見人就說：‘他的衣服是我送給他的！’即使這件衣服對我非常必要，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脫下來扔到陰溝裏去。”

在非洲同學理直氣壯的陳詞面前，那個蘇聯教師窘得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原田：有一個日本同學的經濟地理教科書，發現裝訂有錯，無法使用，就拿著這本書找教師商量。蘇聯教師就把教科書的校樣借給他，要他自己根據校樣整理。這個校樣是根據教師寫的原稿初步印刷後並送上級機關審閱的。我們在那校樣上看到許多紅筆勾劃的增刪地方，只見上頭滿滿是上級用紅筆寫的“在蘇聯援助下”的字樣。本來在那教師的原稿上就已經寫了不少“蘇聯的偉大援助”字樣了，上級還嫌不夠，又加了許多。真叫人為之氣憤不已。

古巴事件時的“援助”

新谷：我去留學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當時發生了加勒比海危機。在這次事件中，蘇聯對美國如何卑躬屈

膝、百般讓步的態度是世人皆知的。但是事件過後，蘇聯又無恥地吹噓它的熱核武器的威力，竟說古巴這個國家能够維持生存，古巴人民之所以能够活下來，完全是靠蘇聯熱核武器。如果蘇聯沒有原子彈、氫彈，古巴早就被美國消滅了。古巴學生聽到這種說法，當然十分氣憤。古巴革命政權能够存在，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首先是由於古巴人民所表現的反對侵略和敢於鬥爭的精神。外國的援助無論多大，也只能通過古巴人民的內因才能發揮作用。但是蘇聯却認為並非如此，在許多演說中硬說全靠蘇聯的熱核武器，阻止了美帝的侵略，古巴人民全靠蘇聯才能生存到今天，因此古巴人民應該感謝蘇聯的援助。

已有固定內容的蘇聯式 “支援各國人民集會”

足立：在蘇聯，如果是由當局出面舉辦什麼支援外國鬥爭集會的話，其內容一定是宣傳蘇聯的援助，要對方國家感謝蘇聯；蘇聯的新聞影片在紀錄這類集會時，也是從頭到尾吹噓這一套。

原田：在這類集會上，外國學生的大會講稿，搞得最兇的時候甚至由蘇聯方面包辦，事前即已寫好，臨時叫他上台照讀，以表達對蘇聯的感激。蘇聯這麼幹，已

經是滿不在乎了。

佐久間：我們外國學生進入各國人民友誼大學，先要在預科學一年俄文。蘇聯學生在第一年則選讀英語、法語或西班牙語。爲了提高會話能力，這些蘇聯學生都和外國學生一起住宿。蘇聯同學在快要畢業或畢業後，就被派到各個國家去。蘇聯就把這叫作技術援助或者什麼別的援助，並大肆進行宣傳。可是，在莫斯科的外國學生，深知這些蘇聯學生的底細，對蘇聯政府這樣的做法非常不滿。一些外國同學都在背後竊竊私語：“我那同房間的蘇聯人居然到我的國家去當什麼高級專家了。那傢伙的水平實在有限，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笑聲）

爲了滿足私欲， 蘇聯學生希望被派到國外去

佐久間：僅僅是這樣也還罷了，這些傢伙被派到國外，就可以拿到比國內高得多的高薪，而且是外鈔，這樣他們就可以用外匯在西歐買許多在蘇聯買不起的東西，帶回國去顯威風，擺闊氣。他們還從外國買小汽車回去。在蘇聯，小汽車不但因爲貴而買不起，而且要登記排隊，不等一年是買不到手的。總之很難買到。但如果是用外匯，馬上就可以買到。

有一次，一個學生到外國充當“高級專家”後回國，帶了一輛汽車回來，有些同學就問他：“你這輛車是哪國給你的援助？”（笑聲）在同學之間，俄語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МОЩЬ 即“蘇聯援助”已成為別有含意的雙關語。例如一個同學說：“喂！你來，我給你一點好東西。”另一個就會說：“什麼好東西，還不是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МОЩЬ（‘蘇聯援助’）啊！”這就是說，“蘇聯援助”只給人家一點小恩小惠，却宣傳得天花亂墜，又要人家非感謝自己不可。“蘇聯援助”，現在已成為學生之間日常談笑中的慣用語了。（笑聲）

蘇聯和中國對非洲援助的不同

佐久間：我同班的一個非洲同學，原是一個地道的親蘇派。有一年夏天，他乘放暑假之便回非洲，到了好幾個非洲國家，再回到莫斯科後，態度大有改變。有次休息時間，他悄悄對我說：“我這些話在這裏不能大聲講。我這次回非洲後一看，令我吃驚的是，非洲國家這兩年對蘇聯的印象，越來越壞。相反，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却越來越大了。我想過，原因是什麼？原來中國對我們的援助，和蘇聯可說是完全不同的。”

我問他有什麼不同。他說，那些蘇聯技術人員嫌非洲人的房子不堪居住，要求住新公寓。他們還要電冰

箱，每個人要一輛專用小轎車。可是，中國人員完全兩樣，他們堅持和當地人過一樣水平的生活，拿同樣的工資，不要一絲一毫的特殊待遇，而他們的工作量，起碼超過當地人一倍。最初我還不十分相信，以為中國的援助也是為了宣傳，後來才發現我的看法不對。例如在馬里，蘇聯最先給馬里的援助，是建築一座足球場。中國呢，他們的專家到馬里去，首先幫助馬里人學會種植水稻等農業技術，而這是馬里發展經濟最迫切需要的。中國專家在坦桑尼亞、贊比亞協助修建鐵道。他們是真心實意地幫助非洲國家發展本國的經濟。這是真正需要的外援。

他們——非洲國家的人民，都親眼看到：一個是給了一些援助之後，逼着人家說感謝；而另一個却說，不要謝，不要謝，那是我們應該作的。非洲人看清楚了這兩種不同的援助，因此對蘇聯政府的印象越來越壞了。結果，蘇聯的影響就一落千丈了。

這些都是那個親蘇派非洲同學說的事實。

足立：現在蘇聯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根本態度，歸納起來就是：對拿起武器起來革命的世界人民，不顧一切地進行壓制；另一方面却又給一些不像樣的援助，目的則在於宣傳。它以與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什麼兩樣的方式進行投資，目的不是為了幫助那個國家的革命力量的發展，而是助長那個國家的資產階級發展，而且，又借援

助對方，以大國主義的態度一定讓人家感謝自己，並要挾對方聽自己指揮。

如果看不清這一點，還以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總有一天會站到正確的立場上來，或者認為它還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因而對它抱有幻想，這樣去看問題，就會吃大虧。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已和美帝攜手，企圖重新瓜分世界。因此，在同美帝國主義鬥爭時，決不能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結成反美統一戰綫，和他們搞到一起。我們通過切身的感受，已清清楚楚地懂得了這個道理。

在國外過着貴族生活的蘇聯技術人員們

新谷：蘇聯和中國對非洲國家兩種援助的根本不同點，不必從理論上來談，非洲人從現實中已經充分體會到了。非洲同學們對此非常了解。蘇聯的技術專家打着社會主義國家的招牌，實質上和當年白人老爺是一路貨。在要求得到的待遇和其他方面，和白人老爺一個樣。舉例說，他們一到非洲國家，就要求特殊待遇，許多專家在工程合同滿期後也不願回國，千方百計繼續留在國外過其貴族式的生活。他們在國外有高級住宅住，有汽車代步，揮金如土，吃喝玩樂，樣樣俱全。

一九六〇年，蘇聯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得到了痛苦的教訓。中國就以蘇聯的做法為

反面教員，對新興國家的援助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如幫助當地人民種植水稻。這麼做並不是爲了豎一個毛澤東的或中國的招牌，而是爲了教會種植水稻的方法。中國技術人員和當地人同工同酬。他們有的一到非洲就病倒，因爲是在當地氣候及其他條件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工作。援助額的多少是另一問題，單是中國這種真誠援助的精神，就使當地人民深受感動。像馬里等國的非洲學生，他們的祖國同時接受中國和蘇聯的援助。這些學生對兩種援助的差別非常清楚，並常常詳細地說給我們聽。

原田：什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一個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對於正在進行解放鬥爭的人民，從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觀點來看，應該把他們看作是在最前綫作戰的戰士，因此要給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人民不可推卸的國際義務。世界上一切爭取解放的鬥爭，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就是自己的鬥爭，必須堅決地和他們站在一起。

但是，以蘇聯爲首的一些修正主義國家，把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看作是沉重的負擔。因此，他們才認爲“越南人民的勝利，全靠蘇聯的援助”，硬要越南人民感謝自己。當人民的解放鬥爭激烈起來，以致蘇聯和美帝國主義之間發生磨擦，影響到蘇美和平共處體系時，蘇聯政府就向解放運動施加壓力。它給越南的一點點

“援助”，不過是以此爲誘餌，要把越南拉入向美帝投降的路綫上去，使它放棄對美帝的武裝抗戰。這就是用一點點小恩小惠去從根本上破壞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

蘇聯認爲，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正在進行解放鬥爭的人民提供援助是單方面地給予恩賜。這種看法實在荒謬。解放鬥爭勝利，解放區擴大，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擴大，這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就是無與倫比的巨大援助。這樣的觀點，蘇聯是根本沒有的。

中蘇兩國對革命學生的態度的不同

新谷：現在談談蘇聯對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從事獨立解放鬥爭的革命人民，究竟抱着什麼態度。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九·三〇事件後，許多留蘇的印尼學生頓時變成有國難回的流亡者。不僅僅共產黨員是如此，就是那些進步的、參加“納沙貢”（註五）的民族主義的學生也是如此。還有秘魯等一些國家的學生，不顧一切危險，千方百計跑到蘇聯，他們也嘗盡了有國難回之苦，因爲在那些國家中，不管你是修正主義的，還是馬列主義的，一被戴上共產黨的帽子，就是非法分子。如果共產黨員的身份暴露，去蘇聯留學過的情況暴露，就非被抓進監獄不可。

這就是各國人民友誼大學有大量外國學生的緣故。

但是，蘇聯當局對冒險前來就讀的許多外國革命學生，常常以政治上的理由，勒令他們四十八小時內離境。所謂政治上的理由，就是指這些外國學生在他們本國的共產黨分裂時採取了同情左派的立場，而與右派的領導人發生了衝突，或者他們到過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或者手裏有過中國的一些書籍。

蘇聯對那些有國難回的外國革命學生，也以這種理由強迫他們離境，等於置那些學生於死地。而且他們採取這些措施時，冷酷無情，絲毫不講道理。一個人被迫害到這種地步，立刻明白誰是真正的朋友，誰是真正的敵人。因為這是一個生命攸關的問題啊！

一對秘魯兄弟，就是這樣被蘇聯下令一起離境的。那個弟弟也在我們大學裏讀書，他受到離境處分，僅僅由於他是被叫離境的人的弟弟。這類事情，我們是知道得很多的。中國方面，對這些革命的學生，全都進行營救，在這方面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我們在蘇聯學習期間，不必從理論上去探討，只是通過實際體會，就能判斷出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了。比如，那對秘魯兄弟後來得到了中國的援救。通過這種無數的事實，我們看清楚誰真正支持世界革命運動，誰是世界革命運動的真正叛徒，事情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九・三〇事件後印尼留學生的分裂

佐久間：我來談談印尼發生政變後，在蘇聯留學的印尼學生陷於怎樣困難的境地。這件事使我們獲得了非常有意義的教訓。

九・三〇事件後，一些大學的印尼學生當然不能回國了，已畢業的學生就繼續留在莫斯科，有的到工廠勞動，有的以研究生或旁聽生的名義，大部份仍住在學校。

過去和我們一起鬥爭過的印尼學生、共產黨支部的負責人，這時大部份出賣了靈魂，倒向了蘇聯。他們一開口講話，簡直像宮本顯治講的一樣，把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得一錢不值。對於蘇聯修正主義，一變以前的態度，緊閉嘴巴，不再提出批評了，而說一些看起來像是“獨立自主”路線的話。既然發生了這種現象，印尼學生中間因此引起了大爭論，不僅黨員學生截然分成兩派，就是印尼民族黨左翼的學生，也發生了分裂。

佔壓倒多數的印尼學生，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他們支持印尼國內已經開始的武裝鬥爭，並表示無論怎樣也要參加這個鬥爭。他們認為在黨的修正主義領導和蘇聯當局勾結起來進行控制的地方，是不可能進行援助祖國人民的鬥爭的，因此就和修正主義領導斷絕關係，陸續到中國去了。當然，他們名

義上說的是到越南去。剩下來的一部份印尼人，用我們的習慣語說，就變成了“莫斯科維奇”，意思是“莫斯科仔”。他們已經拋棄了祖國，成為徹頭徹尾的“莫斯科仔”，把自己的身軀和靈魂都出賣給了蘇聯。“莫斯科仔”就是對這些人的這種無恥行徑表示最大的蔑視的稱呼。這些人對日本的官本路線，拍手稱好，深有同感。他們完全喪失了戰鬥性。他們的領導人住在豪華的公寓之中，每月拿着高薪，大擺其臭架子。

但是，由於蘇聯公然和現在的印尼法西斯政權打得火熱，就連這些留下不走的被叫做“莫斯科仔”的人也起了分化。因為他們的親屬和伙伴都已遭到印尼法西斯政權的一概捕殺。他們說這是法西斯，蘇聯方面却說不是法西斯，法西斯只有在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軍事獨裁的情況下才有。印尼還沒有壟斷資本，所以不是法西斯。這種答覆使留在蘇聯的印尼人十分氣惱。真正死心塌地出賣靈魂的傢伙越來越少，幹不成事。他們在印尼學生中飽受批判，越來越孤立。在這種條件下，留下來的人數不多的真正的革命戰士，在印尼學生中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加強工作，組織了學習會。

這樣，在莫斯科留下來的印尼學生，又分成了兩派，現在大多數學生在激烈的反修鬥爭中站到了正確的立場上來。其中有些人而且敢於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進行活動。當然，這些人一定會被迫離境，只是時間

問題罷了。最後的最後，只剩下那些極少數的人，和蘇聯人結婚，住在蘇聯給的公寓裏，死心塌地背叛祖國。所以，幾乎所有的印尼學生都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以及一些印尼共修正主義領導堅決斷絕關係，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有一部份人，即使一時也可能受現代修正主義的蒙蔽，但是歸根到底，大多數人民是支持革命的。這件事，對我們也是個極其重大的教訓。印尼共產黨中真正的革命派、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們進行的種種活動，對於促使我們在莫斯科起來造反，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蘇聯人民怎樣看中國——徹底的反華宣傳

新谷：我們在這裏不妨談談蘇聯人民對中國的看法，蘇聯國內在中蘇關係問題上普遍的氣氛怎麼樣。這也是我們回國後很多人都提出的問題。

佐久間：一九六三年八月底，我到莫斯科才兩三天，就到全市最有名的高爾基公園去散步。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男子一看到我，就氣勢洶洶地走過來問道：“你是中國人嗎？”在我留學蘇聯的五年期間，碰到這類事情不知有幾十次了。起初，我回答說：“不是的，我是日本人。”他一聽就說：“哦，日本人嗎？日本人是我們的朋友。”後來我都被問煩了，就回答說：“是的。是中國

人又怎麼樣？”這一來，就大吵起來，吵得不可開交。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來無線電、電視、報紙、雜誌等一切宣傳工具，整天都在進行反華宣傳。

它們宣傳些什麼呢？說中國是在蘇聯援助之下才取得革命勝利的。革命成功後也是在蘇聯援助之下才有今天。但是今天的中國不僅不感謝蘇聯，反而仇視蘇聯，忘恩負義，如此等等。這類宣傳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通過各種大規模的宣傳機器，向蘇聯人灌輸。不少年輕人和知識分子在感情上就認爲：中國人是忘恩負義之輩。日本人和中國人相像，我們在這方面受到過不少氣。

我們常常碰到這樣的事，就是到了深夜，公共汽車已經沒有了，只有等出租汽車，眼看它要停下來，可是呼地一下又開跑了。最初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我想，出租汽車拒絕搭客是常有的。有一次，一輛出租汽車正要停下來，我趕快跑過去，它停下來讓我上了車。車開動後，司機便問：“你是哪一國人啊？”我說：“日本人。”於是他就說了這麼一段話：“啊，這就放心了。其實我以為你是中國人，本來打算不停車了。不過我這是順路，怎麼都行，要坐就坐上來吧，這才讓你上車。噢，你是日本人，那就放心了。”可見他們的宣傳周密到了什麼程度。

原田：在莫斯科，北京的俄語廣播現在已經完全無

法收聽。它是受到嚴重的電波干擾的唯一一家對蘇聯的廣播。來自美國的廣播倒可以自由收聽。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電視廣播大放紅衛兵在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前面進行示威的鏡頭。其伎倆一如砂間、紺野回國後所作的那種宣傳。他們舉行記者招待會，造謠說大使館人員生命如何受到威脅，怎樣歷經艱險逃出，飛機場上如何可怕，令人恐怖。這種手法，和宮本修正主義是一路貨色。蘇聯人只能看到這類消息報道，心裏不知道中國人到底怎麼樣，以為是比納粹還可怕。

連“紙老虎”和“東風壓倒西風”也不懂

佐久間：蘇聯一般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一無所知。他們從早到晚所聽到的和看到的，就是那種滿懷惡意的反革宣傳，簡直搞到了令人不可置信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拿中蘇論戰來說吧，也是根本不知道中國的說法的。蘇聯共產黨員也不知道，共青團員更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們到了莫斯科，用剛剛學會的俄語同他們爭論，都發現他們知道得很少。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帝國主義是紙老虎”。這句話直譯成俄文，就成了“紙的老虎”。他們竟認為“紙的老虎”又跟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還對“東風壓倒西風”這句話毫不理解。照他們解釋，“東風”就是中國，“西風”就是中國西面的蘇聯。他們認為，毛澤東的中國是站在企圖征服蘇聯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上。我們聽了簡直感到啼笑皆非，不成體統。於是，我們把地圖拿出來，嘲笑他們說，中國的東面還有一個國家，就是日本，難道毛澤東是說日本要征服中國和蘇聯嗎？再爭論也爭不了，而且真沒有意思了。（笑聲）

日本留學生被誤認為是中國人而吃了苦頭

足立：蘇聯大規模地發動反華運動，是在一九六二年底，即加勒比海危機結束之後。記得當時教我們俄文的教師，突然在我們面前破口大罵中國。這個教師曾經去過中國，能說中國話。他說：“中國接待客人態度不好。”教經濟地理的教師也幹了十分下流的反華勾當。從此我們就知道反華運動已在整個蘇聯開始。

新谷：冬天是滑雪季節，大家都去滑雪。俄國人一般都精於此道，再加上他們的個子大，我們在滑雪時，常常被一些蘇聯傢伙誤認為中國人而施以暗害，他們以全速衝前，用全身向我們猛撞。這種猛撞如被撞中要害，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

原田：不僅如此，那些傢伙看到我們在滑雪，故意

在滑道十字轉彎路口附近，暗置鐵絲、鐵條，當滑雪者以全速向下坡飛馳，在這些金屬障礙物上滑過而轉彎時，身體就會因失去重心而傾斜，猛烈墮倒在地。我們已多次碰到這類事情。有的日本人因此而得了神經官能症。

新谷：他沒有辦法，只好在滑雪衣前後綴上一個挺大的太陽旗標誌，讓那些傢伙知道是日本人（笑聲）。用這種辦法來保護自己免遭危險。

足立：正如一般日本人初見西洋人時，分不清他們的國籍一樣，在蘇聯人眼中，對亞洲人也是分不清的。他們以為黃皮膚的都是中國人。為此，日本學生在蘇聯，遭受到多次侮辱和肉體上的損害。

新谷：今天在蘇聯搞的排斥中國人運動，與其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不如說是更早期的民族主義，也可說是採取了種族歧視的方式，搞得非常激烈。我們碰到這種情形時，說“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一般都可以免遭危害，但這句話實在是句沒出息的話。難道世界上有不說“我不是什麼人而是什麼人”就連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社會主義嗎？難道有這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嗎？這又跟納粹德國排斥猶太人有什麼兩樣呢？

這種現象如果只是一部份思想極落後的人搞起來的，那還情有可原，但在蘇聯，這是動員全部國家機構，投入全部國家力量來搞的。

當中蘇論戰剛開始的時候

新谷：在中蘇論戰剛開始時，早晨七時半起床一看，《真理報》刊載出類似《赤旗報》上刊登的那種又臭又長的文章。早上的無線電節目也在廣播同一篇長文，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也不好，那也不對。我們不等聽完就去上學。一直到吃午飯時，再打開收音機，仍然在繼續廣播那篇文章。

中蘇公開論戰中的一個高潮，是中蘇兩黨在莫斯科舉行談判期間，蘇聯方面突然發表“公開信”（註六）。對這封“公開信”，中國後來連續發表了九篇評論，提出反駁。從小學低年級只認得幾個字的小學生，到一切學校、一切機關、工廠、地區，不管人們懂與不懂，所有的蘇聯人，統統都被強制閱讀這封“公開信”。同時，所有國家機構都被動員起來，讓識字的蘇聯人都讀，掀起了一個徹底的反華宣傳運動，因此，蘇聯國內的反華情緒是很厲害的。不僅如此，蘇聯政府還散播中國可能進攻蘇聯的謠言，造成恐怖氣氛。

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蘇聯國內就傳說中國已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當時中國實際上並沒有進行核試驗。中國進行核試驗的傳聞居然形成一種恐怖氣氛。

足立：回顧中國首次核試驗在蘇聯的反響，確也有

趣。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進行第一次核試驗時，和肯尼迪被暗殺之後一樣，莫斯科的一般氣氛是非常緊張的。但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學生們，却熱烈地歡迎中國的核試驗，認為當然應該這麼做。

在這次核試驗以前，我忘了是什麼時候，莫斯科就流傳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我聽到了這個消息，告訴同房住的一個蘇聯人說：“中國進行核試驗了。”當時那個蘇聯同學已經睡了，聞訊立即跳下床來，憂心忡忡地說：“這是非常壞的事情。”這種表情和肯尼迪被刺消息傳來後蘇聯人的反應完全一樣。在他們看來，這兩個問題本質是一樣的：“好戰的”中國擁有原子彈，對和平是個危險。“和平女神”肯尼迪一死，世界和平也就要受到威脅。

原田：為什麼他們這樣害怕呢？據他們說，中國有了原子彈，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爆發。我又問他們，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怎麼辦？他們說：“到那時我就去自殺。”甚至共青團的男女團員也一本正經地說出這種話來。而且一整天嚇得臉都青了。

對暗殺肯尼迪事件的反應

佐久間：肯尼迪被刺事件，在蘇聯也引起一場大震動。我們進入各國人民友誼大學後，在一九六三年十一

月間，肯尼迪被刺的消息傳來了。當時，大學宿舍中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學生，都為此而高興。那時是在半夜，那個美帝頭目被殺的消息傳來，外國學生們真的是歡聲四起。

可是我們在歡呼的人中沒有看到蘇聯人這是怎麼回事？我們便跑去問蘇聯人，只見他們每五、六個人聚集在一間房間裏，人人表情哀痛，沉默不語。我們問他們怎麼啦，他們說：“這樣英明的美國總統竟然被人暗殺了！肯尼迪保衛了世界和平。現在和平女神被殺害，什麼時候打世界大戰就難以預料了。”他們說這些話的表情是非常嚴肅認真的，有些人還低着頭，陷入深沉的哀思中。這和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學生高興得互相擁抱，跳舞，適成極其強烈的對比。當時我們到莫斯科不過兩三個月，看到這時的光景，不禁爲之愕然。這件事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令人震驚的怪事。

宮本顯治也是一丘之貉

足立：在中蘇兩黨之間的問題上，蘇共方面一次也沒有發表過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但是中國發表了蘇共的東西。連赫魯曉夫言論集那麼龐大的東西都出版了。中國方面有信心這樣做。在中蘇之間，情況就是這樣。當日蘇兩黨之間發生問題的時候，宮本顯治因爲蘇聯不發

表日本方面的文件，曾經叮住蘇聯不放。但是它自己怎麼樣呢？到它和中國的關係一變壞，宮本顯治就採取了和過去赫魯曉夫同樣的態度。不准聽中國的北京廣播，不准讀三家雜誌（北京出版的日文雜誌：周刊政治理論雜誌《北京周報》、月刊綜合雜誌《人民中國》、月刊《中國畫報》）。

這事說起來真像個笑話。宮本顯治却是連那種事也幹了。宮本顯治幹了和過去赫魯曉夫所幹的完全一樣的事；而許多下邊的黨員盲目地跟着走。在蘇聯，在日本都是這個樣。這實在是叫人可怕的事。

原田：有一次，我和一個匈牙利同學一起出外散步，拍攝莫斯科的秋景。我們拍過照片後，到了紅場，就在那裏站着聊天。在我們前面兩三米的地方，有一個蘇聯軍官在那裏。他的體格高大，官階很高。他顯得有點慌慌張張，一會兒，他向我的匈牙利同學招招手，示意要他過去。對這個蘇聯軍官，我們完全不認識，他為什麼要那位匈牙利同學過去呢？那位匈牙利同學去了，他們在距離我兩三米的地方低聲講話，也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一會兒，那位匈牙利同學回來對我說：“那個蘇聯軍官想請我們替他拍個照。”

我那位匈牙利友人對那個蘇聯軍官說：“我不會拍照，你還是找他（指我）拍吧。”那個蘇聯軍官說：“那個人是中國人吧？我可不敢找他。”那位匈牙利同學說，他

不是中國人，你放心吧。這個軍官才讓我替他拍了照。我不禁好奇地問那蘇聯軍官：“你看到我很像中國人，好像很怕的樣子，究竟是什麼原因？你是軍官，我不過是個學生，有什麼可怕？”他說：“不，中國人確實是可怕的。我對中國人了解得很清楚。我在戰爭期間曾經在中國呆過幾年。中國人非常可怕。”他講了自己的體驗、對中國的印象。我再問他到底怕什麼，他說亞洲人做事情，要末不做，一做起來就要幹到底。（笑聲）他還說，我感到同那麼頑強的人打交道，到頭來可能會倒霉，所以害怕。這個蘇聯軍官說話倒是很爽直的。

我們外出時，無論在電車上或公共汽車上，還是什麼地方，也無論是大人和小孩，都對我們從頭頂一直看到腳尖，而且是惡狠狠地死盯着。他們一面看，一面還不斷地問：“你是中國人嗎？”我們說：“不是。”但他們還要追問。這一來，我們也惱火了，大聲反問他們：“如果我說我是中國人，你們究竟想把我怎樣？”這時他們不作聲了，但過了一會又說：“對不起，請問你究竟是哪國人？”我們說：“日本人。”他們立刻低頭彎腰表示道歉說：“剛才失禮，請你不要見怪。”（笑聲）然後他們就和我們攀談起來，說日本的半導體收音機如何好，接着又說些其他的奉承話。這也是說明一般的蘇聯人對中國人怎麼看法的一個例子。

也有了解中國的人

足立：但是也有這樣的事情。一些多少和中國人有過實際交往、了解中國人的蘇聯人，他們說中國人真是勤勞、樸實、工作好、正派。這類蘇聯人，我也確實遇見過不少。他們談起中國人，總是稱讚中國人對人熱情有禮，決不像我們那位教師所誣衊的中國人對人沒有禮貌。即使在莫斯科大學的教師中，有些教過中國留學生的人也說，中國留學生舉止端正，為人正派，學習認真。

新谷：我記得中蘇兩國共產黨之間有不少往來文件和信件發表，其中，中國給蘇共的信件，《真理報》只刊登過一封，其他的中國文件全部沒有發表，不讓蘇聯人民看到中國方面的見解。蘇聯人持有這種文件，一被發現，就會被警察叫去，追問是哪裏弄來的，這就禍事臨頭了。

日本學生因為是外國學生，這一方面遇到的情況好一些。而且，我們有的是譯成日文的文件，一般蘇聯人不知道這是“危險文件”，所以很少被沒收。我們通過種種努力，搜集中國方面的文章，當然還有蘇聯方面的文章以及其他國家的文章，主要的文章基本上都全部讀過。我們再按照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進行判斷，這樣就能夠理解事情的本質。

感情用事地敵視中國

新谷：從中蘇論戰的時代開始，蘇聯人雖然說“中國壞”，但是中國做的究竟哪裏不對？哪篇文章哪個地方不正確？一問到這些具體問題，他們就不知道了，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讀過中國方面的文章。實際上也讀不到。由於處在那種全國規模的反華大政治運動中，所以完全是在感情上憎恨中國。他們的感情與其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不如說是更以前的感情，就是種族歧視的感情。蘇聯當局就煽動這種感情，一面欺騙蘇聯人民，一面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在今天，蘇聯最害怕的，第一就是中國，第二是西德。至於美帝國主義，是完全當作他們自己人的。（笑聲）

蘇聯當局在國內使用那種最卑劣的手段，徹底地煽動反華情緒。前面說的“紅場”上的那個蘇聯軍官，見到旁邊有一個看起來像是中國人的青年，就感到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這正是蘇聯當局全面排華反華造成的大眾心理的具體表現。這裏當然談不上是社會主義，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影子也沒有了。哪裏還談得上進行什麼爭論去探討馬列主義的真理呢？！

宮本顯治曾經向蘇聯方面建議，不問實際行動，而專門進行旨在探討真理的爭論。可是蘇聯方面打開始的

時候起就完全不採取這種態度。蘇聯方面從中蘇公開論戰開始的時候起，就一貫地採取了和宮本顯治目前所採取的完全相同的伎倆，也就是使用行政力量，根本不讓人民羣衆看到中國方面發表的文章，也不讓聽到。它一貫採取這種手段來對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戰問題。

（註一）指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赤旗報》不署名文章《爲了加強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行動和統一戰綫》。一九六六年二月到三月，以宮本顯治爲團長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團帶着這篇文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訪問，從那以後，就明確地墮落到反華、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反革命路綫上去了。

（註二）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英法聯軍對於埃及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聯合向蘇伊士地區發動了侵略戰爭。

（註三）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一架運送開往南越的侵略軍的美國飛機侵犯蘇聯領土擇捉島的領空，被蘇聯方面強迫着陸，七月三日即由蘇聯方面宣佈無罪釋放。

（註四）由於赫魯曉夫下台而沒有開成的、旨在籌備分裂的國際共產黨會議的“協商會議”（原先預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勃列日涅夫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召開了。

（註五）指由民族主義政黨、宗教政黨和共產黨構成的印度尼西亞的民族統一戰綫，從一九五九年存在到一九六五年發生九·三〇事件時爲止。

(註六)指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真理報》發表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蘇聯全體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這是一篇在中蘇兩黨會談正在莫斯科舉行期間突然發表的攻擊中國的文章。對此，中國方面發表了九篇反駁文章。

四、赫魯曉夫下台及對這一事件的反應

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委

新谷：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下台了。當時在莫斯科的人對這個消息是如何反應的呢？各國學生和日本人怎樣看待這一消息呢？蘇聯人有什麼反應呢？我們當時都在莫斯科，直接目睹了這些情況，不妨談談那時的體驗。

足立：所謂“中蘇公開論戰”是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前後開始的，到了一九六三年，日本共產黨召開了五中全會（註一），制定了決不介入國際論戰的方針。不過，從那以後，通過七中全會（註二）和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註三），日共不斷地改變其方針。那時，日蘇兩黨關係，有了很大的變化。在莫斯科的日共黨員和普通的日本留學生的命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總而言之，連續發生了按照迄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常識所無法設想的事件，中蘇兩黨間的關係惡化了，而且日蘇兩黨間的關係也達到最壞的情況。

一九六四年七月，日蘇兩國共產黨圍繞對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評價，開始發生了公開爭論。我們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前對蘇聯已經淪為現代修正主義這一點，也已經有了清楚的了解，並且同它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那時，當我們談論起蘇聯今後將變成什麼樣子這一問題時，甚至有人開玩笑說：“赫魯曉夫十年以後就會死掉，這樣，總是有辦法的。”所以，當赫魯曉夫被趕下台時，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我們認為，這顯然是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內部矛盾加深，因而促成了赫魯曉夫的下台。但蘇聯人却不那樣認為。《真理報》“宣佈”說，這是“由於健康上的原因”，“由於年邁”，蘇聯人就只是依樣畫葫蘆，鸚鵡學舌。他們除了《真理報》公佈的以外，沒有任何消息，因此當你問及“赫魯曉夫為什麼下台”的時候，他們就只有回答說，就像《真理報》所報道的那樣。

作為蘇共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在某一天突然用那種任何人都知道是騙人的理由被免職下台。這自然給人以非常陰森可怖的印象。因此，一般蘇聯人首先對政治都抱有恐懼感。這又導致逃避政治與不關心政治。一旦以黨中央的名義發佈什麼，都完全是機械地加以接受。即使和現實完全不符，他們也決不提出疑問。但這決不表明他們真正相信黨中央的話。這完全是政治上的不信任。他們也不願意用自己的頭腦去深入

地思考上面談及的事情。而且即使考慮，也是徒勞無益的。與政治問題搭上關係，會帶來很大的切身危險。

情況就像太平洋戰爭時期大本營發表的公報一樣，任何蘇聯人都不真正相信官方公報。雖然公報裏有些內情，但那是一般人所無法了解的。這就造成人民大眾對政治不關心。但是，小道消息與謠傳很流行，帶有諷刺性的政治笑話廣泛傳播。這是人民用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微小的反抗。

“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

以及中蘇兩黨和日蘇兩黨的關係

新谷：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赫魯曉夫下台前後的情況大致就是如此。在中蘇公開論戰開始以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日本共產黨召開了所謂的五中全會，採取了決不參加公開論戰、盡量不公開這場中蘇論戰的立場，也就是按照嚴守中立的方針行事。因此，日蘇兩黨的關係還不壞，蘇聯方面在初期階段也幾乎沒有迫害日本人。不過，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簽署以後，自然必須對此明確表態，要麼贊成，要麼反對。而且，在日本，正當國會處於審議高潮的時候，志賀轟動一時地進行了背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問題激化了。

由於這種原因，日蘇兩黨的關係開始逐步惡化了。

這樣一來，隨着時間的流逝，這種關係就更趨惡化。中國的留學生們，在中蘇關係惡化之後受到了種種迫害。中國學生老早就遭到了種種方式的迫害，譬如什麼強制離境啦，開除出大學啦，等等。在中國學生的遭遇發生半年到一年之後，這種災難也降臨到日本留學生的頭上。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日本學生雖然沒有人被驅逐出境，但在其他單位，譬如在莫斯科廣播電台日語組工作的日本人，由於所謂的不支持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反抗蘇聯的理由，被革職並且被立即驅逐出境。因此，也發生了在幾小時內攜帶家眷被遞解出境的事件。

我們日本學生當中，也曾經相當迅速地舉辦了關於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本質的學習會，當時還要求蘇聯方面說明其觀點，因此邀請大學的先生等展開了辯論。這樣，幾乎所有的日本學生都理解了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究竟是意味着什麼。

因此，我們曾經料想，以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為試金石，日本學生遲早將會被開除。即使不會由此而被趕走，日本學生中的共產黨員或者更廣大的同學，或許因為即將連續發生的其他問題而不久都會被迫退學並被趕回國去。我們估計，特別是共產黨員，基本上肯定將會被趕走。

我們認為，這個時期大體上是一九六四年年底或者一九六五年年初。因為，一九六四年年底，赫魯曉夫企

圖召開旨在開除中國共產黨的世界共產黨會議的起草委員會會議。這個會議倘若召開，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將截然分成現代修正主義與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兩股勢力。我們認為，那時，日共採取了反修立場，所以，赫魯曉夫當面會對日共進行粗暴的干涉。

報道赫魯曉夫下台的前後

新谷：一部份政治上相當弱的非黨學生說，因為是日本人而全部被趕走，那是令人吃不消的，所以日本學生的內部矛盾擴大了。不願被轟走的人說什麼“不要過多地搞政治活動”，“要停止過火行動，以免影響到我們”。由於這個緣故，日本學生內部也出現了加劇矛盾的因素。但實則這種矛盾並沒有怎麼激化。之所以會如此，一是因為我們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二是由於無論哪一個日本留學生都對蘇聯方面採取的那種蠻不講理、硬要大家一邊倒的做法抱有強烈的反感。

從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的發生到赫魯曉夫下台這段時間內，蘇聯方面的態度可謂囂張一時。對待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反修力量，從赫魯曉夫到我們學校的蘇聯學生，都一律予以打擊，他們自信得令人驚異。因此，這時，情況周復一周地惡化起來。我們也已經意識到在短期內必然會被開除。

十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時，南美圭亞那學生從BBC的廣播中，聽到赫魯曉夫被撤職和繼任人是勃列日涅夫的新聞。聽到這個消息的日本學生跑到我這裏說：“你聽到了嗎？赫魯曉夫被免職了。”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消息究竟可靠到什麼程度。第二天一早，我們找《真理報》看，發現什麼政治消息也沒有，只是紀念某作家誕生若干周年的新聞。

這天的《真理報》，已經顯得很奇怪了，因為赫魯曉夫在職的時候，《真理報》每天都必定刊出赫魯曉夫的照片，譬如赫魯曉夫前一天在哪個工廠視察，到哪個集體農莊訪問等等。這類反映赫魯曉夫活動的新聞照片，幾乎毫無例外地天天都有。電視也幾乎每天都是清一色的赫魯曉夫的活動。甚至還用一個晚上把赫魯曉夫在烏克蘭戰綫工作的舊新聞紀錄片以及頌揚他的業績的紀錄片加以剪輯放映。而且還了解到，十五日這天晚刊的《消息報》（蘇聯政府機關報），竟沒有出版。

失魂落魄的蘇聯學生

新谷：那天的情形確實奇怪。到夜晚十二點鐘以後，赫魯曉夫被免職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全大學的宿舍，只聽見從宿舍裏傳出一片歡呼聲，真是熱鬧極了。以前，蘇聯學生認為我們是中國派，是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的，

是反對蘇聯的壞人，因此對我們非常敵視。和我同房住的蘇聯學生，一向對我態度冷淡。但是，赫魯曉夫下台後，這些蘇聯人的表情無不茫然不知所措。一提起政治問題，他們更是顯得格外厭煩，簡直像丟了魂一樣。

我曾想對那些蘇聯學生說，“你們以前的說法結果怎樣了”，以故意給他們一個難堪。但是他們沒有責任，而且很可憐，於是就沒有開口。第二天早上一到飯堂，許多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倒行逆施抱有反感的學生在食堂裏相遇時，都喜形於色，並互相握手祝賀他的垮台。

蘇聯學生自不消說，就是在支持蘇聯觀點的外國學生也就是印度和阿拉伯學生中，他們的表情大多也很尷尬。這天不少日本和南美學生上街時都要到書店去，大家想到赫魯曉夫的書籍可能被禁止出售，所以想趁早買赫魯曉夫選集。但是我們走進書店尋找，無論哪一家都沒擺赫魯曉夫的書。不僅如此，昨天還大量懸掛的赫魯曉夫的畫像轉瞬間也從莫斯科各個角落一齊被拿掉了。

因此，當上面由爭權奪利或者其他原因而發生更迭時，蘇聯人民羣衆都是易如反掌地支持已經獲勝的繼任者。而決沒有開展什麼留任運動，以便對赫魯曉夫的下台表示惋惜。這是因為他們既都不相信政治，也不信任那樣的整個領導。蘇聯領導恣意搞內訌，倘若由於什麼原因而被推翻，蘇聯人民就當即支持下一任領導。他們看透了上面的內幕，甚至感到神清氣爽。

赫魯曉夫被免職後一個時期，蘇聯國內相當混亂。對於新政權將採取什麼路線，大家都感到興趣。到了赫魯曉夫下台已經二十天，也就是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從北京飛到莫斯科，對蘇聯方面說：“改變路線，從赫魯曉夫那一套作法回到正確道路上來，是時候了，”那時，米高揚却回答說：“照樣貫徹蘇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制訂的方針。這條路線決不改變。”周恩來由於蘇方太不像話而回國了。

佐久間：正是那年的十月革命節，我們到“紅場”去，看到了周恩來在列寧墓上向人們招手。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同赫魯曉夫毫無二致

新谷：我們在莫斯科的黨員學生以及同黨有關的學生那時都清楚地感覺到，這次發生的赫魯曉夫的下台事件，並不是路線鬥爭，而不過是一場個人之間的純宗派鬥爭或爭權奪利而已，蘇聯修正主義的本質不會有任何改變。旅居莫斯科的共產黨員，對這一點的看法，都是完全一致的。

原定這一年十二月舉行的世界共產黨會議的籌備會議流產了，決定延遲到一九六五年三月舉行。這個由赫魯曉夫企圖召開的會議，只不過延期舉行。這就清楚地

表明，赫魯曉夫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權之間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不過，在評價赫魯曉夫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間有多大不同這個問題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却出現了相當大的分歧。

就對赫魯曉夫的評價而言，無論在莫斯科的黨員和日本的宮本中央領導，大體上都是一致的，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權這次出籠後，在評價上就產生了分歧。我們在莫斯科的黨員認為，在本質上不可能有什麼變化，不僅沒有變好，反而是變壞了。這種變壞的情況不是像赫魯曉夫時代那樣不過一周事態就大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權是以非常緩慢的方式變壞的。總之，令人感覺到，新政權不是粗暴地亂搞，而是通過各種小動作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由於這原因，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登場後，我們的評價同宮本顯治之流的評價發生了頗大的分歧。宮本顯治連連吹捧說蘇聯已經變了。但這些人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對於蘇聯方面來說，這種捧場是不受歡迎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日共黨員認為，宮本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權的評價，完全不符合蘇聯的現狀，是大錯特錯的。

由赫魯曉夫下台引起的校內動蕩

足立：赫魯曉夫下台後不久，學校的蘇共黨委會內

部，似乎舉行了幾次真相報告會。此後，我們的政治經濟系主任，詳細地給我們講了有關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各國人民友誼大學本來是赫魯曉夫建議開辦的，他下台後，許多教職員和學生都擔心我們的大學是否也會關閉。我們那個政治經濟系主任教授報告說：“赫魯曉夫被免職，並不是年老和健康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重大失敗。像《真理報》寫的那樣，那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事實上那是在撒謊。”他接着又說：“赫魯曉夫雖被免職，我們的大學也不會垮。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前，預算已經決定了。大學校舍現在還要擴建。大學今後也不會撤銷，大家可以安心讀書。”這個系主任是大學黨委會的最高幹部，他說的話是可信的。

誰也無法相信赫魯曉夫是因爲年老和生病而下台的。在赫魯曉夫下台的同時，《消息報》總編輯阿朱別伊（赫魯曉夫的女婿），《真理報》、廣播和電視局長等宣傳機構的最高負責人，以及同赫魯曉夫關係密切的一些人，都一股腦兒被撤職。而且，撤掉這些人的理由是“工作上的失敗”。

總之，赫魯曉夫下台引起的騷動就是這些。赫魯曉夫下台的第二天，我們上課時，碰到這樣一件有趣的事情：過去上課，教師老愛拿着一份《真理報》，一面引用赫魯曉夫這樣說，赫魯曉夫那樣說，一面教課。這一天，這位教師也拿着一份報紙，却對赫魯曉夫進行了批

判，說赫魯曉夫這一點犯了錯誤，那一點也犯了錯誤。

（笑聲）

原田：例如教我們經濟學史的教師，這天就沒來上課。我們想，他或許是由於不能一下子就說出他過去講的課都是錯誤的，出於這種良心上的自責而沒有到學校來。我們評論說，這還是一位有良心的人。第二天，這位教授到學校來了。他對圍着他的學生們說：“說老實話，昨天早上起身，得知赫魯曉夫被免職，我就沒有到學校來，而到科學院去了。請求發還我寫的學術論文，然後化了一整天時間把論文中引用赫魯曉夫的話全部刪掉了。”他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要顯示他是一個頭腦轉得多麼快，又是多麼地不落後於潮流而值得自豪的人啊！這樣從他身上，你就是怎麼樣也找不出一點點作學問的良心來。

完全投降了的宮本集團

佐久間：讓我們少許回顧一下赫魯曉夫下台前後的情況。我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底到莫斯科的。入學的十一月，發生了肯尼迪遇刺事件。翌年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日本，志賀和鈴木等叛徒被黨開除。到了這一年的夏天，蘇聯對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進行了分裂活動。而且，這一年的暑假，蘇聯方面突然在《黨的生活》雜誌上發表了迄今沒有公開的給日共中央的信件，揭開了日

蘇公開論戰的蓋子（註四）還源源不斷地出版了描寫“無賴漢袴田”的文章。

原田：從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十月中旬，也就是從日蘇公開論戰開始到赫魯曉夫下台，是日本學生心理上最緊張的時期。但是實際上，在莫斯科的日共黨員，由於按照日共中央的路綫從事活動而被蘇聯免職並強制送還日本的，還是赫魯曉夫下台以後的事。宮本顯治對這些事完全了解，但是却開始宣傳赫魯曉夫下台後，蘇聯已經有了變化，已經稍許變好了。看到這種情形，蘇方有什麼感覺呢？這正是意味着宮本顯治已經向蘇聯簽署了“投降書”。

一九六四年的“五一節事件”

佐久間：一九六四年確實是多事之年。恰好在志賀和鈴木被開除前夕的“五一”，我們學校發生了“五一事件”。當時大學當局硬要全校學生接受“支持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為整個學校的共同口號。我們不能在這個口號下參加游行。因此不應該把這條口號作為全校的共同口號，願意接受這條口號的人可以作為自己那個隊伍的口號打出來。這樣，就同學校方面進行了相當激烈的爭論。結果，“五一”的前一天，校長緊急召見全體日本學生，他威脅說：“支持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是蘇聯政府定出

的口號，你們對此不滿意的話，就不許你們參加節日游行。你們這些人都是好戰主義者。”校長召見一個國家的全體學生，在這所學校來說幾乎是空前的，所以是個異常事件。

而且，甚至還給我們扣上一頂“好戰主義者”的帽子，以進行威脅。所謂“好戰主義者”，在蘇聯看來，就是“帶罪美國軍部中的一小部份狂人，西德復仇主義者和中國的毛澤東集團。”我們也被置於同等地位。被校長召去訓話，只此一點就說明情況很嚴重，並被加上最高級的罪名，如果是蘇聯學生，一定會被嚇得發抖。

嗣後，日本學生會立刻召開臨時大會，討論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們採取的態度是，參不參加節日游行，可以根據每個人的意願自己決定，但是作為日本學生會這個團體今年則決定不像往年那樣作為一個團體參加“五一”的慶祝活動。這樣一來，除了僅有的一個日本人為了拍照才匆匆忙忙地跟着游行隊伍行進外，全部日本留學生都抵制了這次“五一”游行。其實，不只是日本留學生，其他外國學生也極少有人參加，因為大家都反對蘇聯方面強迫別人要擁護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行徑，凡是採取正確政治立場的學生，都拒絕參加這次節日游行。即使光是親蘇派的學生參加似乎也是蠻不錯了，但因為那些具有修正主義傾向的人，往往都是政治覺悟很低，很不願意參加政治活動，而只關心與他個人有關係

的事。這種傾向，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學生表現得都很突出。因此，雖然派來了很多運送參加游行人員的大汽車，但卻空空蕩蕩地没人去坐。事後，日本學生由於所謂煽動各國學生不參加“五一”游行而受到了迫害。這次“五一事件”，是日本學生和大學當局的重大政治衝突的第一個回合。自此以後，兩者的鬥爭就迅速地加劇了。

瞪着眼睛撒謊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原田：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特徵，是以撒謊為家常便飯，赫魯曉夫被免職，說他因年老和健康不佳。但他在一個月左右以前，跑了一趟芬蘭，回國之後又前往座落於黑海之濱索契城附近的別墅，事情恐怕就是發生在這個期間。任何人都一眼看穿是在撒謊，但蘇聯當局却居然將謊話當作官方公報發表。

佐久間：厚顏無恥，瞪着眼睛撒謊，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的慣常手段。例如這次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硬說是應一部份捷克領導人的“邀請”才出兵的。而任何捷克領導人都沒有提出那種要求。他們說出了那麼明顯的謊話。

不過，最可怕的是，譬如在這次發生的捷克問題上，蘇聯人民還是不知道其他消息，因此有相當多的人

以爲那是事實。總之，他們認爲，只要共產黨說的，恐怕就不會有錯。

學校當局對學生施加壓力

足立：赫魯曉夫在任時，蘇聯學生的態度也是神氣活現的。但是，赫魯曉夫一垮台，那些不明真相的蘇聯學生，也完全喪失了信心。有些人經常悄悄跑到我們身邊問我們：“有什麼消息嗎？世界局勢和中國現在的情況怎樣？你們有這方面的資料嗎？借給我看看好嗎？”由於他們不懂日文，不能閱讀我們身邊的日文讀物，於是便到處找，結果悄悄地弄到了英文版的《北京周報》帶回去閱讀。

佐久間：赫魯曉夫下台前後，我們大學宿舍裏的外國學生珍藏着各國語文版的《北京周報》。學校當局利用主任教師來監視與“照顧”學生。在學生到課堂上課後，這些教師和宿舍管理人員便擅自開鎖進入各學生房間檢查，看看有沒有中國書籍雜誌。不僅如此，學校當局還以此爲藉口頻繁地威脅學生不許藏有這類書籍文件。學校當局在開始對外國學生進行思想調查時，外國學生完全團結一致，和校方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後來學校才被迫取消了思想調查。

原田：這也算作是國際反修鬥爭的重大成果。他們

在學生離開宿舍時，隨意進入房間，打開書箱，拉開書櫥，進行搜查。他們系統地調查學生在座談會和其他各個場合的發言，以斷定這個學生是不是“中國派”。如果被看作是反蘇的，就將對你施加壓力。在我們學校裏，調查學生的思想動向的機關大致有三個系統。一個是“戈別烏”秘密警察系統，一個屬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調查局系統，還有一個直屬於蘇聯外交部的系統。這些機關相互安插秘密職員和特務，調查學生的思想動態。他們特別是要連續調查大學內那些支持中國觀點的人。有一次，發現一個學生替美國駐蘇使館當間諜，這是學生自己揭發出來的，大家迫使大學當局將這個學生驅逐出境了。

足立：可能我的話有一點離題了。總而言之，我們在蘇聯強烈地感到，它缺乏人民羣衆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個觀點。例如，赫魯曉夫下台這個問題，蘇聯當局可以明確地向人民交代赫魯曉夫究竟犯了什麼錯誤，結果怎樣。要是真正信任人民羣衆的話，我認爲，不妨向人民公佈材料，這樣做才是正確的。又例如，對斯大林的批評，也是亂罵亂咬，把斯大林攻擊得一無是處。至於斯大林的錯誤是如何造成的，他們却拿不出半點的科學的分析。

還有我們大學的學生問題，例如許多學生不上課，學校當局也是採取非常機械的、粗暴的行政措施去對付。

佐久間：對付不上課學生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削減獎學金了。

足立：在我們看來，爲什麼某些課程，學生上課率非常低，就應該在學生中間進行周密的調查、分析，然後順利地加以改進。倘若上課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學生對課程不感興趣，那就可以努力改善這門課程。其次，如果蘇聯大學硬填硬塞式的教育，每天上課六小時，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周就是三十六小時，又不許學生選課這樣一種制度有些勉强的話，那就可以改善這種教育制度。但是，學校當局完全没有確立起這種觀點，只是一味用行政手段壓迫學生，或用高壓來迫使學生就範。

蘇聯與中國在對待人民羣衆態度問題上的分歧

佐久間：有一則關於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政治笑話說：

赫魯曉夫在黨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做了非常詳盡的批判。有一位代表寫了一張小紙條，一個傳一個地這張紙條傳到了赫魯曉夫手裏。小紙條上寫道：“在斯大林擔任領導的時期，赫魯曉夫同志爲什麼沒有將現在說的那些情況在黨內作爲問題而明確地提出來呢？”赫魯曉夫看了紙條之後勃然大怒，站起來罵道：“是誰寫的這張

紙條？要署上名！”不過，會場上一片沉靜，誰也不敢回答。於是，赫魯曉夫就笑咪咪地回答說：“怎麼樣，恐怕這是無法答覆的吧！那個時候，我也像你們一樣，什麼也不敢說。”（笑聲）顯然，這是一則笑話，但內容實在深刻。

現在談的各國黨對中蘇論戰問題所表現的不同態度，使我們在莫斯科得到了非常大的教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蘇聯的做法就是對於中國方面所說的一切，完全不讓蘇聯人民知道。而對那些想通過收聽北京廣播或閱讀中國出版的文件來了解中國的觀點的蘇聯人，則進行恫嚇。蘇聯方面只讓蘇聯人民知道蘇聯以及支持蘇聯的黨的論點。

因此，在蘇聯國內形成輿論是非常快的。如果早晨傳達了黨或政府的看法，那麼到了傍晚，全體蘇聯人民已經取得了一致意見。他們對黨或政府的看法只是生吞活剝而已。蘇聯當局只有採取這種形式，沒有別的辦法。如若赫魯曉夫控制黨中央，那幾小時後全體國民就將形成與他相同的意見。那麼，中國方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在重大事態發展的嚴重時刻，它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中國採取的做法是，首先把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在《人民日報》等各種報紙上發表，讓人民大眾對這些論調進行詳細的討論，到一定時期以後，中共中央才發表自己的觀點。我想，以毛澤東

主席爲首的中國黨的領導的基礎，一是它堅持真理必定爲羣衆所理解的觀點，二是它深信中國黨所採取的立場、態度和馬列主義路線是正確的，並確信蘇聯方面的觀點是錯誤的。正因爲如此，它才能够採取這種態度。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戰，是關係到人類歷史向哪一個方向發展的極端重要的大事，但是蘇聯共產黨領導却完全以街頭上的無賴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問題。

原田：蘇聯當局使用國家政權的實力來對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這一場論戰，其結果只能是暫時地基本控制住蘇聯國內，但外國共產主義者的嘴巴是封閉不了的。在這個領域，無論怎樣也不能不引起大論戰。可是，在蘇聯國內，由於當局長期以來忽視了思想鬥爭，沒有認真地在理論方面開展鬥爭，所以當今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理論水平非常低，實在是很粗糙的。蘇共從論戰一開始，就無法在國際舞台上立足，它無法用理論來對抗理論，因此，就要拚命利用國家政權粗暴地阻止中國觀點的傳播。在日蘇兩黨關係業已開始惡化的時候，蘇聯方面也攻擊說，日共在黨的機關報與機關雜誌上介紹了中共的看法。最終也是提出了那種不像樣的論點。

思想鬥爭和修正主義

佐久間：如何發展思想鬥爭，就是將不同的意見和

不同的思想進行對比，開展思想鬥爭，結果真理必將獲勝，馬克思列寧主義必將贏得勝利。經不起鬥爭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能是放在育嬰器中的官方製造的“馬列主義”，是何等的腐朽。我認爲，蘇聯的情況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在這個意義上說，從中蘇兩黨對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根本對立的立場。

在這一點上，今天的日共宮本修正主義集團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所搞的那一套，無論在想法上或者在態度上都完全是一模一樣的。即不許大家閱讀中國的出版物，不許聽中國方面的廣播。誰讀了就被開除出黨，誰聽了就受黨紀處分。這是滑稽透頂的事情。蘇聯修正主義已經取得了國家政權，所以它要依靠國家擁有的暴力機器來解決思想領域的問題並非完全無效。但宮本修正主義集團還沒有取得政權，就依樣畫葫蘆，運用蘇修的一套，對黨員實行高壓，好像它不知不覺地已經取得了政權一樣。

問題還是在於，必須讓人民羣衆去了解真理，從根本上信任人民羣衆。相反，蘇修、宮本集團，他們對自己的路線就缺乏信心，只能憑藉權術，把自己的路線強加於人，因此才幹出了那種勾當。

足立：從這點出發，修正主義必然成爲唯武器論者，因爲它們不大重視人以及人的思想。結果，在戰爭問題

上他們就是唯武器論，在經濟領域裏，就是物質刺激。

佐久間：這就是經濟主義！

足立：正是如此。

佐久間：現在蘇聯當局宣傳它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和創造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却根本拋棄了進行思想鬥爭的觀點，這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人的思想如果變了質，腐化墮落，只剩下一些國家機構，無論怎樣改變這些機構，也決不會帶有發展社會主義的性質。從蘇聯的現狀看，它早已完全不像社會主義的樣子了。如果指望“物質刺激”、“追求利潤”這一套法則也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話，那麼，今天的日本和美國，恐怕早該進入共產主義了。（笑聲）

新谷：資產階級總是要通過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它的世界觀的，不讓它表現是不行的。只有讓它表現，表現出來以後，就要加以批判。蘇聯沒有採取這種態度，而是使用強制的方法，也就無從批判。因此實際上就缺乏無產階級的思想鍛煉。理論必須經過對不同意見和錯誤見解的鬥爭和論戰，才能鍛煉出來。蘇聯今天沒有這種思想鬥爭的觀點，所以它的理論水平非常低，也非常脆弱。

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是，我們在莫斯科逗留的五年裏，日蘇兩黨的關係發生了十分顯著的變化。我想，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當代變化得更

劇烈了。對於旅居莫斯科的人說來，這是一個直接關係到自己的命運的問題，所以我們具有非常深刻的切身體會。

報紙是兩黨關係的晴雨表

新谷：蘇聯本來原則上是進口各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刊的，並准許在國內公開出售。但是，中蘇論戰一開始，《人民日報》就不准進口了。日蘇兩黨關係一惡化，《赤旗報》也就不再進口了。

佐久間：到我們回國的時候，法共的《人道報》、意共的《團結報》、南斯拉夫的《戰鬥報》，都不出售了，因為發生了捷克問題，這些黨都是反對蘇聯當局的侵略行為的。

原田：古巴的《格拉瑪報》也不出售了。

佐久間：《格拉瑪報》很早以前就不出售了，後來古巴在捷克問題上支持蘇聯以後，最近情況怎麼樣，則知道了。

新谷：中蘇公開論戰開始以後，《赤旗報》起初是按五中全會的路綫完全中立，採取一概不介入公開論戰的態度……。

足立：就是閉口不談這個問題……

新谷：是這樣。這時候我們大學訂有《赤旗報》三

十份。這是正常情況。當公開論戰激烈化時，《赤旗報》轉載過中國的文章，但凡是載有中國的文章的《赤旗報》，一概不許進口（笑聲），因此我們訂的報紙從來不是天天收到的，總是像拔掉牙齒一樣，缺口很多。

佐久間：我們一發現哪天的報紙收不到，就知道這天一定刊載了重要文章。（笑聲）

原田：缺的《赤旗報》，我們想法子從別的途徑弄到手，果然那一天載有非常重要的文章。到後來，缺的報紙越來越多，而且減少我們的訂報份數，減到了五、六份，這就更加不能滿足需要。到後來，不僅是登有中國的文章的那期報紙，連登有不合蘇聯意的日本的文章的那期報紙，也缺了。有時候竟全部停送。最後就完全禁止進口《赤旗報》。代替的是，從一九六四年八月底起，開始出售志賀一伙的《日本之聲》。

這種狀況又繼續了一定的時候。這已經成爲了解蘇聯對日本的黨採取什麼態度的非常準確的晴雨表。在這個期間，除《日本之聲》外，還出售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的報紙《總評》和社會黨的機關報《社會新報》。這三種報紙同時都出售的時間不長，不久《日本之聲》停止了，《赤旗報》又恢復出售，雖然份數很少。

足立：那是從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起的事情。

新谷：不過，《赤旗報》那時候還經常有缺報。日蘇兩黨關係漸漸好轉，一加緊勾結，份數也增加了，缺

報的事情也少了。

佐久間：到我歸國的時候（一九六八年夏天），已經幾乎完全不會缺報了。

新谷：我一九六七年夏天畢業回國時的情況是，既出售《赤旗報》，又出售《總評》和《社會新報》。從蘇聯本來的原則來說，這樣做是非常怪的。因為只出售《赤旗報》的原則被打破了。這是一個標誌，表示儘管日蘇兩黨之間重新和好，關係也恢復了。可是蘇聯對此還不能完全放心。

原田：這一年裏（一九六七年夏天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們訂的《赤旗報》是源源不斷地送來。

佐久間：起先是份數不夠，可是到我去年夏天回國時，就有富餘了。我們一九六三年到那邊去，一九六八年回來，整整是五年。這五年裏，日蘇兩黨之間的關係有過一個變化過程，先是沉默狀態，經過五中全會，七中全會，公開進行爭論，並且搞到兩黨間斷絕關係的地步，後來又重修舊好，舉行了兩黨會談，於是又恢復了友好關係。而在關係恢復的時候，我們就被宮本顯治開除了。（笑聲）回顧這樣一個過程，我想可以說，宮本顯治其實並沒有從那樣一場意義深遠的國際大論戰中吸取任何教訓。

按政治風向招收外國學生

新谷：我們在莫斯科讀書時，大學當局招收日本學生的手段，也和對待《赤旗報》的方式一樣，出現了非常有趣的現象。蘇聯完全是按各個時候不同的政治風向來改變方針的。最初，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日本留蘇學生大體上由日蘇協會推薦，或者由蘇聯方面認為有資格的個人介紹，就可以到蘇聯留學。但是，當日蘇兩黨關係惡化時，日蘇協會的推薦就不再被接受，必須由日蘇交流協會、日蘇親善協會等機構的介紹，才被接納。再以後，必須由“日本之聲”出面介紹或者總評、社會黨的推薦，才准赴蘇聯留學。

因此，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一段時期，和一九六四年以後時期的日本留蘇學生，其質量和傾向是截然不同的。在日本學生會的內部，日本學生之間也截然分成兩派，政治上激烈地對立。

足立：蘇聯方面一決定今年收十個日本學生，接着就產生了各個團體如何分配這十個名額的問題。直到最近為止，分配情況是這樣的：日蘇協會三名，日蘇親善協會三名，日蘇交流協會一名，總評一名。可是，到日蘇兩黨間的關係又歸和好之後，情況就變了，去年（一九六八年）成了日蘇協會五名，日蘇親善協會若干名，

等等。從這種名額的分配上，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蘇聯現在對日本採取什麼態度。

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的日本留學生

新谷：從一九六五年夏天起，“日本之聲”選派的人，陸續到了莫斯科。當時日本學生會的領導，掌握在“代代木”派的手裏。爲了向“代代木”派奪取日本學生會的領導權，蘇聯當局和“日本之聲”的志賀義雄勾結起來，選派一批有鬥爭經驗的年青打手（笑聲）。不僅如此，蘇聯當局還特別照顧“日本之聲”選派的學生，連他們的老婆、兒女也一起送到莫斯科去，由蘇聯供給食宿，真可謂招待周到了。一兩年之內，“日本之聲”派來的學生就達十幾人，他們和蘇聯方面互相配合，在日本留學生中做搗亂、破壞工作。我們堅決和他們進行了鬥爭。在本來就在莫斯科的學生中，有一個人向“日本之聲”投降，而這是經過了種種的工作的。但是，我們同這些叛徒徹底地進行鬥爭，終於粉碎了他們。直到我們回國時，我們的日本學生會的領導權始終未被修正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篡奪。

蘇聯對日本政黨的態度，也是忽親忽疏，忽好忽壞。它對日共，由於日共反對部份禁止核試驗條約，兩黨關係惡化。加上，志賀問題的發生，關係就更加惡

化，終告決裂。此後，蘇聯又和社會黨搞友好，對它大獻殷勤。這時，恰好中國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日本社會黨中的左派熱烈地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使蘇聯十分震驚。於是又回過頭來注意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看到它在進行徹底的反華活動，就認為不妨同它重修舊好。到了現在，蘇聯是只要他反華，和任何人都可以携起手來。

但是，蘇聯目前似乎並不太熱心於只和日共或社會黨搞好關係，蘇聯目前對日本的哪些人最鍾情呢？那就是政府和自由民主黨。雖然存在開發西伯利亞和其他種種問題，但是，總而言之，它現在最大的目標是日蘇兩國團結起來對付中國。蘇聯政府領導人不止一次地向佐藤首相發出邀請，請他到蘇聯作友好訪問，這樣地進行討好。蘇聯和日本之間還有種種懸案，所以不能輕易就締結日蘇和約，但是當前蘇聯是要從可以做到的事情上着手做，所以兩國政府間正在進行關於簽訂日蘇文化協定的談判。文化協定一簽訂，交換學者、研究人員和留學生等的協定當然會列為具體條款。這樣一來，將來，自民黨和政府派的留學生就要進入莫斯科的大學了。

原田：莫斯科大學已經有這種留學生了。

“蘇聯派”各國留學生增加

佐久間：方才講的是日本學生的情況，日本以外的

各國留學生也都是一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開論戰開始以前和開始以後，各國學生的情況都有了很大的變動。原先，各國人民友誼大學錄取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學生，在人數上也大體上是平衡的。公開論戰發生後，支持蘇聯路線的國家的留學生多起來了，不支持蘇聯路線的國家的學生則減少了，在某個時候竟連一個都沒有。比如說拉丁美洲國家，除了智利和阿根廷以外，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般都支持武裝革命鬥爭的路線，因此蘇聯大幅度增加了智利、阿根廷的學生的錄取名額。

非洲國家的留學生，由於他們的祖國多數還沒有建立馬列主義的黨，政治上還存在着一些缺點，但是他們一般地都保持着作為新興的獨立國的朝氣，多半具有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傾向。特別是他們的牌色，在蘇聯國內也受到歧視，因此經常和蘇聯人衝突。蘇聯對他們很頭痛。我們大學的阿拉伯國家的學生，原來都是親蘇的，也非常受到蘇聯當局的誇獎。可是到前年以色列發動侵略阿拉伯的事件發生後，以蘇聯出賣阿拉伯為轉折點，他們和蘇聯的關係稍為冷淡了一些。現在和蘇聯關係最好，派大量學生到蘇聯留學的，除智利、阿根廷和阿拉伯國家外，還有印度和塞浦路斯。

這些國家的學生，許多人是所謂“蘇聯派”，他們對蘇聯方面拍馬諂媚，看蘇聯方面的臉色行事，從而得到種種好處。特別是阿拉伯的學生；只要蘇聯舉辦政治集會，他

們就會立即被動員參加。這些傢伙在會上聲嘶力竭地大喊“感謝蘇聯的無私援助！”這類肉麻的口號給蘇聯聽。

新谷：充當吹鼓手啊！（笑聲）

佐久間：就是這麼回事。但是，蘇聯方面却非常喜歡這一類人。近來印度、錫蘭和除印尼以外的東南亞國家派到蘇聯留學的學生增加了。這些學生和共產黨、進步組織毫無關係，大部份是由政府派出的留學生，出身於有錢有勢階級，思想非常反動。他們不讀社會科學科，大部份是讀理工科，偶而也有人讀文學系等人文科學科。那是根據本國政府的方針選讀的。正好，蘇聯也討厭那些關心政治或社會科學的學生，在這一點上也討了蘇聯的好。

但是，蘇聯對於那些希望學習馬列主義，有要為祖國解放事業而鬥爭的觀點，對蘇聯的修正主義傾向採取稍加批判的學生，動輒加以無情的打擊。我們從切身體驗中了解，蘇聯領導集團衡量某一組織或個人，不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看他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而是以“反蘇”還是“親蘇”這個尺度去衡量。對方即使是反動透頂，只要他“親蘇”，蘇聯就把他當做朋友，熱烈地和他擁抱。

相反，不管你階級立場多麼正確，只要對現在的蘇聯領導集團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們就全力加以攻擊，欲置於死地才作罷。這樣一種態度已經成了今天的蘇聯領導

集團的特徵。這一點，我們通過實踐再清楚不過地認識到了。

新谷：今天的蘇聯修正主義領導以對他們是否拍馬諂媚來判斷一切，這種卑鄙下流的政治搞得非常徹底。不拍他們馬屁，就被他們貼上一個“反蘇”的標籤。實際上關於所謂“反蘇”問題，我們在蘇聯真是看得多了，例如那些批判斯大林的影片如《晴朗的天空》、《活着的和死去的》、《寂靜》等，才是不折不扣的“反蘇電影”，今天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才是貨真價實的反蘇分子。正是他們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糟蹋了。他們藉口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斷送了社會主義制度。

原田：正是如此，一手葬送十月革命成果的這些傢伙們才是真正的反蘇罪魁。

志賀一伙的末路

新谷：所謂“斯大林問題”，下面再談。現在談談志賀義雄一伙的命運。前面已經講到一點，在我們日本學生中出了一個叛徒，被志賀一伙收買了，他立刻和蘇聯當局勾結起來策劃把日本的革命學生趕出大學的陰謀活動。接着“日本之聲”系統的大批人馬被送進我們的大學來，這些傢伙後來怎麼樣了呢？

這些傢伙把死心塌地投靠蘇聯，盲目地服從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作為自己的思想和信條。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外乎是吹捧現在的蘇聯領導。但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甚至對於理應是它最親密的朋友的志賀義雄修正主義一伙，也是不怎麼講信用的。它的態度是，根據各個時候的政治考慮加以利用，如果沒有利用價值了，就加以拋棄。當志賀一派的人為了適應蘇修當局破壞日本學生團結的需要，而被派到蘇聯時，他們神氣活現。在他們出發時，由神山茂夫（日共叛徒）之流親自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給這些人打氣。《日本之聲》登了照片，大肆宣傳。這些人在大吹大擂聲中來到了莫斯科。

他們一來到我們大學，立即把一名日本學生收買過去，並在他的指點下在日本學生會中猖狂地搞分裂活動。就是說，他們馬上着手完成他們帶來的任務了。舉例說，聯系到反對日“韓”條約鬥爭而發生日本駐蘇大使中川訪問大學問題時，在全體日本學生和大學校長進行交涉的會上，“日本之聲”的學生就演出了不堪入目的盲從蘇聯的一場戲。後來在日本學生會全會上，“日本之聲”的傢伙也狐假虎威，抬出蘇聯當局壓我們，喊叫什麼“如果你們是那樣地反對蘇聯的做法，就立刻停學回日本去！”

但是，蘇聯當局顛倒敵我的毫無道理的做法激起了全體日本學生的憤怒。就是在這個時候，“日本之聲”

的傢伙毫不掩飾地充當蘇聯當局的走狗，因而遭到了全體日本學生的總反擊，使他們完全地孤立了。日本學生罵他們是“蘇聯的走狗”。在開始的時候，“日本之聲”的傢伙居然還相當囂張。

可是不過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局面又有了新的變化。第一，“日本之聲”那一伙人，開始對蘇聯當局拙劣的官僚主義做法也感到不滿和反感。他們儘管事事聽從蘇聯當局，奉承諂媚，却發現自己並不得寵。因此，他們從早到晚碰在一起，就互發牢騷，說蘇聯當局的壞話。第二，“日本之聲”不過是志賀修正主義者搞的一個組織，拿不出理論體系來，只會唯蘇聯當局之命是從，做應聲蟲，因此蘇聯當局的政策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不斷變換，他們跟不上，陷於不利的境地。第三，發生了他們離開日本時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就是，蘇共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又和日本的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的關係逐漸開始恢復和好。這一來，“日本之聲”這一伙人就進入了死胡同。這時曾經是“日本之聲”的核心的人物就寫了長篇聲明，宣佈脫離“日本之聲”了。

足立：那個傢伙說：自本日起，本人不再是“日本之聲”的成員，而是一隻孤獨的狼（笑聲）。

新谷：“日本之聲”的中心人物向蘇聯方面提出了很長很長的退會宣言。他本來參加志賀一伙就是投機，就是爲了到蘇聯去。因此，既然已經進了大學，就不需要

跟着志賀一伙跑了。況且變得於個人不利起來，所以乾脆不幹了。剩下的只是“日本之聲”的一個有名的人的孩子，這孩子完全是靠着父親的“面子”來留學的，思想上、政治上都沒有什麼信念，所以完全不起作用。這樣，來到莫斯科的志賀一伙的下場是十分可悲的。

我們直到最後也沒有放鬆對這伙人的進攻。我們按照把他們從大學中實際上趕走的方針進行了鬥爭。不管他發表什麼“轉向”聲明，也不管他在組織上和“日本之聲”有沒有關係，總之他們充當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直接的走狗，抱着鑽到在莫斯科的進步的日本學生中來進行破壞的目的，所以我們徹底地加以打擊，直到最後。這樣，到我們畢業回國的時候，他們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敗北，完全不起作用了。這一回，這些傢伙担心起自己會不會連大學裏都呆不住，對自己明天的命運感到擔憂，徬徨苦悶，不可終日。

宮本一伙的轉變方向

佐久間：從這些事情中可以清楚地說，如果對現在的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抱有某種哪怕是淡薄的期望，到頭來就會真正地吃盡苦頭。我們是非常清楚這一點的。然而，宮本顯治也可能是被什麼迷住了心竅，這時候却開始向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搖尾乞憐了。他爲了

和蘇聯共產黨重歸於好，完全不看蘇聯的現實，卑躬屈節地追隨現在的蘇共領導。看到宮本顯治的這種姿態，真替他感到可憐，或者說是沒出息吧。宮本顯治的命運，歸根結蒂，將和志賀一個樣。

但是，過去和我們一起在莫斯科進行過反修鬥爭，畢業回到日本後就加入了宮本顯治一伙的人，寫信到莫斯科來說：“最近日本的黨也開始和蘇聯的黨恢復友誼了，你們在莫斯科的人也一定相當輕鬆起來，事情好辦起來。”讀了這封信，我們真是不知道說什麼好。吃到了那樣的苦頭，却還看不透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本質。

原田：特別是最近兩三年中，日本共產黨的宮本領導集團迅速地背叛了階級，大幅度地轉變了方向，從而完全跌進了現代修正主義的泥坑。因此，在莫斯科，要堅決對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革命學生和宮本修正主義領導集團之間的矛盾也加劇了，事態終於發展到了不得不在組織上也分裂的地步。

在我們前面講過的那種蘇聯的實際情況下，居住在莫斯科的學生黨員，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十分了解現代修正主義所造成的危害、階級背叛行為是何等地嚴重。但是，我們中間也有一些傢伙在組織上追隨宮本修正主義。他們到頭來將會落得個和志賀一伙同樣的命運，這也許是歷史的重演吧。宮本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從和蘇聯重修舊好開始勾結那個時候起，在莫斯科就

開始壓制對蘇聯的現狀的批判，壓制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而且徹底地貫徹它的至高無上的命令：“蘇”這個詞，“修”這個詞，一概不准使用！

這樣一來，那些追隨宮本修正主義的傢伙就不再開口了。而且每當一般的學生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在蘇聯的具體表現，他們就拚命地企圖進行壓制。由於態度變成了這樣，宮本一伙在具有普通常識的日本學生中也完全孤立了。這些日本學生說：態度不有點怪嗎？情況就是這樣。

“學生不得對抗黨中央！”

佐久間：宮本修正主義一開始向蘇聯修正主義搖尾巴，果然蘇聯方面也就改變了風向。過去，我們在學校中進行鬥爭，就遭到當局的鎮壓，有時候還受到行政處分。嚴重的時候，大學的最高決議機關還貼出退學的處分決定。舉例說，就越南問題舉行抗議轟炸北越的示威游行時，學校明確地勒令幾名日本學生會的幹部退學。

爲了抗議美帝國主義轟炸北越，以越南留學生爲首，在莫斯科留學的外國學生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進行了示威游行。對此，蘇聯當局大肆進行鎮壓，使許多越南學生、中國學生及其他國家的學生負了輕傷甚至重

傷。北京電台還有全世界的新聞界揭露了這件事情。日本的電視台也播送了這個時候的情況。因此，這時候，全世界掀起了聲討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這種階級背叛行爲的浪潮。

由於參加了這次示威游行，大學當局決定給日本學生以退學的處分。但是，雖然開除了，由於這會進一步刺激國際輿論，所以當局不能公佈。在左思右想如何是好的過程中，時間過去了，當局只好對這件事不了了之，處分終於沒有能够執行。這是過了很久以後，當局人士親自告訴我們的。因此，儘管過去甚至決定要開除我們，可是一到宮本顯治向赫魯曉夫下台後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搖尾乞憐，蘇聯當局對我們的態度也就大大地改變了。相反，“日本之聲”却真正受到了冷遇。

到日蘇兩黨會談前後，蘇聯當局人士揪住我說：“對於我們大學中日本學生的各種問題，我們從來一貫是信任日本共產黨，依靠它，一切都通過它處理的。將來也決不改變這種做法。讓我們更緊密地取得聯系，合作幹吧！”我聽到這番話，感到非常意外，就盯着他的臉問他：你居然把開除我們這件事忘得精光了嗎？可是他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麼件事。

但是令人吃驚的是，在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潮流和這種“解凍”的氣氛相呼應，一下子開始得了勢。他們鬆了一口氣，說“這下子得救了！當時曾經擔心會被開除。

在蘇聯，我們過去被蘇聯方面另眼相看，光是這樣還隨便，反正覺得討厭就是了。學校方面也在給我們各種打擊，我們那時候感到簡直連氣都喘不過來。今後就好了，黨中央的路綫已經變了，採取了要和蘇聯友好的方針。”他們真是高興得有點得意忘形了。但是，雖然蘇聯方面厚着臉皮對我們說，過去開除了你們，不過一直是信任你們的。可是我們不能說：“啊！是嗎？”（笑聲）

但是，這樣一來，黨內的右派傢伙便開始說什麼：“不，不是這麼回事。我們長期住在外國，變得不十分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因此一定要好好地學習黨中央說的話。學生不應該自以為是地說什麼黨中央的路綫錯了。今後，不應該在羣衆面前做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事。一定要和共青團也搞好關係，採取聯合行動（笑聲）。”

在大學中，宮本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的這種路綫引起了什麼國際反響呢？從來一貫和我們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各國進步的、革命的學生們不再和日本學生打交道了。他們認為日本學生嘴巴上說得好聽，可是歸根到底，却巴結起蘇聯來了。

被外國學生拋棄的 宮本修正主義的路綫

佐久間：有一天，我們大學的俱樂部放映電影，我

去看了。那部影片的內容實在無聊，連半點社會主義的影子也沒有。電影映完，各國學生在回自己宿舍的路上，談起了這部影片，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我也慨嘆地說：“想不到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在文化上墮落到這種地步了。”一個非洲同學立即說：“你們還有什麼資格說這種大話，你們的黨奉行和平過渡路線，不也是修正主義嗎？”其他學生也紛紛說：“說得對。日本人沒有資格批判外國的修正主義。”

這位非洲學生的祖國，還沒有創立共產黨。但是他們，也說出了這樣的話，用現在日本通行的話來說就是：“修太郎啊，大話少說吧！”我們從來沒有像聽到非洲學生這句話時感覺到難為情。我回到宿舍中，一頭倒在床上，仔細琢磨這句話。自從官本集團轉變方向以後，在過去一道進行反帝反修鬥爭的各國學生就不理睬日本學生了，他們認為，日本人已經成為蘇聯修正主義的朋友了。

在我們大學裏，有許多古巴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學生，他們的理論，在我們看來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堅持武裝鬥爭。革命就是搞武裝鬥爭。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一點上，他們堅持着完全正確的立場。他們一般都充滿着革命的氣概，行動積極。

因此，以古巴為首的拉丁美洲的革命學生，經常和蘇聯當局發生衝突。他們斥責蘇聯的“和平競賽、和平

共處、和平過渡”之類理論，完全是叛徒的理論，並和它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

宮本修正主義和蘇聯共產黨開始狼狽爲奸，蘇共機關報《真理報》等報紙上也就常常轉載《赤旗報》的文章。拉丁美洲的學生看了這些文章，便嘲笑我們說：“你們的黨最近開始強調和平過渡了，經過這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誰都清楚這類貨色是現代修正主義的論點。可是，到了現在，你們爲什麼倒開始說起那樣的話？你們雖然有點晚了，却正要加入智利和阿根廷的胆小鬼們的行列啦！”

宮本顯治自我宣傳什麼“獨立路線”，什麼在“兩條路線”上的鬥爭，什麼“創造性地在日本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這一套在國際上完全行不通。不管宮本顯治怎麼詭辯，他們說的“和平過渡”就是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提出的論點。在國際上，誰都清楚修正主義一方的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的路線和宮本修正主義路線基本上是没有不同的。如果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話，那不過是法國和意大利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點而代之以現代修正主義的論點在時間上要比宮本集團早得多。

在格瓦拉遭慘殺時，以拉丁美洲的學生爲中心，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前面舉行了抗議集會。他們說，格瓦拉的死告訴我們：“人民啊，要拿起武器起來鬥爭啊！”集會自始至終，每一個發言都是這個調子。我們雖然出席

了這個抗議集會，但是由於感到難為情，所以日本學生代表沒有能够在會上講話。說來也真不體面，我們當時，不得不逃避了講話。如果在那種場合，我們按照宮本顯治的路綫發表一通連武裝鬥爭的“武”字都沒有的講話，那就一定會被揍個半死。

我們對宮本的路綫完全墮落成修正主義，是十分了解的。我們也打算貫徹反修路綫，但是，我們和宮本在組織上還存在着聯系，即使心中明白外國同學的批評是正確的，但在國際場合却不能說。我們只是一再地深思。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對我們開始露出微笑，但是過去和我們一起從事反帝反修鬥爭的各國革命學生，却開始對我們厭惡了。我們迫切地感到，如果不和宮本集團從組織上決裂，進行鬥爭，就要被世界革命人民所拋棄。

同現代修正主義決裂

原田：從一九六七年九月起，宮本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和在莫斯科的日本真正的革命派，就要在組織上決裂了。這一年的暑假，對於我來說，實際上是大學生活的最後一次，因為就要畢業了。我利用這個假期到東歐國家去旅行了一次。當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逗留時，一位外國人告訴我發生了衆所周知的“北京機場事件”。日共

中央駐北京代表砂間一良和《赤旗報》駐北京記者紺野，盲從宮本修正主義，完全背叛了革命；這種傢伙被革命羣衆揪鬥，我覺得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我並沒有把這件事太放在心上。

八月底我回到莫斯科，發現氣氛有點異樣。當時還是暑假期間，可是在蘇聯各地留學的印尼學生，大批集中到莫斯科來了。仔細一打聽，原來他們再也不能在支持蘇哈托—納蘇蒂安法西斯政權的蘇聯留下去了。他們準備到中國去。當然，印尼學生內部也有少數人背叛祖國，忘記革命，只求個人的安全和享樂，而要長期住在蘇聯的。因此，印尼學生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鬥爭。

他們定九月六日自莫斯科出發。我當時也想和他們一起到北京，但是時間太匆忙，辦手續來不及，而且我還有許多事務需要在莫斯科辦，去中國的念頭就此擱了下來。在蘇聯，九月一日是新的學期開始。八月底來自日本的新學生陸續到達莫斯科，需要照顧他們，在他們辦理入學手續時做做翻譯，舉行歡迎會等。

九月中旬，日本學生會工作人員改選，我也必須投入力量，再以後是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們在迎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時，在日本學生中間廣泛組織了“學習十月革命意義的學習會”，深刻、徹底地討論列寧指出的“十月的道路”的精髓，拿它和蘇聯現

代修正主義的本質對照，討論蘇聯現在究竟是走着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問題。由於我們生活在現實中，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帶來的種種醜惡事例，早有深刻的體驗，大家都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抱着強烈的不滿和反感。特別是在低年級年紀較輕的學生中間，反感更是強烈。他們直接了當地說，從無產階級的立場看，現代修正主義是敵對階級的思想，絕對不能和它搞聯合行動和組成統一戰綫，要革命，除了走“十月的道路”以外，沒有別的途徑。

因此，一九六八年二月初日蘇兩國共產黨舉行會談，發表共同聲明時，在莫斯科的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大部份人的反應是：“日本共產黨被蘇聯共產黨欺騙了。我們不能受騙。”緊隨着共同聲明之後，《赤旗報》發表了社論《日蘇兩黨會談的意義》（註五）等文章，許多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人都斥之為滿紙騙人的謊言，根本不接受。

剛巧在這個時候，日蘇協會代表團來到莫斯科，他們說：“一九六七年夏天，從各國人民友誼大學畢業回日本的學生中間，有人熱烈支持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事很使人頭痛。”

“修太郎”壓制批評

原田：從這個時候起，隱藏在黨內有右的傾向的一

伙人，突然一個個伸出腦袋來，他們向支部委員會提出激烈的質問：“你們對回到日本參加‘毛澤東派’活動的一伙人，有什麼看法？”又說“支部委員會迄今的領導違反了黨中央的方針”。這一伙修正主義分子，甚至盜取回到日本的一貫堅持革命鬥爭的革命左派畢業生寄往莫斯科的信件，呈送修正主義中央。

面臨這種事態，我主張始終堅持反帝反修的立場，並公開宣佈宮本一伙已經完全墮落成反革命和現代修正主義分子。之後，我們組織了《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學習會。宮本修正主義中央領導機關在這年的春天（一九六八年四月），派了修正主義官僚津金佑近和阪本英夫到莫斯科，他們也不管什麼組織原則不組織原則，突然解散支部委員會，取消了莫斯科的學生黨組織。反對修正主義、堅持革命的學生黨員，被隨意“開除”出黨。我們堅決反對宮本修正主義破壞黨組織的活動，保衛了先鋒黨組織。支部委員會中背叛革命而墮落成宮本修正主義分子的，只有一個人。我也被宮本修正主義一伙“開除”了。“開除”我的理由也很特別，說是因為“原田幸夫對民主青年同盟的人說了既要革命就得豁出命來幹這樣一些狂言”。（笑聲）

經過這次事件，在莫斯科的組織中，左派也分了出來。我們同宮本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從組織上明確地決裂後，就能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組織鬥爭了。那

些追隨宮本修正主義的傢伙幹得也實在令人驚訝，他們馬上站在最反動的立場上，在日本學生中間扮演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的角色。情況變得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的人在റ日本學生會中發言都明顯地要比修正主義黨和民青的人進步了。

例如，在學習會上討論政治問題、階級鬥爭時，修太郎們就提出：不要討論政治問題了。我們說：“我們一貫都是站在向日本人民鬥爭學習的立場上的。羽田事件也好，佐世保問題也好，以及正在進行激烈鬥爭的各種各樣的日本學生運動也好，我們都必須加以考慮。”他們無詞以對，便說：“把不同的政治意見帶到日本學生中間，其目的只能是分裂學生。”他們連這種太不像樣的話也說得出口。這樣一來，一般日本學生也認為修太郎是在胡說，而根本不理它那一套。修太郎就在羣衆中更加孤立了。

修太郎還說些什麼呢？他們說：“學生的本份就是在學校裏讀書，不可太深地過問政治。我們只要拚命學好專業，到時拿到畢業文憑，就算達到目的了。”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要把學生中存在的關心政治、關心祖國人民解放的高昂革命情緒壓下去。

每逢一般學生對蘇修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爲和對蘇聯現狀進行批評時，修太郎們就說：“不對，你們的看法完全是錯誤的。”他們舉出一些根本不成其爲理由的理由，竭力替蘇聯的做法辯護。修太郎說：“蘇聯無論如

何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不會發生這類事情。”但是不管他們怎樣叫嚷，他們以為“不會發生的事情”，在蘇聯日常生活中不斷發生，這個現實，他們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抹煞的。因此，一般學生說修太郎“頭腦不正常”，都不理睬他們了。

結果，宮本修正主義一伙在莫斯科成了什麼樣子呢？有些癱瘓無力，絲毫不起作用，甚至脫離了修太郎的組織；另一部份人則變成非常殘暴的反動派，扮演特務的角色，妄圖使學生不關心政治，放棄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修太郎們怕被學生羣衆拋棄，頻繁地組織毫無政治性、思想性的郊游和旅行，妄圖博取學生的歡心，使他們只顧縱情歌舞而忘掉政治。

足立：一般說來，到蘇聯留學的外國學生，原本是帶有各種政治傾向的，但是他們通過在蘇聯實際生活的體驗，幾乎無一例外地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所做所爲進行了批判。也有人壓制這些批判。他們不但不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還要人們和它採取聯合行動，建立統一戰線。現在宮本修正主義集團正是起着這種作用。

原田：當北京的日本留學生奮起進行反修鬥爭的時候，《赤旗報》發表了一篇叫做什麼《學生黨員們學習吧！》和另外一篇叫做《住在海外的黨員做什麼》的兩篇“社論”（註六）。在莫斯科，當左派分裂出來的時候，修太郎們把這兩篇論文當作金字招牌打了出來，總是說

“照這個辦，照這個辦！”總之，過去有些本來就不大願意同修正主義進行鬥爭，想方設法逃避反修鬥爭的墮落的傢伙們，這個時候都趾高氣揚起來了。

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人民的團結大會

原田：一九六八年二月下旬，以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人為主，呼籲東南亞學生會聯合舉行一次“同美帝國主義戰鬥的越南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團結大會”。他們的基本方針是要和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開一個反帝反修的戰鬥的政治大會。

學校當局最初因為不知道集會的內容，馬上批准了在學校裏舉行集會，但是到了開會之前四五天，它知道了集會的內容，便說“為什麼不讓學校當局和共青團發言？”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學校當局把會議負責人找去威脅說：“這樣的集會形式是各國人民友誼大學開辦以來從沒有過的。你們是以客人身份來蘇聯留學的，還拿着蘇聯政府的獎學金。可是你們舉行集會時，却不邀請蘇聯主人，光是客人隨意集會。哪裏有這種荒唐的事？這簡直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做法。既然不讓蘇聯代表在會上講話，就絕對不准你們集會。”民青的學生不示弱，明確地回答說：“我們是要和真正地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人民携起手來幹的，蘇聯不是不真正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

嗎？所以我們不能和你們一起幹。”蘇聯當局照例說：“蘇聯正在援助越南。”青年們反駁說：“我們不把那種援助當作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證據。我們把搞這種騙人的援助而裝出進行鬥爭姿態的傢伙叫做修正主義者。”到了開會的時刻之前，雙方爭論還在繼續。這時會場已經擠滿了羣衆。這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很少見的一次政治大會。首先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學生代表，一個一個地起立發表充滿戰鬥性、革命性的演說，整個會場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氣氛熱烈。可是到蘇聯共青團的代表上台講話時，全場沒有一個人鼓掌。等到大學當局的代表上台講話，甚至有人退席。

佐久問：因爲這個，學校當局還大發雷霆。

原田：如果談到在莫斯科生活中的體驗，可以說，按照官本修正主義提倡的“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組成統一戰綫聯合行動”的路綫，是絕對不可能進行戰鬥的。問題在於：是同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團結，還是和廣大的各國革命人民團結？只能在兩者之中擇其一。所謂官本顯治的路綫，是一條和蘇聯修正主義者勾結起來，同世界反帝力量敵對的路綫。如果被認爲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是一丘之貉，那就必將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拋棄。

這次集會開完以後，大學當局立即把日本學生會的領導找去說：“日蘇兩國共產黨剛剛發表了共同聲明。讓我們忘記過去的不愉快，今後大大加強團結吧。”但是學

生會代表答非所問地說：“你說什麼？我們是日本學生會的代表，所以和日蘇兩黨毫無關係。”這句話使學校當局爲之啞口無言。（笑聲）

（註一）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召開。通過題爲《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緊密地團結起來》的決議。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爭論，採取嚴守中立，不介入的立場。

（註二）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召開的日共七中全會通過《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種問題的決定》，把方針改變成了在遭到別的黨攻擊時也不反擊的方針。

（註三）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召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確認了七中全會的立場。

（註四）一九六四年七月，蘇聯方面在《黨的生活》雜誌上單方面地發表了蘇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給日共中央的秘密信，挑起了日蘇公開論戰。

（註五）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發表《關於日本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的會談的聯合公報》，日蘇兩國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們取消一九六四年以來的斷絕關係狀態，正式恢復了關係。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赤旗報》發表了題爲《日本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會談的意義》的社論。

（註六）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的《赤旗報》社論《學生黨員和民青同盟盟員要更加努力學習》的社論。《居住外國的日本共產黨黨員要堅決保衛我們黨的路綫，堅持黨員的榮譽和覺悟》是《赤旗報》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社論的題目。

蘇聯的政治笑話

和豬在一起……

赫魯曉夫在職期間常訪問集體農莊。有一天，在赫魯曉夫視察養豬場的時候，當地的記者給他拍了一張照片。照片洗好後在編輯部却發生了一場糾紛。引起糾紛的原因是因為照片說明是這樣寫的：

“和豬在一起的赫魯曉夫同志。”

總編輯說：“把我們黨的領袖寫成和豬在一起，這不禮貌。”

於是乎大家都絞盡腦汁考慮怎樣寫才好。有一個記者提出：

“那就寫成和赫魯曉夫在一起的豬，這樣行吧？”

因為這個建議也不算高明，所以沒有被採納。又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建議。……

第二天，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刊登了一幅很大的照片，下面的說明是這樣寫的：“左起第三個是赫魯曉夫同志”。

五、毛澤東思想和各國留學生的動向

毛澤東思想給各國學生的影響

新谷：聽說我們回國以後的這一年期間（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在留在莫斯科的日本學生黨組織的內部，也出現了左派分出來的現象。在國際上，革命的左派也相繼形成。還聽到這樣的消息：不僅在各國人民友誼大學之中，就是畢業回到各國的學生，也在他們的祖國紛紛成立了革命左派組織。

在這裏，我們要談談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是怎樣滲透到在莫斯科的我們日本學生和各國留學生中去的？

我常為檢查清潔而到各學生宿舍房間去。一起檢查的，有蘇聯共青團的代表、宿舍負責人和大學當局的代表，加上我作為攝影記者，到各房間去看看。有些宿舍的房門是開着的，如果遇到鎖上的，宿舍負責人有一副鑰匙，就打開門進去。……每一個房間住着三個人。幾乎我們進入的任何一個房間，總在什麼地方放有毛澤東的像片。有照片，也有畫像，既有大張的，也有小張

的。蘇聯當局人員看不下去，罵一聲“這小子”，再到另一個房間去看，又發現有毛澤東主席像。如果只是少數房間有，也會有鎮壓的辦法，但是到處都有毛澤東像。這樣，它就不好下手干預，只得裝做看不見。在中蘇公開論戰非常激烈的時期，共青團曾經作出了取締中國方面的文件的決定。但是外國學生當中，仍然有很多《北京周報》和中國方面的小冊子。可是，像剛才說過那樣，它沒有辦法。加上連蘇聯學生實際上也想看，所以取締不了。

驅逐非洲留學生事件

佐久間：有個非洲學生，接到一道命令，以他去過中國駐蘇大使館為理由把他開除出學校，並且限令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蘇聯。這個非洲學生和我是經濟系的同班同學。那道驅逐令是星期天早晨宣佈的。因此星期二早晨以前，他就必須離開蘇聯。星期一上課不久，這件事情就在全系學生中傳開了，大家都說這樣幹還了得，紛紛聚集在經濟系大樓的門口附近。

那個非洲學生是位誠實、很用功的學生，是優等生，而且也還得到大家的信任。為什麼現在要將他驅逐出境呢？大家都火了。包括那些親蘇的學生也就是阿拉伯各國和智利、阿根廷的學生在內，大家都火了。我們

要求系主任說明開除這個同學的理由，羣情激昂。上課時間到了，學生們都拒絕進教室。經濟系大樓旁邊有一間禮堂，學生們蜂湧而入，坐滿了禮堂的座位，決定“叫系主任來！”把系主任叫來了，學生紛紛質問他：“聽說學校開除了非洲同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回答說：“我什麼也沒聽說。”於是，學生又追問：“如果是事實，你怎麼辦？”學生們說：“他是優等生，他同那些馬馬虎虎的學生不同，他是一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態度認真的學生。完全沒有理由把這樣的人驅逐出境。他的畢業論文快寫完了，打算在大學畢業後進研究院繼續學習。是一個有學者素質的人。”

系主任答覆學生的質問說：“如果是事實，實在令人遺憾。正像大家所說的，完全沒有理由開除他。他馬上就要畢業了，我要設法至少把他留到畢業。”

原田：他還說：“要設法爲此而努力。”

佐久間：系主任答應到校長室去弄清楚把那個非洲學生驅逐出境的真相。因此，事實上，這天是等於罷課了。以非洲同學爲首，同學們還利用這個時間發動了簽名運動。同學們說：“要查清這一事件的真相，要在弄清真相之前，暫時延期執行把他驅逐出境的命令。”事情鬧得太大了，教師們也都停止了講課。

系主任一回來，大家又都集合起來。系主任說：“那個非洲學生去過中國大使館，散發中國文件，所以決定

把他驅逐出境。”“你胡說什麼？”大家吵吵嚷嚷，鬧得好比是捅了馬蜂窩。“到中國大使館去有什麼不好？”系主任不得不說：“的確，到中國大使館去也不是壞事。”

原田：學生們要求從法律的觀點來解釋這一點，法律系副教授答覆質問說：“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笑聲）

佐久間：蘇聯當局不顧學生這樣的反對，結果仍然使用權力將那個非洲學生强行遞解出境。這一天的下午，校園裏出現了大批“戈別烏”的便衣特務，嚴密進行監視，並且跟踪那個非洲學生，使他不能活動。到星期二凌晨兩三點鐘，在黑暗中，一輛汽車駛入學校宿舍來接他。他走出宿舍雖然是在深夜，但是宿舍裏法律系和經濟系的許多學生都起來了。我們聚集在那裏，高唱《國際歌》，回頭一看，背後已經站滿了“戈別烏”的便衣特務。

這個事件，是最好的實際教育，它說明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是什麼東西。蘇聯當局從各國招來了許多留學生，負擔他們留蘇期間的一切費用，施以五年的教育，結果把學生一個接一個地培養成為真誠的反修戰士。

原田：當時，我曾到飛機場去給他送行。到機場時是早上三、四點鐘，那裏已經佈滿了“戈別烏”的便衣特務。據那個非洲同學回國後寫來的信說，有兩名蘇聯“戈別烏”的特務隨機一直跟他到開羅。而且聽說，這兩

名特務在判明他確實離開了蘇聯以後才返回去。

佐久間：這件事情以後還有這樣一段插曲：蘇聯當局雖然把他開除了，但是事情竟發展到舉行罷課的地步，他們很是慌張。那個非洲同學被解送回國兩三天後，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一則消息進行反宣傳，說是因為那個同學進出中國大使館，所以將他驅逐出境。並且配了一條反華報道。在大學裏，蘇共黨員也到處進行反宣傳。有一次我偶然到學校負責人的辦公室去，他立即從辦公桌抽屜裏拿出那則《消息報》消息的剪報說：“喂！這段新聞你看了沒有？”我說：“這個麼，我看過了！那是謊言。”“他定期地到中國大使館去，並且散發文件，這怎能是謊言？”我說：“是謊言！”他說：“不，我們有證據。他把從中國大使館帶回來的文件一份一份地塞進掛在學生宿舍進口處同學們的大衣口袋裏，這是確鑿的事實。”我格格地笑着說：“正是因為這樣，我才說這是謊言！”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捏造，我們有確實的證據。”我便頂他一句說：“就是因為你們拿這種一眼就能看穿的隨便捏造出來的謊言去騙人，所以人們就不理睬你們。”他以爲我在侮辱他，氣得臉色都變了。我又對他說：“你是知道的，學生宿舍入口處根本沒有掛大衣的設備。”（笑聲）“正因為你們這樣胡說，就使自己的信譽更加掃地。宿舍入口處是沒有衣櫃的。”我這麼一說，那個負責人便說：“照你那麼說，是沒有啊！”（笑聲）

蘇共黨員都分頭竭力傳播捏造的情報，但是，他們都是一些沒有頭腦的傢伙，所以各國學生們越來越嗤笑他們。他們說：“確實沒有衣櫃。”同學們便追問他們：“喂，那麼往哪裏塞中國宣傳品？”如果他們閉上嘴，也就完了，可是他們接着說：“他是進入各個學生宿舍房間內，把宣傳品塞進掛在門口的大衣口袋裏。”（笑聲）

原田：閉着眼睛說瞎話，而且若無其事，這是修正主義者的伎倆。這種作風，從上到下，無不如此。

我們同各國留學生們建立在無產階級 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 和“修太郎”的孤立

佐久間：當我們鮮明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奮起反修，建立革命左派組織開始鬥爭時，修太郎們的反革命的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幹出了極為卑鄙無恥的勾當。

修太郎馬上向蘇聯當局告密，指控我們誰是“毛澤東派”，因而要求大學當局立即予以開除。他們又到處對各國學生散佈說：“他們是‘毛澤東派’，今後你們要同日本學生聯系時，不要同他們來往，而要同我們聯系。”

倒真的多虧修太郎這麼一宣傳，各國革命學生相繼跑到我們這邊來，對我們說：“萬一你們有什麼困難時，

立刻通知我們。我們一定盡一切可能援助你們。如有必要進行動員，我們就動員人。”這些話使我們感到說不出的高興。我們從來沒有像這個時候這樣體會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可貴。

這以後，大學當局把我們叫了去，問我們：“聽說你們成了‘毛澤東派’，是真的嗎？”我們說：“我們一貫的信念絲毫也沒有改變。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

他說：“在學校方面看來，你們對中國文化革命的評價，壓根兒就和宮本領導機構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聽說你們現在和宮本領導機構的關係決裂了，也並不奇怪。我們尊重始終忠於自己的信念的人。”學校負責人的話，使我們感到有點意外。

從這以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學生們，把修太郎的一言一行及其動向一一告訴我們。我們對修太郎的動向瞭若指掌。我們就根據這些情報，連續不斷地向盲從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的那一伙人開火。

等到我們在大學畢業回日本時，儘管沒有邀請，但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學生，紛紛特意趕來機場送行。至於修太郎們，他們縮成一堆，像是鬼鬼祟祟逃跑一樣，離開了莫斯科。當然，沒有一個外國學生去給他們送行。

原田：講起那種國際性的援助，使人永誌不忘。左派分出來後，各國革命學生經常鼓勵我們。他們給我們

提供了特別是關於世界局勢、日本局勢和學校內部動態等詳盡的消息。

例如把世界上各種共產黨，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黨和修正主義的黨雙方對四・二九文章（註一）的反應，告訴了我們。特別是有幾位以法語為祖國語言的黑人同學等，把這些反應逐字逐句從法文翻譯給我們看。他們說：“日共宮本領導集團也公然地走上了‘和平過渡’和‘反華’的道路。所以你們要充分提高警惕。”

佐久問：我們和宮本集團決裂之後，在莫斯科也毫不孤立。不僅不孤立，反而更加加強了國際聯系。我們根據迅速而準確的情報，不斷地主動對修正主義者發動進攻。

修太郎採取了不和我們交談的方針。在路上，在走廊，大家碰面時，他們急急從旁邊避開，逃之夭夭。有一次，我在飯堂裏面碰到一個民青（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簡稱，此係日共宮本修正主義集團控制的青年團組織——譯者）的女同學，我向她打招呼：“你好！”她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你好”之後，猛然覺醒地大喊：“哎呀！糟了，和他們講話了！”她急忙掩嘴而去（笑聲）。我們總是主動地找那些喪失了信心的傢伙談，因此，修太郎照例揮舞“組織原則”，下了緘口令。

不僅如此，修太郎們也不同意一般學生來往。因為一見面，就必然會向他們提出關於“毛澤東派”的問題，同

他們進行辯論。辯論一深入，他們就無言以對，所以他們除了和自己的一伙人來往以外，不和其他人接觸。這樣一來，他們就真正把自己孤立起來了。最後，他們一小撮人徹底和外界隔絕，把自己終日關在房間裏，變成一羣見不得人的人。

原田：的確，我們在莫斯科看到了修正主義都沒有好下場——不管他是蘇聯的，還是日本的。

佐久問：說來也真有趣，我們這些在莫斯科被貼上“毛澤東派”標籤的人，昂首闊步地來去活動，而那些只知向蘇聯當局巴結的修正主義者，却過着見不得人的生活。事情就是這樣明擺在那裏。

足立：話又說回來，我在那所大學感到最好、最受感動的，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國際團結。最能表現出這種精神的，是我們因為越南問題而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舉行示威的時候。有些同學的國籍，即使打開世界地圖，一時也難以找到他們的國家所在。我們大家手挽着手，為反對共同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流血戰鬥。有人說，把特定的政治立場或政治路線帶進來，國際團結或國際友誼就建立不了。這是豈有此理的說法。只有明確世界人民的真正敵人，認清了鬥爭方向，毫不含糊，才能夠建立起真正的戰鬥的國際團結，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國際統一戰綫。

各國留學生對“日本晚會”的援助

足立：在那次援越示威過後，我們日本學生受到大學當局的鎮壓。正好在這次示威的一個星期之後，決定要舉行“日本晚會”。這類晚會，是由各國留學生自己舉辦的，演唱民族歌舞和戲劇，舉辦圖片展覽和木偶展覽等，目的是爲了向其他外國學生介紹本國情況。日本學生會每兩年舉辦一次這種晚會。

大學校長正式拒絕接受出席這一次“日本晚會”的邀請。這一來，所有的蘇聯師生，從大學教授、共青團員到蘇聯學生，都不來參加了。即使沒有這個原因，因爲舉行“日本晚會”的地點是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當時許多人都擔心參加的人數可能很少。

可是外國同學獲悉我們因爲參加那次游行而受到蘇聯方面的壓力，都來援助我們。中國學生表示，一定動員到日本方面所希望的人數前來參加晚會。我們覺得，如果全是中國人來參加，也不好辦，就說請動員這麼些人來。到時候，果真中國學生按我們的要求如數前來參加。越南學生也表示全力支持我們。拉丁美洲的一個學生，一向不參加任何國家學生舉辦的晚會，這一回他自動和大家一起來參加了。他說：“我要先聲明，我不是來看你們的歌舞表演的，我是爲支持你們的鬥爭而來的。”

在這種氣氛中我們舉辦了“日本晚會”。大學當局派人來窺測，想不到滿場盡是來賓，氣氛非常熱烈。他們仔細一看，發現他們所最害怕的中國學生也大批到場，簡直嚇破了胆。

同中國學生的友誼

新谷：印尼學生處於流亡狀態，環境非常惡劣，可是他們反而在各方面援助日本同學，完全是忘我的，並且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是真正無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這使我們非常感動，也使我們強烈地感到：革命運動就是建立在這種國際團結的基礎上的。

還有值得一提的，中國學生和我們日本學生的友好關係，這是在莫斯科最令人愉快的回憶。我們兩國學生在莫斯科，曾經共同進行了反修鬥爭。以後，就是在官本一伙惡化了對中國的關係之後，我們兩國學生之間的友好關係，也絲毫未受影響。一九六六年十月，蘇聯片面地趕走在蘇聯留學的全部中國學生。

這時，我們舉行了簡單的送別會，並到車站送行。這些事情，現在說起來很簡單，其實不然。當時監視非常緊，學生宿舍看門的知道是中國同學就不讓進去。要在我們的宿舍舉行送別會，首先要解決怎樣使中國學生進入我們宿舍的問題。到車站去送行也是如此。

當時，蘇聯方面對給中國人送行的各國學生施加了壓力。例如蘇聯外交部打電話給北越駐莫斯科大使館，說“不要讓越南學生給中國學生送行”。因此，北越大使館向越南學生發出一個通知：“十月二十七日，中國學生將乘從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開往北京的國際列車，全部回國。蘇聯外交部要求越南學生不要去送行。”對於這個通知是什麼意思，越南學生分別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並據此採取了行動。

佐久間：我們在暑假期間到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去旅行，在愛沙尼亞的塔林車站一下碰到幾個中國留學生，彼此感到很親切，我們就站在月台上親密地談了好久。和我們一起去的外國同學問我：“你們以前就認識嗎？”我說：“不，我們以前根本沒有見過面。”他奇怪地問：“那麼你們怎麼會談得那樣親密？”這時，一個中國學生對他說：“是的，因為我們是站在同一戰綫最前列並肩戰鬥的同志啊！”（笑聲）

宮本一伙的“獨立自主”路綫

原田：我們同認真地考慮革命問題、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鬥爭的各國學生，堅持團結到最後。如果追隨宮本顯治路綫，我們就要和這些人完全斷絕關係，而他們就會同我們一直蔑視的如同蛆蟲一般的傢伙們握

手。在莫斯科，這個區別可以說是極端明顯的。所以，不管宮本顯治怎樣虛張聲勢，怎樣飛揚跋扈，宮本顯治的路線在國際上是完全行不通的。

新谷：宮本顯治一伙所幹的，正同蘇聯十年前所幹的一樣。宮本一伙的學生們根本不搞思想鬥爭或者理論鬥爭，要求於他們的只是服從“組織原則”。他們只讀《赤旗報》，就是不想聽到不同的意見，特別是不讓聽到毛澤東思想，等等。（笑聲）因為他們一旦開始考慮這些事情，思想就混亂了。哪裏有什麼“獨立自主”，完全成了一些有嘴說不了話、有耳聽不到意見的人。

足立：他們就是所謂不看、不說、不聽的傢伙。用這種辦法搞，墮落得快，非常快。因此，當然拿不出在國際上能夠說服人的理論和路線來。

學習毛澤東思想

新谷：這裏想談一談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我們在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跟前，看了幾年蘇聯的現實，自然不能不認真地重新思考這樣幾個問題：“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蘇聯現在還能說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究竟什麼是現代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以什麼形式產生的？怎樣才能克服現代修正主義？”

宮本領導集團始終一句也回答不出我們所面臨的這

些問題。只是說：“你們對這些問題有興趣，這是好現象。不過，你們應該遵守組織原則。”反而威嚇提出這種問題的學生。我們沒有辦法，只好輪流地站在宮本領導集團的立場上，分成回答問題的和提出問題的，進行模擬討論。

關於這些問題，過去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公開論戰中，曾經大加爭論。我們在莫斯科，就國際論戰，對照許多資料和經典著作，用心進行了學習。最後的結果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來看，很容易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是最正確的。

在我們討論、學習的期間，中國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聽到這個消息，認為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好得很的事情。我們想，要徹底地研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學習這場大革命。我們越是學習，就越是感到需要重新全面地學習毛澤東思想，重新徹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單單是中國所需要的革命，我們本身所面臨的任務，在本質上也是相同的。我們從學習中理解到不能把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作是別的國家發生的革命，而站在一邊旁觀，我們自身也應該發動一場在本質上與它相同的革命。

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畢業回國，親身接觸日本的現實，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當時在莫斯科思考的問題是正確的，所以就立即選擇了加入日本的革命左派進行鬥

爭的道路。一九六八年畢業回國的同學，也在一九六七年這一年內，在莫斯科公開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進行造反，展開了鬥爭。

原田：在莫斯科，誰只要追隨宮本修正主義路線，就絕對不再可能進行鬥爭。特別是一九六八年二月，日蘇兩黨會談的結果，宮本修正主義公然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勾結在一起，完全走進了死胡同。凡是嚴肅地考慮日本革命的學生，越是認真閱讀宮本領導集團的那一連串又臭又長的論文，就越是糊塗，從而喪失了信心。這種情況在高中一畢業就來莫斯科的年輕人中間特別多。那些出於一己的私利而追隨宮本顯治的傢伙們，當然在理論上已經完全喪失了信心。

正是因為學習了毛澤東思想，才打破了這種困境。在組織上分裂以後，堅持革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朝氣蓬勃，滿懷信心地進行了鬥爭。而墮落為宮本修正主義的人的狀態是，儘管受到蘇聯政府的庇護，却表現非常自卑自餒，在大學中甚至不能抬起頭來走路。

我在莫斯科，從一九六七年九月到十二月，化幾個月時間學習了四卷《毛澤東選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硬趕的，但也是以革命的氣概把它讀完的。這時我又得到了俄文和英文的《毛主席語錄》。

這本《語錄》不單單是一本把《毛澤東選集》等著作中的重要文章摘錄而成的書。它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

想的方法之一，發揮了巨大的力量。我們把它從頭到尾反覆讀了三遍，然後努力活學活用。我們每天交談自己是怎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而且，對照《語錄》檢查工作，進行互相批評。我們還提出解決不了的問題，進行討論，對照毛澤東的著作，考慮站在毛澤東思想的立場上怎樣認識這個問題才對。這是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特別是青年，一旦開始學到毛澤東思想，就會充滿革命熱情，信心非常強，變得真是富有戰鬥精神。而這種革命氣概，在宮本修正主義那裏是已經無影無蹤了。

從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發展到 同自己的修正主義作鬥爭

佐久間：我在去蘇聯留學的時候，沒有想到蘇聯是修正主義。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我到蘇聯去時，原抱着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蘇聯革命後幾十年教育出來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新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在我初到蘇聯的一段時間裏，雖然看到種種和我想像中完全不同的嚴酷的現實，但我總是這樣自我寬解：這大概是例外吧；而例外是哪個地方都有的。不能僅憑一些例外的事件，就把整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都看成壞現象。但是隨着時日的逐漸消逝，我在蘇聯每一天都看到

同樣的荒謬事物，這才懂得，這絕對不是例外，而是成了蘇聯社會上的典型事物。

以後，日蘇兩黨也發生了爭論，在國際上也發生了各種爭論。在這當中，我們才理解，蘇聯這種現實，是現代修正主義帶來的。在我們親身體驗了蘇聯嚴酷的現實和對我們進行的顛倒敵我關係的鎮壓，才想到必須同它進行鬥爭。對於這一點，不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全都超越了政治立場的不同，或多或少地考慮到了這件事情。這個時候，我們想得最多的是，不能只是抓住表面現象而議論蘇聯的壞話。

在我們中間，什麼是社會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怎樣才能克服修正主義，也常常成了議論的中心題目。這個時期，我們相當努力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學習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增加知識，而是要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思想，使我們也能够運用這種觀點來分析事物，培養自己作爲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判斷能力。我們本着這樣的態度用心地進行了學習。這是極其初步的，然而有助於我們掌握基本觀點。

在我來說，雖然主觀上要堅決地站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立場，但是儘管如此，在自己的工作中，却發生種種的缺點和錯誤。當我們互相批評的時候，不僅是指出你這一點不對，那一點有錯誤，而是深刻地進行批評和

自我批評，弄清錯誤產生的根源究竟是什麼。這樣，就懂得了，儘管自己認為是站在反修的立場上，實際上自己的思想中也有修正主義。在對它進行徹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當中，我們才能更正確地知道什麼是修正主義。回顧自己在莫斯科的五年生活，我感到要說得到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這一點。必須任何時候都堅持鬥私批修。必須根據這個觀點，經常地檢查自己的思想。

批判蘇聯的現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總結工作，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由於這三個因素的作用，使我們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提高。正是這個時候，《赤旗報》那篇二·四文章發表了。沒有用上述態度進行學習的一伙人，他們過去雖然也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批判，把蘇聯的現實說得一錢不值，但對於這篇文章的本質，却完全看不出來。我們讀了文章後，就看出是一派胡言亂語，它就是現代修正主義。從此以後，我們親眼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宮本集團一步一步地墮落下去的過程。抽去自我批評的觀點，只是單純地罵宮本顯治，罵蘇聯，這是投機分子也可以做到的。如果裝出一副中國的朋友的樣子，那是可以盡情地說宮本顯治和蘇聯的壞話的。但是，這並不是真革命。這樣的人歸根到底是要掉隊的。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辨別這種人。

足立：這是今後我們在日本建立工人階級真正的先鋒黨，建立革命的左派，推動日本革命前進時所不能忽

視的。批判宮本集團的那個說法，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這個做法，固然重要，但是，這畢竟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而更重要的一個側面始終是，我們自己要嚴格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開展黨的工作；從鬥私批修的立場經常進行互相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工作，把日本的革命運動不斷推向勝利。

新谷：在中蘇公開論戰剛開始，中蘇兩黨的關係嚴重惡化，但是日中兩黨關係還保持着良好狀態，到中國訪問過的日共領導幹部，曾到莫斯科向我們作報告，講述中國的情況。記得那位日共領導幹部這樣說，中國受到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很大的打擊。中國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非常憤恨。但是中國並不僅僅是只在口頭上抨擊蘇聯修正主義而已，它還探討為什麼在蘇聯發生了現代修正主義者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的情況，產生現代修正主義的社會和歷史的因素，檢查本國有沒有產生現代修正主義的因素。經過調查研究，果然發現在中國也有產生修正主義的許多因素。中國現在雖然在大力批判蘇聯，但是說不定中國也有一天會重走蘇聯同樣的道路，說不定在中國也將發生現代修正主義，它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的事態。即使現在不發生這種事，幾年、幾十年、幾百年以後也可能發生。現在，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正在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

聽了這個領導幹部的報告後，我們受到很大的感

動。不久之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這個消息使我們受到很大的震動。因為中國不只是在口頭上批判修正主義，而且是把這種批判付諸實踐了。還是幾億人民一起投入這個偉大運動的。

現代修正主義是怎樣發生的？怎樣才能防止和克服現代修正主義？從正面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並且從理論上到實踐上指明正確的解決方向的，正是毛澤東主席。要真正和修正主義進行鬥爭，必須自己也進行鬥私批修。要徹底地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和宮本修正主義。同時也要對自己頭腦中和自己隊伍中存在的修正主義進行鬥爭。這才是對修正主義全面地展開鬥爭。鬥私批修，無論對於個人、對於黨都是必須進行的。

與此相反，宮本一伙是怎樣幹的呢？他們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却這樣說：“我們過去和你們有過小的爭吵，那是因為蘇共干涉我們黨的內政引起的。今後我們兩黨各自獨立自主，對於對方的事情不要說三道四。”（笑聲）如果按照我們的事你不要說三道四的原則去辦，那就是說，蘇聯共產黨的思想如何，你不必理會它，只要你遵守“組織原則”，至於共產黨員的思想、信仰，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請問這樣怎能克服現代修正主義？

佐久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起時，我們大學裏的蘇共幹部問我：“你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是怎樣認識的？你個人的見解怎樣？”我當時就直截了當地說：“這場文

化大革命實在好得很。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論戰的一個重要的結論。從此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可以說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不過，這一場新型的革命鬥爭，必須在你們的國家，就是在你們這個蘇聯進行。”那個蘇共幹部被我說得直瞪着兩眼，無話可說。（笑聲）

足立：我們回國以後，和許多人談起蘇聯的各種社會現實，他們聽了後都說：“這樣看來，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了！”“毛澤東的確偉大！”

過去俄國進行革命時，帝國主義者曾對它發動干涉戰爭，企圖將新生的社會主義俄國扼殺。當時世界的革命人民就說：“這個革命不僅僅是俄國人民的，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產物。”他們奮起為捍衛社會主義俄國而進行了鬥爭。如果現在還堅持這種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就必須堅決地同葬送了社會主義革命果實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作鬥爭。應該在人民面前說明蘇聯變質的現實，指明怎樣才能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變質，怎樣才能堅持革命的精神，怎樣才能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並且發動人民來參加這場鬥爭。但是，現在宮本修正主義集團却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辯護，美化它，掩蓋其現實，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一個字也不批評，另一方面又幹着同印尼蘇哈托法西斯政權一樣的反華、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勾當。

蘇修和口修的反華大合唱

新谷：從來所有的革命，總是遭到反動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大肆辱罵。蘇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不久，世界各國反動派一致對列寧極盡詆毀之能事。他們說：“列寧這個冷酷的人進行糟塌破壞，把俄國人民逼上了生靈塗炭的災難境地。”對這次中國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樣，《真理報》等報刊都闢了叫作“中國發生的事情”的大專欄，天天都在說什麼紅衛兵和工人發生衝突了，哪裏又殺了人了，哪裏又罷工了，報道“毛集團”在“破壞”中國的消息。他們乘此機會瘋狂地煽動反華情緒，他們甚至這樣寫：“破壞活動”越過了中國國境，也波及到了蘇聯。

對這些瘋狂的反華叫囂，我們根本不予理睬。我們認為這些反華宣傳，只是反革命分子所搞的十足的造謠誣衊的伎倆。然而蘇聯是從幾年前就系統地在進行反華宣傳，現在，《赤旗報》也幹起來了，只不過比蘇聯晚幾年而已。而且是把過去蘇修報刊上的陳詞濫調翻譯過百分之五、六十來刊載，宮本集團跟在別人幾年前的反華大合唱調子的屁股之後，也來搞反華，實在太拙劣了。

世界性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新谷：在今天的世界上，一面瘋狂地反對中國，一面却叫嚷要結成反美國際統一戰綫，這種做法已經行不通了。爲什麼？在我們大學裏面，世界各國有正義感的、進步的學生，都對中國、對毛澤東抱有非常強烈的親切感。印度尼西亞的留學生，包括印尼民族黨的成員在內，都認爲除非按照毛澤東思想進行武裝鬥爭，否則祖國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

非洲許多國家現在還沒有創立共產黨，但是來自非洲的學生，也在某種程度上直覺地感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只有依靠毛澤東思想。在莫斯科，當然很難獲得毛澤東的著作，但非洲同學知道我們有一些毛澤東的著作後，就忙問我們從哪裏得到的，他們想要。這些非洲學生看到中國那種敢於和美國、西歐各國以及蘇聯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的氣概，產生了一種可以指望和友好的感情。他們感到中國是可靠的朋友，因此他們有了要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情。排除一貫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而侈談什麼反美國際統一戰綫，是絕對不可能的。

足立：除了本來就是出賣靈魂的傢伙或者心裏根本沒有革命的傢伙不在話下外，只要是稍爲認真考慮一下自己祖國的解放問題的學生，經過在蘇聯學習五年、七

年到回國時，大部份都成了反修的左派。這是世界各國學生的共同點。

佐久間：有一位非洲學生，讀完了經濟系即將回國。在他離開學校宿舍時，他的朋友都到宿舍門口話別。這位非洲同學最後說出這樣一番話：“各位爲我送行，非常感謝你們。如果以爲我在這裏學習了整整五年，回國後就會成爲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同路人，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在莫斯科最大的收穫是認清了什麼是現代修正主義。因此，我回國以後一定堅決和現代修正主義作鬥爭。各位同學，希望我們要不惜犧牲一切，畢生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啊！”這幾句話說得大家異常激動，當場歡呼聲四起。看到這種情景的蘇聯特務學生，立即通知了秘密警察。這位非洲同學到機場時，秘密警察已經在那裏“恭候”了。蘇聯特務對他說：“你發表了極其荒謬的反蘇演說，不能就這樣讓你回國。”說完就要把那個非洲同學押走。

但是，偏巧那個非洲同學所屬國家的大使館人員也來機場送行，看到這一情景，立即上前從蘇聯特務手中把那個同學搶過來，坐上大使館的汽車帶回大使館，把他保護了起來。

新谷：我有一個美洲黑人同學，來自馬提尼克島。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同住了一個房間。他在上學最初的兩三年，同蘇聯方面關係非常密切。他也常談論革命。等

到讀完五年大學課程回到馬提尼克島之後，他變成了左派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歸根到底，一個人只要不忘記革命，認真地追求革命真理，最後總會走上共同的革命道路的。

足立：馬提尼克島這個名字比較生疏……

新谷：它位於古巴以東，是一個小島，過去是法國的殖民地。

佐久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開始後，各國的共產黨在走革命的道路還是走反革命的道路這個問題上，一個接着一個地分成左右兩派。特別是從我們學校的情形來看，在拉丁美洲，這種分裂是激烈的。他們祖國從事解放鬥爭的政黨，一般是非法的。把“和平過渡”路線搬到那種地方，黨內就必定發生分裂了。因此，首先是本國的黨分裂，接着在莫斯科的組織也隨之分裂，這些國家的學生會也分裂，所有的附屬組織、團體都不例外地分裂。一方堅決高舉革命旗幟堅持武裝鬥爭；另一方則一心走“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的道路。

足立：這已是國際上普遍的現象，在世界範圍發生了。

原田：拉丁美洲有三大派：一個是格瓦拉、卡斯特羅系統，一個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是修正主義的胆小鬼們。格瓦拉、卡斯特羅系統和毛澤東思想系統，在搞武裝鬥爭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在用馬克思列寧主

義武裝起來的先鋒黨這個問題上，意見又不同了。他們到一塊兒就展開激烈爭論，很是熱鬧。

破“私”立“公”

新谷：各國的普遍現象可以說是，革命的左派和修正主義劃清界限後，修正主義方面即便人數多一些，也是完全軟弱無力的。而且他們一般都不准說“過激”的話（笑聲），不談論革命。他們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大人物們的競選活動，因此，不參加競選的下級黨員，就盡量迴避政治問題，眼光只集中於個人的利益。他們的路綫不是破“私”立“公”，恰恰相反，而是破“公”立“私”。所以，革命熱情啦、革命幹勁啦、戰鬥的態度等等，一股腦兒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即使修正主義暫時在人數上佔多一些，也是有氣無力，軟弱無能。

再加上特別是像日本的宮本修正主義那樣，在理論問題、路綫問題上還不如意大利修正主義明確，所以就盡量逃避這樣一些問題。因此不管問他什麼問題，就只能回答“遵守組織原則”這一句話了。

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新谷：使莫斯科的宮本修正主義分子陷入最大窘境

的，就是他們總想壓制廣大學生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現實的批評，他們千方百計為蘇聯辯護。但他們也只得說：“這就是社會主義，所謂社會主義，現實就是這樣的。”所以這種“社會主義”，對誰也沒有吸引力，更沒有人願意為實現現在蘇聯這種“社會主義”而賣命。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話，那就敬謝不敏了。

宮本一伙仍舊極力花言巧語地把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叫作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一旦發生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這種問題，就陷入了窘境。他們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也搞侵略。雖然進行了侵略，蘇聯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不僅僅是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就是宮本集團也在瘋狂地宣傳“社會主義國家的侵略性”。

然則在宮本一伙所指的“社會主義國家”裏，既有侵略，又有壓迫和剝削，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又有什麼區別呢？

（註一）指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赤旗報》評論員文章《極左機會主義者的中傷和挑釁——粉碎對外盲從分子對黨的謾罵的造謠誹謗》。這篇文章的發表，表明宮本一伙已經無可挽回地跌進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平共處”和反革的泥坑。

六、斯大林問題和現代修正主義

以實用主義改變對斯大林的評價

新谷：蘇聯自從爆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來，到今年十一月已經五十二年了。其中現代修正主義明目張胆地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不過是最近十多年的事。在此以前的四十年間，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勝利地保衛了社會主義成果，那是一段光輝燦爛的歷史。要研究蘇聯五十年來的歷史，撇開斯大林領導下的三十年是無法進行的。

像我們這些學經濟學專業的人，在學習蘇聯革命以後到現在的經濟歷史時，最初還可以稍許讀到列寧的話。那是因為如果撇開列寧，就什麼也沒有了。等讀到列寧逝世以後的三十年，則等於是空白。接着在書中就突然出現了赫魯曉夫。可是，最近連赫魯曉夫也在書上失蹤了。這回又輪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繼列寧之後突然出現了。（笑聲）

在蘇聯，就是現在，談論斯大林仍然是很危險的，所以忌諱談他。赫魯曉夫下台以後，在召開第二十三次

黨代表大會以前的這段時間，人們都說“在這次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將要在相當程度上恢復斯大林的名譽”，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但是，結果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

那麼說，現在在蘇聯，斯大林的形象是不是一點也沒有重新出現呢？不是的。斯大林的形象仍然以某種形式重新出現了。例如：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一星期左右，我去參觀莫斯科的蘇聯中央軍事博物館，當時展出了三十張左右的斯大林的照片。在這以前，全博物館連一張斯大林的照片也看不到。但是，這一次却展出了。博物館的講解員還介紹說，在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設立了以斯大林為主席的國防委員會，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進行了戰鬥，從而取得了勝利。斯大林的照片過去一張也沒有，而現在能見到幾張。斯大林的形象就是以這種形式重新出現的。而這次却恰恰相反，赫魯曉夫的照片在博物館裏卻一張也看不到了。連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照片也不掛了。為什麼呢？因為那些照片上都有赫魯曉夫演講的鏡頭，所以拿不出來。

以後，到了“二十三大”，格魯吉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在演說裏說：“我們為什麼能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戰勝納粹德國？那是因為全體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心協力地進行了戰鬥。”一般蘇聯人聽到這種演說，立即就會明白這是在肯定斯大林。這是因為，斯大林在

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無視這一點，就絕對無法談論偉大的衛國戰爭。所以，蘇聯在慶祝對德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的時候，斯大林的名字也稀稀拉拉地出現過。

在“二十三大”上，把第一書記的名稱改爲總書記，把主席團改成政治局。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只不過是改變一下官銜的名稱，在日本來說不過是換一個圖章而已。可是，第一書記和主席團的名稱是赫魯曉夫起的，因此廢除了。而總書記、政治局則是和斯大林聯系在一起的名稱。從赫魯曉夫的第一書記變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總書記，而蘇聯共產黨的本質却沒有任何變化。這一點姑且不談。但是，這種名稱的改變，我認爲，它給一般蘇聯人民造成了這樣一種強烈的印象：赫魯曉夫被否定了，斯大林時代的東西又恢復了。

在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共和國，就是現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是好的。然而，這種評價不是把斯大林當作勝利地保衛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當作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革命家。格魯吉亞人對斯大林的評價，是說在自己的故鄉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英雄。

特別是到蘇共“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徹底地推行了“批判斯大林”的勾當，把同斯大林有關係的事物全部搞掉了。從列寧斯大林陵墓把斯大林的遺體運出去燒掉，取消了用斯大林命名的市鎮、工廠、農場和學校的名

字，把所有的斯大林像和繪畫都破壞無遺。“二十二大”以後，豎立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的斯大林大銅像，當然也遭到了破壞。針對這種作法，有人號召保衛斯大林銅像，特別是學生進行了激烈的反抗。赫魯曉夫派出軍隊開了槍，打死相當多的人，硬是把斯大林像拆掉了。這是聽格魯吉亞人說的。

原田：現在在蘇聯，誰都不正面回答關於斯大林的問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這樣。說斯大林是個非常威嚴的大人物，是一位偉大的人物，這樣表示懷念斯大林的人是有的。但是，能把斯大林同思想問題、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聯繫起來，而有正確認識的人，我們還沒有遇見過一個。

斯大林領導下的三十年，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十年。對於這個時代，是把它當作充滿恐怖和黑暗的時代來評價呢，還是把它作為不惜一切犧牲從國內外敵人的威脅下勝利地保衛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的時代來看呢？斯大林問題，正是蘇聯存在着的堅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傾向，同要把蘇聯拉回資本主義的傾向進行激烈鬥爭的焦點之一。從這個意義來說，斯大林在蘇聯國內受到怎樣的評價，這是測定蘇聯的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力量對比的一個晴雨表。

佐久間：在研究斯大林問題時，最常遇到的，就是蘇聯現在的官僚們所奉行的實用主義。這一點，到處都

會碰上。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斯大林陵墓搬出去葬掉的時候，我還沒有去蘇聯……

新谷：那是在我去留學以前發生的事。因此，比我高一個年級同學看到過斯大林的遺體，而我去的時候，已經沒有斯大林的遺體了。

佐久間：我們一到莫斯科，就立刻去參觀列寧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但是館內連斯大林的“斯”字也沒有了。可是，講解員在說明裏，却左一個斯大林，右一個斯大林亂講一氣。他是怎樣談到斯大林的呢？在根本沒有斯大林的照片和畫像的地方，絮絮叨叨地說斯大林幹了什麼什麼壞事。我們實在聽得不耐煩了。一到莫斯科就碰到了這種事情。

就是按照這種調子，把有關斯大林的東西全都抹煞，甚至從蘇共黨史裏，也把這位作了三十年的黨的最高領袖一筆勾銷了。代之而出現的，是尼基塔·謝爾蓋維奇·赫魯曉夫的名字。可是曾幾何時，赫魯曉夫又被趕下台，於是正在排印的新版《蘇聯共產黨黨史》，遇到了麻煩，非再次改寫不可，引起了一場爭吵。

我們在蘇聯的最後一年（一九六七到六八年），斯大林是受到怎樣對待的呢？不錯，同赫魯曉夫的時候相比，在評價方面還是有若干不同，是恢復了一些聲望，然而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主要是只限於作為領導偉大的衛國戰爭的人而出現的。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年初

的對德戰爭勝利日，在政府在各地貼出的大幅宣傳畫中，有穿着軍裝的斯大林的畫像，還印有斯大林在戰爭勝利時發表的演說的摘要。就是在這樣的範圍裏，恢復斯大林的形象。

足立：例如：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不久上映的《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紀錄影片裏，有斯大林的鏡頭，是斯大林在演說的一個特寫鏡頭。中間插有羣衆在聚精會神地聽他的演說和戰爭場面的鏡頭。斯大林演說的鏡頭繼續相當長的時間。對這一點，我感到驚奇。我很意外地聽到了斯大林的聲音。

佐久間：今年年初，我在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的首都基什尼奧夫住了四個月左右。在城市的中心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政府會館，俄語叫做“ДО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這是聳立在基什尼奧夫市的唯一的一座現代化的漂亮建築物，全部是白色的。所以當地人都挖苦地稱之為“白宮”，叫做“БЕЛЫЙ ДОМ”。在它的正前方，有一座小小的凱旋門。以前，這座凱旋門兩旁的字都被塗掉了，但是最近兩年又恢復了。那就是用大字寫出的約·維·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在摩爾達維亞從納粹佔領下解放出來時的演說——大元帥演說，也被用大字刻在上邊。在莫斯科是看不到這些的。因此，我也大吃一驚，覺得真了不起。向城裏的人一打聽，他們說：“唉唷！為恢復凱旋門上的字，還流了相當多的血哪。”

就是說，一方面，有來自下邊的絕對必須恢復斯大林聲望的壓力。另外，早就謠傳說，要重新出版一部份斯大林選集，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出。上邊是不准用這種形式來恢復斯大林的聲望的。

原田：爲了研究蘇聯的社會主義問題，我們也對斯大林的著作非常感興趣，很想得到它。當然，書店裏是根本沒有的，想了各種辦法到處去尋找，但是很難找到。有的蘇聯人保存着斯大林選集，要求他們出讓給我們，但是他們說：“總有一天會需要斯大林著作，所以決不出讓。”

佐久間：這還是實用主義。有的教師現在竟吹噓說：“就是在赫魯曉夫時代，我也沒燒掉斯大林著作。”一想到他過去說過的話，別人就會了解他根本不配說這種話（笑聲）。我終於收集到了斯大林全集第一到第十三卷。

談到實用主義，我還想起這樣一件事。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蘇聯的工資問題。爲此，到圖書館去查舊文獻，一讀大吃一驚。被稱爲這個問題的大權威的人，在斯大林時代寫的書和後來寫的書，說的完全不同。在斯大林時代寫的書，在五十年代初期寫的書，全是引用列寧和斯大林的話，並且一再說，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是怎樣正確地指示的。可是，同一個人在八年後出版的書裏却寫道：“斯大林時代，是經濟學毫無建樹的時代，特

別是工資這個科目，由於受到斯大林的壓力，見不到陽光，在學術方面毫無進展。”在那篇文章裏，這回是左一個赫魯曉夫，右一個赫魯曉夫亂寫一通。而這個人最近寫的文章中，既沒有斯大林，也沒有赫魯曉夫了。（笑聲）

足立：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在斯大林的著作裏，在理論方面，還是有可以認為是現代修正主義萌芽狀態的東西，加以擴大就可以形成現代修正主義體系。尤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方面是這樣。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批判地去讀。可是不管怎麼說，斯大林作為一位偉大領袖，領導蘇聯，堅持捍衛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而現在蘇聯竟用實用主義來對待他，簡直不像話。

原田：羣衆中間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很好的，它來自實際生活的感受。他們說，儘管處在那種連綿不斷的戰爭的困難時期，在斯大林領導的時代，日子是好過的。到農村去，問一下五、六十歲的老大娘：赫魯曉夫時代和斯大林時代，哪一個好啊？她們詳細地作着比較回答說：“那還是斯大林時代好得多了。當時麵包的價錢是多少？而現在是多少！黃油的價錢和肉的價錢都比現在便宜。”“在斯大林那個時代，雖然沒有豪華的東西，可是可以買到很便宜的生活必需品，日子比現在好過多了。”我從許多人那裏聽到這種說法，而且越是到地方上去，

這樣說的人就越多。

足立：我想，斯大林時代是困難的時代，所以生活一定是苦的。可是一打聽，當場得到的回答常使我吃驚。他們說：“不，斯大林時代比赫魯曉夫時代好過。”人們都說：可是，到赫魯曉夫上台，就悲慘了。赫魯曉夫這個傢伙愛講排場，一到外國去，就亂學亂搬，開設什麼無人售貨商店、簡易快餐飯館，穿的也喜歡外表漂亮，可是最最重要的生活方面，却困苦起來了。

戰爭與和平問題

新谷：現在把“斯大林問題”引伸一下，再談談“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吧！不錯，斯大林是有各種弱點，但是斯大林却建立了偉大功勳，他經歷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接着而來的國內戰爭、反對外國干涉的戰爭，打倒了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外國的干涉軍；他領導了從廢墟裏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蘇聯，把它建設成爲一個擁有現代工業和國防力量的強大社會主義國家；接着又團結全國人民，打敗了納粹德國的侵略。直到他逝世之前，他一直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的一生，主要方面就是這樣。

斯大林逝世以後，赫魯曉夫一開始“批判斯大林”，他就以斯大林的部份錯誤爲口實，把斯大林創建的最重

要的業績一一抹煞。赫魯曉夫幹的最大壞事，是在蘇聯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赫魯曉夫的罪行是數不盡的。其中的一個，就是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把蘇聯引向極其錯誤的方向。

在今天的蘇聯，這個“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怎麼樣了？這同已經發生的蘇軍侵捷事件也有關係，所以是一個重要問題。蘇聯人民今天在考慮“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時，經常浮現在頭腦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個體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納粹德國侵略到蘇聯歐洲部份時，蘇方進行焦土戰後退却了。就是蘇方在退走前，對納粹要佔領的地區，燒掉一切房屋和建築物，在井裏投放毒藥，使水不能飲用，這樣使德軍即使進來了也根本呆不下去，只得逃走。以後，當蘇聯進軍追擊德國的時候，德方在撤退時又進行了焦土戰。等到戰爭結束，只剩下瓦礫堆了。

這樣，在歐洲各國當中，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付出的人力、物力的犧牲，是最大的。據說，受到的損害大到這種程度，蘇聯現在任何一個家庭，它的家族中總有人因戰爭而犧牲了。因此，在蘇聯人民當中，對戰爭的恐懼情緒，厭惡戰爭而要求和平的心情，不用講什麼道理，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問題就是從這樣的事實引伸出來的。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由正確的前提引出了錯誤的結論。

佐久間：一言以蔽之，赫魯曉夫搞“批判斯大林”的本質，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不僅在蘇聯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而且還反對尚未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用這個觀點去看赫魯曉夫的“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以及“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問題。這些問題同怎樣考慮世界革命，是密切相關的。

赫魯曉夫一掌握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就開始進行這樣的宣傳：“總而言之，只要沒有戰爭而有和平，在我國就可以發展生產，不久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到那個時候，世界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比，將發生比現在更大的變化。在這種條件下，全世界的人們看到蘇聯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現實，會羨慕，會用選舉的手段，把多數共產黨議員送進議會，就可以和平地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因此，今天全世界人民最需要做的，是老老實實地等待蘇聯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南越、南朝鮮和日本等在美帝國主義奴役下的人民，也不要開展民族解放戰爭等鬥爭。不管怎樣小的戰爭火星，都可能擴大成為世界大戰。這樣一來，蘇聯就會被捲進戰爭，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就完蛋了，於是，世界人民的解放也將推遲。”在蘇聯這種宣傳是相當徹底的。因此，在同蘇聯人談話時常常聽到：“現在沒有戰爭，真是好極了。總而言之，只要沒有戰爭，我們的生活就會好起來，世界也會好起來。”

我因有好幾次聽到這種議論，有點不耐煩了。就反問他們：“全世界究竟哪裏有和平？在美國，以黑人爲中心正在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在亞洲，哪個地方沒有戰火？在拉丁美洲，人民也拿起武器幹起來了。非洲也是一樣。在全世界都在打仗的時候，你說什麼只要這種和平狀態能够保持下去等等，你究竟是以一種什麼打算說這些話的呢？”這樣一問，他目瞪口呆，無言以對。這是因爲在蘇聯不進行這種教育，不進行這種宣傳，而只教育、宣傳現在世界是和平的好時代。他們說，反正蘇聯領導人聰明地同美國妥協，在設法防止戰爭。只要沒有戰爭，也就用不着軍備了。這樣，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好起來，共產主義也就可以早日建成。蘇聯就是按照這種想法，同美國大肆進行裁軍談判的。

足立：赫魯曉夫的“批判斯大林”和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的想法，是來自同樣的觀點。

所謂“批判斯大林”，就是罵斯大林好像一個流氓，用這種辦法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得像地獄一樣。赫魯曉夫就是這樣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資產階級專政。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赫魯曉夫拋棄了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觀點，忘記了階級觀點，抹煞戰爭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別，否定一切戰爭。就是說，赫魯曉夫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離開了無產

階級的立場，而用資產階級觀點看問題。在這一點上，赫魯曉夫的想法，在這兩個問題上都是一樣的。看問題沒有階級觀點，不管是宮本顯治也好，赫魯曉夫也好，都是修正主義的。

原田：我們因為越南問題而舉行示威游行時，蘇聯人不參加。我們就問他們，蘇聯人為什麼在這樣重要的問題上也不參加示威游行呢？他們明確地回答說：“如果有示威游行的工夫，那麼，把這個時間用來勞動提高生產多好。這樣就會使蘇聯接近共產主義。蘇聯到了共產主義，世界自然也就解放了。”他們滿不在乎地這樣對我們說。

同共青團的傢伙們交談，他們都表示討厭戰爭。問他如果發生了戰爭怎麼辦？他說：“我不願意到戰場去打仗，所以我要自殺。”二十歲左右的很結實的青年人，竟厚顏無恥地說這種話。

印尼的學生為了參加在祖國已經開始的武裝鬥爭，要回印尼。蘇聯人拚命地說服他們：“為什麼要到那種危險的地方去呢？留在蘇聯，大學畢業了，一個月可以掙多少錢，還有住宅，可以幸福地過一輩子。”他這樣說，是懷着好心。但是，印尼學生仍不改變決心。他們就說：“這傢伙真有點怪。”（笑聲）

我在畢業後回國前，去參觀蘇聯的坦克部隊，在那裏同蘇軍戰士談了許多。他們都住在營房裏，從早到晚

受軍事訓練。我首先問他們：“你們爲什麼要當兵？”問後才知道，他們差不多都是出身於農村，因爲家裏人口多，自己想上學而上不起，沒有辦法便到這裏來了。又問他們：“那麼是不是打算在這裏幹一輩子？”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說，不，盡量在這裏呆的時間短一些，設法積攢些錢，想上某大學或某專科學校。再問他們：“真想幹一輩子的，有多少？”沒有一個人回答說我要幹一輩子。這同日本自衛隊隊員的想法，是一樣的，農民的次子、三子，找不到職業，又上不起學，所以去當自衛隊。

足立：所以，現在要是打起來，蘇聯是很危險的。
（笑聲）因爲沒有人會拚命去打仗。

新谷：害怕和厭惡戰爭，這是一般羣衆的思想，也是樸素的感性認識。但是，赫魯曉夫利用這種意識，散佈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戰爭已經打够了。”就是這樣一種一概否定戰爭的立場。當然也就根本不會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的正確觀點：“要消滅戰爭，只有通過戰爭，只有用戰爭來消滅戰爭，沒有別的辦法。”說得好聽一點，也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或者是小資產階級的傷感主義。蘇聯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決不是用這種傷感主義去打仗的。

我們打败了那麼兇惡、那麼強大的納粹德國。在當今世界上，我們誰也不怕。你用弓箭也好鋼槍也好，來

進攻吧！不管誰來侵略，我們都有力量打敗他。滿懷這種信心和勇氣前進！這就是斯大林的領導。斯大林的接班人如果是一位優秀的人物，就會用這種精神來教育蘇聯人民。

原田：可是，赫魯曉夫反其道而行之，像剛才說的那樣，在人民大眾中間煽動悲觀主義或對戰爭的恐懼情緒，這已成了現在蘇聯國內一般人對戰爭與和平的想法。所以，在一九六〇年前後，蘇聯拍製的影片都是什麼《一個人的遭遇》、《戰場》、《烽火大地》之類的。總之，一部又一部地拍製了以描寫戰爭如何悲慘為重點的影片。

拍製了許多哀傷的影片，如人們正在和平地從事生產，突然敵人的飛機來了，炸彈炸毀了城鎮和鄉村，人們被迫去打仗。回來一看，自己的故鄉成了廢墟，人都死光了。在拍製了這種悲傷的戰爭影片之後，接着又拍攝了赫魯曉夫搞的“批判斯大林”的影片。拍攝了許多這樣的影片：斯大林時代世道是怎樣的黑暗，丈夫早晨出去上班，担心晚上是否能回來；可是“二十大”以後，世道突然變得光明了。看了這種戰爭片子，已經不分敵我了。那樣可惡的納粹德國的影子也模糊起來了。只有破、壞和悲哀。由於過份的悲哀，連敵人也不恨了。已經够了，別打仗了——拍攝了發出這樣呼籲的片子。

足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況且是列寧、斯大林的蘇

聯，至少必須這樣來領導人民——用對戰爭的科學的、正確的觀點，來分清敵我，揭露發生戰爭的社會原因，按照真正消滅戰爭的方向，發動人民大眾進行打倒帝國主義、保衛和平的鬥爭。而赫魯曉夫却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看到在各地爆發的民族解放鬥爭，就感到這種戰火不知什麼時候會蔓延到蘇聯，因而心驚肉跳。於是甚至要壓制人民為獨立和解放而打仗。

蘇聯現在在越南問題上，也決不是希望南越人民從美帝國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只是考慮怎樣來撲滅戰火，所以對解放戰爭能否取得最後勝利，並不關心。蘇聯想的是，南越人民拿起武器抗擊美帝國主義這種事，需要讓它盡快地停下來。

德國問題對蘇聯所具有的意義

新谷：現在成為問題的是德國問題。不了解這個德國問題對蘇聯所具有的意義，就不會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和蘇聯今後的動向。在蘇聯國內，對德國的恐懼心理非常強烈。這種恐懼，也可以說已經成為本能的了。對俄國人來說，這種恐怖症是來自歷史體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同德國打了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受到納粹德國的侵略，被搞得一塌糊塗。

因此，恨德國或者怕德國的情緒，甚至好像成了一

種民族感情。所以，今天一報道新納粹主義在西德抬頭，整個蘇聯就爲之震驚。這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情況完全一樣。歷史正要重演。這是從一般人民大眾到克里姆林宮最高領導人的共同心理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問題，如果不把它同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略聯繫起來考慮，就不能真正正確解決。蘇聯實際上並沒有這樣考慮。蘇聯是怎樣看美國的呢？不是把它看作敵人，而是把它當成朋友。相反的，蘇聯是聯系着德國問題來看美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同德國作戰時，蘇聯曾同美國合作。因此，蘇聯抱着一種希望，如果今後發生了德國同蘇聯打仗的局面，美國還會做蘇聯的朋友。蘇聯企圖抱着這種希望來解決德國問題。

所以，《真理報》等報刊，在提到美國問題時，總是強調美蘇共處是保衛世界和平的保證，只要美蘇之間保持和平，世界上的其他問題也隨着有了解決辦法了。它一再向美國發出和平呼籲。宣傳說：“美蘇兩國有史以來從未互相打過一次仗。在上次大戰時，不是還合作同德國作戰了嗎？不就是這種盟國關係嗎？今後要更加加深友好關係。”用這種觀點來考慮問題。

因此，在思考這次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時，如果不聯系德國問題來考慮，就不可能判斷蘇聯爲什麼採取那種行動以及今後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

佐久間：只要你隨便打開蘇聯出版的國際問題雜誌或《真理報》、《消息報》等報紙一看，就會明白這個問題。到處出現用大號鉛字印的 НЕМЕЦКИЙ РЕВАНШИЗМ 即德國復仇主義這個字眼兒。如果是舊納粹的某人如何如何了，那更是要一五一十地大書而特書一番。在德國問題上，聽到風聲就打顫，氣氛就是這樣。

但是，美帝國主義這個字眼兒，只要不是遇到特大的事件，是從不出現的。“帝國主義”這個詞還用，但是“美帝國主義”這個詞，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的。

新谷：政治漫畫——像日本橫山泰三等人所畫的那種東西，內容幾乎全是描寫納粹的，很少見到描寫美國的。

原田：希特勒在侵略蘇聯時制訂的作戰文件，最近在蘇聯印成書出版了，是很厚的一大本。頁數多，這還不算，而且在莫斯科，它現在成了暢銷書。反正你想買也很難買到。對德國問題就是如此關心。此外，只要一出版有關納粹的什麼書，當天就被搶購一空。

佐久間：他們在德國問題上真是已成了神經質。所以，在赫魯曉夫被攆走或者某某人下台這種時候，總是要把處理德國問題犯了錯誤，還有在農業問題上的失敗，列為他下台的理由之一。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足立：這樣做就說得通，容易使人們接受。

佐久間：我們曾問蘇聯當局：“你們並不認為美帝國

主義是敵人吧？”他先是否定說：“不，沒有的事。”我又問他：“不對吧！你們不是認為主要敵人是德國法西斯主義嗎？”他又說：“你那麼說，也可能就是這麼回事。”

原田：有一次，有個美國大學生到蘇聯觀光旅行，在莫斯科生病了。馬上被送進醫院。在那裏受到了什麼待遇呢？住進了蘇聯黨和政府領導人或重要人物住的特別病房，醫院院長親自護理。養了一個星期的病，然後把他送回國去。對美國人這樣照顧，遠遠超過一般禮節。對在那次游行時受重傷的中國學生，別說住院，甚至拒絕給他們治療。這樣一比較，就能知道現在的蘇聯怎麼樣了。

足立：在今天的蘇聯，受到冷酷待遇的是中國人。

新谷：在搞“批判斯大林”的時候，赫魯曉夫常說，在蘇德戰爭開始時期，由於斯大林麻痹大意，判斷錯誤，致使蘇聯受到不必要的侵略。還說斯大林不聽總參謀部的意見，獨斷專行，下達了不切實際的命令，因而連續地吃了敗仗。

可是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不久，在蘇聯國防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蘇軍領導人在回答問題時說：“沒有那樣的事。斯大林慎重地細心傾聽總參謀部的意見，進行了正確的指揮，而不是獨斷專行，靈機一動就進行指揮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把蘇聯引向勝利，創建了偉大的功績。”從這些地方看，同斯大林一起實際參加

作戰的軍人們，似乎還能如實地正確評價斯大林。

佐久間：還有，蘇聯在三年前突然又搬出了佐爾格問題。在這以前，普通的蘇聯人誰也不知道佐爾格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可是，《真理報》等報刊突然一下子大規模地搞開了宣傳。在電影院裏還上映那部電影。從此，佐爾格，佐爾格，就鬧騰起來了，還出了郵票。這實際上是反斯大林運動的一部份。他們宣傳說，佐爾格冒着生命危險，正確地掌握了德國開戰的日期，把情報送給了斯大林。可是，斯大林沒有重視這份情報；而德國實際上就是按照那個時刻開始了侵略。這就是納粹德國那樣蹂躪我們祖國，造成幾百萬人死亡的原因。那個佐爾格鬧劇，就是爲了宣傳這個的。

新谷：那時候，確實還給佐爾格頒發了什麼勳章哩。

佐久間：是這樣。在搞佐爾格運動之前，先授予他“蘇聯英雄”的稱號，給他鍍上一層金。接着便一五一十地大肆進行宣傳，佐爾格的父親是誰，母親是什麼人，佐爾格是蘇聯共產黨員，在日本進行了什麼活動。

原田：佐爾格鬧劇後，蘇聯大量拍攝間諜片子。爲紀念前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拍攝了許多影片，名義上叫作革命電影，而內容都是間諜片子。

佐久間：在蘇聯，間諜片和強盜片子非常受歡迎。這種片子，過去蘇聯進口東歐攝製的，可是最近在

蘇聯也拍開了。不過，在俄語中，間諜有兩個叫法，敵方的間諜叫做 ШПИОН，相當於日本說的間諜，而自己方面的則叫做 РАЗВЕДЧИК，就是偵探之類。名稱是不同的。所以，佐爾格是“РАЗВЕДЧИК 影片”的第一部（笑聲）。

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和現代的根本區別

新谷：我們在考慮問題時，要從種種角度去研究，去比較，去對照，這是正確地理解問題的一個方法。我認為，把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蘇聯，同現代修正主義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後的蘇聯，作一番比較、對照，這對於了解現代修正主義的毒害有多麼大，以及世界上首先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是怎樣遭到破壞的，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聯系到現在在中國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同蘇聯的經驗作個比較，這對於鮮明地突出問題所在，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還有必要看蘇聯同東歐各國，它們之間有哪些共同點和不同點。而且還要把日本同這些國家作個比較對照，研究其中的共性和差別。這對於我們決不背離偉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經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產生的這種巨大考驗，在日本建立光輝的社會主義，將有很大的教益。像宮本修正

主義那樣，把現在被現代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篡奪了黨和國家的中樞，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說成是社會主義國家，千方百計爲它辯護，抱着這種態度，那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促使日本的工人階級起來爲建立社會主義的未來而鬥爭的。

佐久間：特別是反動派有意識地借批判今天的蘇聯的辦法，來宣傳社會主義還是不行啊，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行啊，我們必須徹底地粉碎這種宣傳。

在研究蘇聯社會主義變質問題時，我最先想到的，是蘇維埃這個權力機關。這個蘇維埃機關的變質是最根本的。因爲蘇維埃是蘇聯工農兵的革命權力機關。它是這些人親自直接參加，站在羣衆路線的立場上，在黨的領導下，直接行使革命權力的組織。在列寧、斯大林的時代，蘇維埃真正是屬於工人的，是屬於農民的，是屬於士兵的，他們是實際上的核心。

現在的所謂蘇維埃，是把過去工農兵直接掌權的形態經過抽筋換骨，使它本質上成爲有名無實，只剩下了外殼和名稱。現在的蘇維埃，實際上是高級官僚、名流、有勢力的人這幫傢伙，以一種類似榮譽職務的形式組成的。這幫傢伙一旦得到特權，就貪婪地去追逐各種私欲。蘇維埃已經墮落到這樣的地步，不是要在那裏認真地討論什麼問題：它已經完全變成了投票機器，不管發生什麼問題，總是全場一致通過。歸根結蒂，它實際上已經

完全脫離了工農兵。

所以一問蘇聯工人——他是某工廠的工人，同我要好——他就明確回答說：“雖說蘇聯是工人階級的國家，可是實際上我們沒有任何權利。”這是因為，蘇維埃本身已經完全變質，它同資產階級議會沒有什麼兩樣，它已經成為一部份特權階層的機關。過去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邁進的那個蘇聯，同現在的赫魯曉夫出現後的蘇聯的根本區別就在這裏。

“蘇維埃選舉”和先鋒黨的變質

足立：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完全是騙人的把戲。一個選區只有定員數的候選人。如果定員是三名，就把三個人的名字印在選票上。領到選票，只要塞進準備好的投票箱就完事了。如果你不贊成這些候選人，可以進入掛着門帘的小房間，把候選人的名字劃掉，另寫上自己中意的人的名字，如果對代表有什麼要求，也可以寫上。但是，進那個小房間却需要勇氣。

如果沒有什麼意見，把領到的選票原封不動地直接投到投票箱就可以了。在監選人的注視之下，敢進入小房間的，這只有懷着強烈反抗情緒或調皮搗蛋的人才能做到。你就是在選票上寫上什麼，又能起多大作用呢？一般選民對某某人是什麼人——如不是相當有名氣的

人，是不知道的。例如：選舉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蘇維埃代表時，我們大學的一個蘇聯學生去投票回來了。我們問他，你選了什麼人？他說，一個是赫魯曉夫，另外兩個人他連名字也不知道。許多人在去選舉站領取印好了候選人名字的選票以前，連誰是候選人也不清楚；領了選票，連候選人的名字看也不看就投票。投完票，可以到另一房間聽完爵士樂隊演奏的音樂再回去。選舉站備有樂隊，在演奏音樂，並且嚴厲督促選民去投票。所以，不管什麼選舉，公佈選舉結果總是重複老一套：投票率百分之九十九點幾，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點幾，全部當選，無人落選。一看這種選舉，就會覺得，完全是勞民傷財。因為不管選還是不選，結果都只有一個，這是非常清楚的。

佐久間：這樣選出來的蘇維埃代表，怎麼能說是工農兵的代表呢？蘇維埃的變質也就是自然要發生的了，不過更深入地追究其原因，最後就歸結到黨變質這個問題上。在由列寧締造、斯大林培育的時期，共產黨曾經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黨、布爾什維克黨。

還在列寧在世的時代，在完成革命後不久，曾經大規模地進行清黨。當時，孟什維克以及各種不純分子，相繼鑽進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的高潮中，黨極大地膨脹了。針對這種情況，直接由工農兵逐個地審查黨員，把混進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

不入的傢伙，一下子清理了十萬人，整頓了黨（註一）。在這樣的歷史中經受了考驗的黨是完全得到羣衆支持的革命的先鋒隊。

原田：是受人民大衆檢驗的先鋒隊。

佐久間：對！這樣的黨領導蘇維埃這個工農兵權力機關，推進了無產階級專政。同那個時代不同，現在蘇聯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共產黨完全變質了，蘇維埃根本就是有名無實，變成了一個空架子，無產階級專政老早就停止了。即使這樣，有人却說因為還保留着“共產黨”或“蘇維埃”的名稱，所以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真是豈有此理！假如這麼說是對的話，那就等於說日本的自由民主黨是一個既講自由又講民主的黨。儘管名稱是自由民主黨，其實是一個賣國的反動的黨。即使加上“共產黨”或“蘇維埃”的名稱，但是不能只憑名稱進行判斷，應當看它的實質。

足立：聯系到蘇維埃的變質，要很好地研究中國所建立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種新型的權力機構。

斯大林沒有培養革命接班人

新谷：在我們所看到的蘇聯，曾經在十月革命時代活躍的人，幾乎全部去世了，已經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時代。特別是新的一代人，已經完全喪失

了革命氣概，喪失了繼承前輩所完成的革命事業，堅持建設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的精神。現在雖然還能聽到“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詞句，但是那只不過是黨或者政府官員在正式場合作為演說用語加以使用而已，它們已經完全脫離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思想。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要連續不斷地培養繼承、捍衛和發展革命事業的新的一代人，永遠不讓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究竟應該怎麼辦呢？這是我們到蘇聯之後最先碰到的問題。日本川柳有個故事，叫做“第三代一手好字寫賣房啓事”。說的是第一代經過千辛萬苦蓋了一所漂亮的房子。第二代還多少保留一些上一輩的精神，總算是在努力維持這所房子。到了第三代，雖然有了學問和教養，能寫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筆字，但是完全喪失了前輩的精神，用一手好字寫了“賣房啓事”，把房子賣掉了。蘇聯的情況，跟這個故事一模一樣。

所以，把列寧、斯大林時代付出那麼大的代價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賤價賣掉，再買進廉價的資本主義，不是從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而是要後退到資本主義。這一點是多麼值得深思啊！不是僅僅對現在活着的人，就是對於尚未出生的以後好幾代的人，這個世界上還不存在但是將會存在的一代人，也要做工作，要使革命精神傳遞到最後一代，怎麼辦好呢？要完成這個事

業，並且在世界上第一次大胆地採取了行動的，就是這次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想完成這樣偉大的事業，那只有反覆進行觸及全體人民每個人靈魂的革命，徹底進行思想改造，有一億，就依靠一億人民的力量，有七億，就依靠七億人民的力量，捨此沒有別的辦法。這一點，在正確地批判斯大林時，是一定要指出來的。斯大林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個觀點上，也就是在羣衆路線的觀點上，有很大的弱點。

足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共產黨在挑選誰來當下一個領袖時，很簡單地就選出了馬林科夫。據說，中國的領導人偶而去蘇聯，看到這種情況，便說：“這不行！”爲什麼呢？因爲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領袖。所以，要挑選他的接班人，那就必須慎重地挑選最合適的人，他能够正確評價斯大林生前的業績，分清斯大林在哪些問題上是正確的，在哪些問題上有錯誤缺點，從而分清斯大林的哪些地方他的接班人必須繼承，哪些東西必須糾正；並且能够進行這種領導。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可能繼承斯大林的精神和思想，而且像赫魯曉夫那種人，就可能突然乘這個機會，利用人民大眾中間存在的樸素的情緒、感情，實行收買人心的政策，登上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崗位。他就利用羣衆中存在的沒有

階級觀點的反戰情緒，拋出“和平共處”路線，實行收買人心的政策。

怎樣培養革命的接班人的問題，是我們在莫斯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訓之一。這個問題關係到全體人民的命運，因而除了百分之百地信任人民大眾，徹底地用無產階級思想加以教育和改造外，沒有別的培養辦法。斯大林沒有作到這一點，也沒有這種觀點。

佐久間：斯大林逝世後，沒有找到好的接班人。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缺乏羣衆路線。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好好地思考。斯大林逝世是在一九五三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在一九五六年。這中間只隔了三年，黨就變質了，無產階級專政就開始崩潰了。

這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三年之內就被資產階級當權派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呢？這一變質，雖然是在斯大林死後發生的，但其因素，早在斯大林領導的時期就已存在着。

對這個問題，中國進行了十分深刻的研究。一九五六年中國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中，雖然受到當時時代的限制，例如許多地方使用“鐵托同志”這個詞間接地進行批判，不夠痛快，但已經有條有理地總結了從斯大林的錯誤中值得吸取的本質性的教訓。其一是羣衆

路綫的問題，其二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階級鬥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將繼續存在。

從斯大林時代，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建成，階級矛盾基本上就已經消滅”的理論。今天蘇聯領導人還說：“蘇聯只存在着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是敵我矛盾，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不需要了。雖然還有流氓和小偷，但他們不是階級。”（笑聲）他們企圖用這種形式邏輯，為他們的修正主義找到合理的根據。

蘇聯的現實本身，戳穿了這種理論的欺騙性，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這種修正主義理論。

實際上，在斯大林時代，就已經存在着資產階級當權派。由於斯大林沒有正確地發現這個問題，以致在他逝世後僅僅三年之內，蘇聯黨和國家的權力就被他們所篡奪。另一方面，即使發現可疑的人物，但由於沒有建立階級鬥爭的理論，不能弄清發生這種問題的內在原因，僅僅作為間諜在行政上加以處理。人民羣衆根本不理解懲處這些人是為了什麼。如果在階級鬥爭中將這些問題擺在適當的位置，那麼就會明白，除非整個工人階級自己起來粉碎他們，否則就打不倒這些階級敵人。因為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工作，而是整個階級的鬥爭，所以不樹立羣衆路綫的觀點，就不可能真正防止修正主義。

對於這一點，前面提到的那兩篇中國的重要文章已有清楚的闡述。從斯大林的錯誤中弄清這個問題，這成

了。在國際反修鬥爭中，中國回過頭來檢查自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識破“批判斯大林”實際上是修正主義者的一個大陰謀，評價斯大林作為革命家的一生，同時又從他的錯誤中吸取積極的教訓，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斯大林的缺點和毛澤東的羣衆路線

新谷：斯大林個人的確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但是遺憾的是，他沒有接班人。沒有培養出接班人，這是他的一個大失敗。因此，歷史就被接着出現的赫魯曉夫完全顛倒過來了。如果僅僅是出現一兩位歷史上罕見的偉大人物，革命暫時也可能順利發展，但是以五十年、一百年為單位來看，只有這一點，革命是決不能順利發展的。這是蘇聯五十年的歷史明確告訴我們的。

斯大林在世的時代，只要服從他的領導，一切都會順利進行。斯大林對於在他看來是屬於傾向壞的傢伙和反革命，使用秘密警察對他們採取行政措施或者把他們殺掉。而人民大眾完全不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真相，養成了他們對政治的恐懼心理。因此，只是一個勁兒地以盲目的、無批判的態度跟着斯大林。可是在斯大林逝世

以後，赫魯曉夫等這些蠱惑人心的傢伙接替了他的地位，人民大眾又跟着他們走。這就是今天蘇聯的最大的悲劇。

足立：這一點，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中國，人民羣衆自己進行討論、批判，並且根據自己的判斷，揭發出鑽進領導機構的中國的赫魯曉夫。七億中國人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因此，不管隱藏得多麼巧妙的反革命分子，在羣衆鬥爭中，無不露出原形。人民大眾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分辨真革命和假革命，由廣大的人民羣衆自己把政治不斷推向前進，在中國已經開始了這樣一個新時代。

記得很早以前，從報紙讀過這樣一則新聞：前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說過：“從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現狀看來，可以這樣說，到毛澤東的下一代以後，中國的情況也必將開始‘解凍’，刮起‘自由化’之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它們所希望的就是這個。但是，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帝國主義這種痴心妄想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要想使世代永久保持社會主義社會不變顏色，除了依靠幾億人民的羣衆力量，沒有別的辦法。毛澤東主席從這個觀點出發，向人民發出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號召。在蘇聯是完全没有這一觀點的。

佐久間：宮本集團的情形和蘇修完全一樣。他們認爲，有關世界和國家大事的政治路線，你們怎麼會懂得，所以你們就只要遵守“組織原則”，給我擴大報紙銷

路就行了。當我們指出宮本顯治的路綫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而起來造反時，他們還訕笑我們不過是些青年學生，居然侈談黨的路綫，未免太驕傲等等，把我們狠批了一頓。（笑聲）

足立：不讓人民羣衆關心世界和國家大事，不讓人民羣衆關心政治大事，這已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一個特徵。蘇聯也不讓人民羣衆關心國家大事，只要他們關心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工作，而天下大事由赫魯曉夫或者勃列日涅夫去判斷處理，人民只要老老實實地跟着他們走就是了。

從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到 勃列日涅夫的“法西斯黨”

新谷：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時，最重要的仍然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機關也即權力中樞，始終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或革命的左派手中，這是真正關係到全體人民生死命運的大事。赫魯曉夫篡權後，蘇聯的社會主義一下子就垮了。赫魯曉夫當了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後，立即在黨內展開大清洗，當然這是從反革命立場進行這一罪惡勾當的。

赫魯曉夫首先製造了“落後於時代的石頭腦袋”這樣一個藉口，把據說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和他有不同意見

的斯大林的老戰友如莫洛托夫等人，一一踢開。

接着，赫魯曉夫又以所謂實行“黨內民主”為藉口，把那些有經驗的老布爾什維克從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中一一清洗出去。他又隨意修改黨章，規定黨的領導機關的同一負責人不許連選連任，或者不許三選三任，把有布爾什維克傾向的黨員從黨的領導機關一一整掉，以新興資產階級分子取代他們的地位。而只有赫魯曉夫連選連任幾次都可以，他玩弄黨章，一至於此。

赫魯曉夫還給斯大林時代被清洗的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地主分子，一一恢復了名譽，並且讓他們混進黨內；相反，堅持革命的蘇共黨員却被清洗出去。赫魯曉夫還公然說什麼“取得政權後，只要提高生產就能到達共產主義”，他把共產黨分成工業黨和農業黨，竟然把黨變成了經濟機構一樣的東西。

赫魯曉夫就這樣使蘇共從內部腐爛變質，終於在蘇共“二十二大”以後，使蘇共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成了“全民黨”。在日本，社會黨一開大會，就要爭論一番社會黨是階級政黨還是國民政黨。蘇共就幹着與此相同的事，它不再是階級政黨，而是“國民政黨”了。

原田：赫魯曉夫就是這樣把蘇共變成了實質上與共產黨毫不相干的東西了。赫魯曉夫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之流，今天進一步有了發展，使蘇共墮落成了法西斯黨。

宮本一伙的“組織原則”

原田：那一套反革命路線，是赫魯曉夫在“黨章規定”的合法外衣之下推行的。赫魯曉夫對凡是不依照他的反革命路線辦事的黨員，都被當作“破壞黨的組織原則、反對黨中央方針的大逆不道之徒”（笑聲），將他們一一清除出黨。

現在，宮本顯治一伙在日本的所作所爲，正和赫魯曉夫一模一樣。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掌握了黨中央的實權，下一步就一定是以“組織原則”爲盾牌，開始清洗堅持革命的人。他們口口聲聲講“組織原則”，要人盲從，實際上“組織原則”這個東西必然是爲實現某一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原則”決不是什麼單獨存在的東西。事實上，宮本顯治所強調的“組織原則”，不過是爲了推行他們的“議會主義”、“獨立自主”等現代修正主義路線而已。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只能服從旨在爲推進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組織原則，絕對不應該服從宮本顯治這類叛徒的“組織原則”。

事實上，列寧就是這樣考慮並採取行動的。列寧在第二國際墮落到“議會主義”、“保衛祖國”等修正主義路線，從而背叛革命時，決沒有說“雖然路線是反革命的，

但是組織原則還要遵守”。列寧毅然決然地宣告，考茨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已經崩潰。他和第二國際決裂，並建立了第三國際。現在誰都清楚，無論是對於蘇聯的共產黨人來說，還是對於日本的共產黨人來說，重要的事情並不是去服從修正主義黨的“組織原則”，而是要和他們一刀兩斷，重建真正的先鋒隊——共產黨。

蘇聯軍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根本區別

新谷：前面我們談到權力機構問題和共產黨的問題。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軍隊。武裝力量是國家權力最主要的支柱，軍隊掌握在誰手裏，和按照什麼路線行動，將嚴重地左右一個國家的命運。**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今天蘇聯的軍隊，和美國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差不多相同。他們都是為一部份統治階級服務的軍隊，內部存在着嚴格的等級制度。他們是由根據徵兵制而徵召來的士兵和職業軍人組成的。這些軍隊，對武器的因素比對人的因素更重視。

中國人民解放軍，它的宗旨和素質，跟蘇聯等國的軍隊根本不同。它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大眾服務的軍隊，內部不存在等級制度。這支軍隊既打仗，又從事生產，又做羣衆工作。他們不是脫離人民的特殊武裝集團，而

是人民自己的武裝部隊。這支軍隊最重視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蘇聯軍隊，在國內壓迫蘇聯人民，對外則像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幹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

中國人民解放軍，名副其實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解放。我們有必要充分地研究、學習毛澤東主席的建軍路線。

（註一）一九二一年，在有非黨羣衆參加的公開集會上，清洗腐化墮落的黨員，大約十七萬人（約佔全體黨員的百分之二十五）被開除出黨。

東歐的政治笑話

資本主義？沒那麼回事

西方的旅行者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們聽說捷克斯洛伐克在復辟資本主義，想親臨其境弄個明白，便拚命地到處探訪。有一天，在布拉格揪住一位青年，向他打聽這個事。那位青年就喋喋不休地說開了。

“噢——！竟有這種說法嗎？真是豈有此理！”

接着他回答說：

“我國憲法上明明寫着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完全不必担那個心。”

七、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社會主義各種制度的變質和崩潰

佐久間：五年之前，當然，我是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滿懷嚮往之情，到莫斯科去留學的。到了莫斯科以後，最初還有許多佩服的地方，常寫信告訴日本的朋友們。

例如到莫斯科以後，認為最方便的是，什麼時候都供應開水。除了太古老的住宅外，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有自來水，開水也是日夜供應，無論是要洗澡、淋浴、刮鬍子等，要用開水，馬上就有。因為市裏設有熱供應站，將水煮開，輸送到各個家庭。各個家庭冬天需要的暖氣，也是熱供應站輸送的。各個家庭都不要準備火盆和火爐。我以為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帶來的成果，所以很佩服。

住宅建設方面，大型的新村有計劃地興建起來。房租很便宜，連同煤氣費、水費、電費、電視和收音機收聽費等一起，不過佔工資收入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此外交通費、郵電費也很便宜。許多到蘇聯的日本人，

對這些都表示羨慕。我想：還是社會主義好。

又如上學，不僅不必繳學費，而且有獎學金。這種獎學金和日本的獎學金不同，是不必歸還的。畢了業也不必担心失業問題。生病或者受傷，可以到醫院治療，不必繳醫療費。從入院到出院，管治療，管飯吃，分文不收。這一切，用很通俗的比喻來說，不過是社會主義成就的一部份。雖然不能單單從社會福利的情況來評價整個社會主義，但無論如何，這一制度正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正確領導下，蘇聯的工人、農民流了汗水，建立起來的。可是，就在我們在莫斯科居住的五年期間，眼看着這些制度有的從內部開始變質、腐敗，有的連外表也正在改變了。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天到達莫斯科的。我記得當時在莫斯科參觀訪問時，一位嚮導人員曾指着一所醫院對我說，這是莫斯科唯一的一家私立醫院。五年之後，到我回國的那一年，莫斯科的私立醫院已發展到數不清了。這種私立醫院和日本的某某醫院和某某診所，完全一樣，由一兩個醫生開業。到這類私立醫院看病，和在日本一樣，要付醫療費。憑我們的常識來看，既然有不收費的公立醫院，沒有傻瓜會去這種要花錢的私立醫院。事實却不然，登門找私人醫生的病人很多，真是生意興隆。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原來這種收費的私人醫院裏有技術高的醫生，又親切又認真。一到那些公立

醫院，全是衙門式的，粗暴，不給認真治病。有時推來推去，受到虐待，這還不說，能治好的病也好不了。與其那樣，還不如稍微花點錢，到能認真地給徹底治好病的地方去，這本是病人的常情。因此，經濟條件好一點的人，都不到公立醫院去受那非人的待遇。這就造成私立醫院日益興盛，開設的人越來越多。這一來，好容易才建立起來的全體人民都享受的免費醫療制度，就很快地崩潰了。

“休養之家”的實況

佐久間：我在蘇聯度第一個暑假時，七月間曾到黑海沿岸我們大學的“休養之家”去休息度假。在那“休養之家”的旁邊有一塊大招牌，上面寫着：“所有的蘇聯人都享有休養的權利——摘自蘇聯憲法。”我一看這幾行大字，心裏想：果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哩。

到了八月，我到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的一個集體農莊去勞動。在那裏我遇到一個老農並和他聊天。我對他說：“你們的國家真好，保障所有的人都有休息療養的權利。可以到‘休養之家’或者‘療養院’裏舒舒服服地休養近一個月。”他聽我說完之後回答說：“有這樣的事情嗎？我活到這一把年紀，那種地方可一次也沒有去過。能去那種地方的，恐怕是黨和政府的大人物吧！”我聽他的

答話，想到這情形確實有點不對，但是又想到世界上的事情，總不免有些例外。那時我聽到那老農的一番話後，並沒有怎樣加以重視。

一九六六年暑假期間，我和另外兩位朋友一起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在赴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車上認識了一個在莫斯科高級政府機關裏工作的中年俄羅斯婦女。她是到捷克斯洛伐克名勝地卡羅維發利的溫泉去度假的。卡羅維發利是歐洲有數的幾個溫泉休養勝地之一。我們便諷刺她說：“像你這樣地位高的人，能夠到外國著名的勝地休養，真使我們羨慕啊！”誰知她聽到之後反而說：“我不是講笑話，我對這件事正非常不滿意呢。”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的上司個個不是去意大利，就是去法國，或者赴西德這些國家去度假，我職位級別低，只能到社會主義國家去。”她說到“只能到社會主義國家去”這句話時，臉部充滿不服的表情。

我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後，爲了治療胃病，到高加索一處設在山上的療養院去療養了一個月。在那療養院裏，和我同住一個房間的，是來自基輔的一個工廠的工人，要說這個人的體格，真好像是一頭小牛似的健壯。他在每當醫生要來檢查病房的規定時刻前，就離開病房溜走。我便問他：“你說腸胃不好，可怎麼看不出你有病？為什麼要跑到這家專治腸胃病的療養院來？”他洋洋得意地說：“我是一家大工廠的工會幹部。我的工作

就是審核和批准工人們請假事宜，和給他們安排休假療養。因此，我自己想要去哪裏就去哪裏，只要我自己簽一個字就一切都解決了。”這個人居然還是個了不起的共產黨員哩！

確實，在蘇聯的憲法上規定“所有的蘇聯人都享有休養的權利”，但是今天處在蘇聯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事實上却極少可能享受療養設備。地位稍微高一點的，在蘇聯國內的療養地休養，比這高一些的到東歐各國去，更高的到西歐去休養。情況就是這樣。

原田：那些療養院、“休養之家”等地方，其內幕也是不堪入耳的。首先，性道德的紊亂非常嚴重。有婦之夫、有夫之婦到那裏後公開亂搞男女關係。我到療養院時，有些蘇聯人居然親切地說：“怎麼不找個女人？我可以介紹！”我拒絕了他，說“我不是玩弄女性的人”。他竟感到奇怪，問我：“那麼，你跑到這個地方來做什麼？”“你是個殘廢的人嗎？”

在療養院裏從事清潔的老女工們，工資非常之低。問她們怎麼過活？原來她們把自己的房間按鐘點計算，租給那些男女們幽會，等於那種專供情人幽會的旅館，靠此賺一些外快。凡是到療養院的男人莫不帶着大量的金錢去的（笑聲）。這種現象，在蘇聯已屬於常識範圍的平常事情了。

足立：蘇聯和日本一樣，找到的職業不同，在待遇

上，也就存在着驚人的差別。到高級政府機關和大企業，跟在中小企業裏工作，各方面的待遇完全不一樣。我所認識的一個年近五十歲的婦女，她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當電話接綫員，工作已達二十多年。她就說：“療養院這種地方，我一次也沒有去過。”我說：“你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作的，不可能有這種極不合理的事情。”我再詳細地問她，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她雖然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作，但是她們只是受工會僱傭的一個全部職工僅有五、六十人的小單位。這種小單位，自己沒有“休養之家”、療養院、俱樂部或文化館這類的機構，因此什麼地方也去不了。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蘇聯有些事物，表面上看好像很好，但只要深入進去調查一下，就發現事實完全相反，而且往往令人感到驚異。

人口集中大城市和房荒

佐久間：住宅問題也是一樣。在蘇聯，城市人口不斷增加，特別是莫斯科人口更是急劇上升。住在地方上的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想到大城市去。

例如在我們學校讀書的地方出身的蘇聯學生，在就學期間內，千方百計要找一個在莫斯科擁有居住權的人結婚，這樣，他就可以留在莫斯科。當局爲了防止人口

集中到城市，也採取了種種的對策，可是一概無效。因此，莫斯科的房荒非常嚴重。住宅的建設滿足不了對住宅的需要。這樣，婆媳吵架等這類問題也就發生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種類似住房互助會的組織建立了起來。這種辦法是，集合一定數量的人，各人先拿出一筆錢來，再由國家補助興建公寓，然後在多少年內每個月付二、三十個盧布，等到付清全部款項，房屋即屬已有。現在用這種方式蓋房子的人非常多。這樣的住宅區，我也去過許多次。許多蘇聯人收入很低，却要付出高額的住宅費，莫不感到負擔非常沉重。蘇聯工人的全國平均工資是九十到一百盧布，對一般工人來說，是難以支持的。看到這種實際情況，就想到這和日本有什麼兩樣呢？這已經很難叫做社會主義了。

足立：如果說今天的蘇聯是社會主義，那就不需要什麼共產黨了，也不要流血幹革命了。那類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是能够辦到的。看今天的蘇聯，不是看工人有沒有私人汽車，家庭電氣用具普及的程度怎樣，療養院設立了多少，是不是有開水供應，這些都不是主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今天蘇聯是什麼政治派別掌權，把蘇聯政治推向哪一個方向，最後要把蘇聯引向何處，把蘇聯帶到什麼樣的社會去？

原田：這也就是說，首先要看那個國家的人的因

素，他們生活中所遵循的是一條什麼樣的政治路線，他們的思想狀況是什麼樣的。不從這一點看問題，就不能正確地掌握問題的實質。完全撇開人的因素，只拿蘇聯現在生產的物質財富去作比較，那麼單單在消費物資的質和量這一點上，蘇聯和西方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就有很大的差距。這不是什麼重要問題。最重要的是，蘇聯這個國家今天的經濟和經濟領域究竟是要朝哪一個方向發展。

“物質關心”和“物質刺激”

新谷：我想簡略地談一下蘇聯的“新經濟體制”問題。大家都知道，蘇聯現在的經濟情況不佳，困難很多。赫魯曉夫認為蘇聯經濟發展遲滯的原因，是經濟機構組織不好。他多次下令改組蘇聯的經濟機構，但仍然失敗。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上台後，以為仿效資本主義的一套方法，也許可以促進蘇聯經濟的發展。

他們提出了一套“物質上關心的法則”和“物質刺激的原則”，以此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這一套作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這樣提出來，也未免過於露骨。而他們現在就把這一套，硬說是列寧的原則。實行這一套原則的結果，蘇聯的經濟情況越來越糟糕。因為這一套“原則”，歸根到底是鼓勵人們去大肆追求私利私欲。實行這

一套“原則”，使龐大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把國家和世界大事忘得一乾二淨，一心爲了肥私囊而精神都變了。現在在蘇聯，像前面談到過的那樣，貪污納賄已成爲公開的秘密。總而言之，人們都是爲了怎樣才能發財而奔忙。人們的思想腐化到了這種地步，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陷於一片混亂了。

按照我的看法，蘇聯的經濟越搞越糟，固然有各種原因，但是最根本的，還在於蘇聯當局根本就沒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爲人民利益服務的觀點。因此喪失了爲人民服務的態度的這一套官僚機構越是龐大，內部的官僚主義就越發展，腐化墮落就更嚴重起來，這是必然的趨勢。

作學問也搞“物質關心”

足立：特別是最近，搞什麼事情都靠“物質刺激”。我們就讀的大學裏，曠課的學生越來越多，學校當局很是頭痛，於是也來個規定，凡曠課幾十小時以上者，獎學金減半發給，甚至全部停發。不是去了解學生究竟爲什麼曠課，是不是對講課不滿意，還是另有原因，再在這個基礎上去正確處理，而只知用行政手段進行恫嚇，連減發獎學金的手段也要出來了。學習也要用金錢引誘，還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學校當局還大言不慚地說：

“列寧的物質刺激的原則，在我們這裏也適用。”

原田：教師指導學生做畢業論文，每負責一名學生可以得到五十個盧布。有些教師爲了錢，就同時擔任許多畢業生的論文指導工作，因此名聲很壞。有個教師遇到他自己班的學生放棄作畢業論文，當面嘆息說：“我的五十個盧布拿不到了。”（笑聲）

佐久間：一個剛進大學的女同學憤怒地對我說：“我們班上一個成績不好的女同學，仗着她的父親是集體農莊主席，一個勁地給先生送禮，甚至用汽車把禮物載到考場，因此，她就順利地通過入學考試了。”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

新谷：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從一九六六年起採用所謂“新經濟體制”，放手給予各企業以獨立經營權，放手讓它們追逐利潤。按照勃列日涅夫這一伙的說法，只要人人都有追逐私利、滿足私欲的打算，拚命去追求利潤，就能到達“共產主義”。（笑聲）請問這是什麼樣的“共產主義”呢？這和資本主義又有什麼不同？這樣的做法，只不過是把什麼公司的總經理，換上一個什麼委員會主席之類的稱呼，而其實質根本沒有什麼不同。

看到赫魯曉夫及其繼承人大事破壞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肆無忌憚地復辟資本主義，日本等國家就流行着一

種議論：“經濟非常不發達的落後國家，或許可以採用社會主義制度以發展本國的經濟，但當達到一定程度的工業化水平以後，仍然會陷於停滯不前的僵局，仍然不免要實行‘自由化’，恢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適宜落後國家，在像日本這樣經濟高度發展的先進國家，則不適用。”

照佐野學、鍋山貞親等人的這套理論就會得出這樣結論：實行“共產主義”的結果，仍然不免要走向“維護天皇制度”。（笑聲）他們不斷地宣傳：希望自由的心情是人的天性，所以“自由化”總有一天必定到來。這是胡說八道。其實他們提倡的“自由化”，就是人剝削人的自由。工人階級中間如果有人具有這種願意受人剝削的天性，那麼這個人就是卑賤的傢伙。

原田：經濟改革的目的是在於：他們認為經濟未能發展的原因在於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統制經濟這一套制度，所以他們要放鬆經濟計劃和統制，採用市場經濟，讓各企業去自由競爭，通過自由競爭去發展經濟。一句話，就是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醫治困難重重的蘇聯經濟。我們在前面談的是圍繞着政權方面的問題。而這個“新經濟體制”，就是要通過蘇聯的資產階級政權在經濟基礎方面復辟資本主義。

足立：現在蘇聯採用的以引進所謂“利潤方式”為內容的“新經濟體制”，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蘇共中央全體

會議上決定的。而捷克斯洛伐克要比蘇聯早一年作出同樣的決定。

在這個問題上，各國雖然有各種差別，但是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剛才談到的，採用“利潤方式”和市場經濟，把過去由國家無償提供生產設備，現在則以繳納使用費的形式變成有償供給。另一方面，國家規定的生產計劃指標大幅度壓縮，而加強各個企業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國有化經濟或者社會主義的特徵，已經接連不斷地消失了。

原田：在這一點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搞得更徹底。例如自由價格制度已經大規模地採用了。各企業由於優劣不同，職工的工資待遇差別也產生了。

足立：談到這個問題，我認為“按勞分配”這一社會主義法則已經崩潰了。過去上級向各企業指定的最重要的指標是生產量。因此簡單地說，就是根據生產量來實行“按勞分配”。但是“新經濟體制”卻把這個基準改變了，用營業額代替了生產量。因此，具備同一條件的人進行同一的勞動，但產品暢銷的企業的工人收入，要比產品滯銷的企業的工人多。

佐久間：現在蘇聯的工資差別還有某種程度的限制，但今後工資差別必將越來越大。在實行“新經濟體制”以前，蘇聯在定工資時，作為一種義務，規定了八項指標。所有的企業在制訂工資計劃時，必須將工資總

額、工人人數、勞動生產率等全部報告上級監督機關並且要經過它批准才能實行。但是新制度實行後，企業只要工資總額得到批准就可以了。至於僱傭工人人數，則由各企業自行決定。這樣一來，在工資總額的範圍內，只要工人數減少，每個職工的工資份額就增多。前面說的工資差別上還存在的限制，是指工資等級表是由國家決定的，對實際上造成差別的獎金，分別大體規定了百分比。但是，這和他們提倡的“物質刺激”的原則又有矛盾，這樣總有一天會取消的。到那時工廠廠長就必然大搞企業的“合理化”措施，拚命向工人開刀，更多地把他們解僱。

現在剩下的唯一的工資總額的指標，實際上也是想取消的。不過因為把它一取消，國民收入的計劃就難以制訂了，所以不得已仍然保留。但蘇聯當局已公開說，今後各企業的工資總額指標是要取消的，到那時由各企業自行決定各自的工資總額。

新谷：我曾經向大學的教師提過問題：“實施新經濟體制後，會不會出現失業者？”那個教師回答說：“蘇聯政府和黨是會採取措施不使出現那些事情的，因此不必擔心。”我認為這句話是說反了。因為蘇聯的黨和政府已經採用了要引起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的方針。

足立：各個企業爲了提高利潤，而在推銷產品方面進行競爭，而且爲了降低生產成本，力求節省開支。爲

此，就必然會解僱勞動差的工人，並盡量減少用於職工福利和勞動保護方面的資金。這種對工人不利的做法是會採取的。這樣就會出現失業者。對於這個問題，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學家等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只要保證被解僱者從失業到再找到職業期間的生活就可以了。這個想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保險制度是一樣的。還有有的工廠產品暢銷，有的工廠產品滯銷，這就有企業倒閉的可能。

佐久間：還有各企業可以把利潤的一部份，在企業內部分配。究竟是怎麼分配的呢？實際上，絕大部份被技術人員和負責事務工作人員等企業管理人員分享了。雖然手頭上沒有具體的數字，但是根據一九六七年的利潤分配實際情況，百分之六十以上落入了企業內部極少數管理人員之手，剩下的才分給一部份工人。

技術人員、事務管理人員的獎金，過去一向是編入企業工資預算中的，這一次卻從工資預算中分離出來，而從利潤中領取。因此企業利潤如果不增加，他們除了基本工資外，一個戈比的獎金也拿不到，如果利潤大量增加，他們就可以拿到全部獎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培養企業管理人員具有“物質關心”思想，以便去拚命強迫工人為積累企業的利潤而賣命。

剩下來的一小部份獎金，並不是讓全體工人平均分配的，而是由企業管理人員用於表揚“優秀”的工人。這

和最近在美國、日本等企業中所採取的種種制度，可以說是完全一模一樣。

資本主義的“集體農莊市場”

原田：商業流通機構最近也在不斷地變化。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對某些“商品”已經實行自由價格制度，可以自由規定零售價格。對其他的“商品”規定上漲和下跌的幅度，讓它們在市場上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變動價格。蘇聯也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

還有，各企業在決定什麼商品生產多少時，已經開始由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合同來決定。例如紡織工廠，首先要舉辦樣品展覽，把本廠出產的各種紡織品展示出來，在那裏簽訂企業之間的交易合同，紡織廠就根據這些合同制訂生產計劃。因此，也就自然只努力生產利潤高的商品。

還有蘇聯集體農莊市場，由集體農莊將國家收購以後剩下來的農產品，和各個農戶在自留地上種植的收穫物，拿到這種市場來出售。這種市場最近日益發展。在這種市場上，買賣價格根據供求關係漲落。爲了不讓集體農莊市場的價格不適當地上漲，便在市場附近開設國營商店。但是，不管怎樣，國營商店出售的商品和自由市場上的商品質量完全兩樣，所以根本不起作用。以蘋

果爲例，在國營商店出售的，是小的，疤很多；在集體農莊市場出售的，大而新鮮，並且擦得很乾淨。到集體農莊市場一看，品種多，量豐富，並且可以隨意挑選，只是價格高。國營商店雖然價格低，但是常常有牌價而無貨，即使有貨，質不好，量也不多。有趣的是，集體農莊市場也可以討價還價，有時還搭送一點東西。

新谷：有的地方的集體農莊用飛機裝運農產品到市場上出售。

足立：集體農莊市場的投機風氣很盛，因此還有警察駐守。

原田：有一次我到集體農莊市場去調查各種產品價格。我剛拿出小筆記本和鉛筆，便衣警察就走上來質問我：“你爲什麼要調查這裏的情況？”我說：“是這麼回事，我和朋友們要開一個茶話會，想買一點價廉物美的東西，所以到這裏來看看。”他被我這番話對付過去了。

什麼人掌握着生產資料

佐久間：前面講到了利潤分配的問題。現在在“新經濟體制”下，一個企業可以用其利潤的一部份和出賣用不着的機器所得的錢，來購買該企業所需的機械。過去，這種設備投資全部是由國家控制的。國家認爲必要的機械設備，無償移交給企業，企業本身無權隨便處理

這個設備。現在，企業可以用它自己的收入隨意購置機械。這一來，企業自己購置的機械設備的所有權，當然就不屬於國家，而屬於企業“集體所有”。照這種情形發展下去，再過幾年，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就要消失，都變成“集體所有制”。這不是完全走和社會主義相反的道路嗎？再從企業內部的僱傭關係看，是不是集體所有制，也很難說了。

原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問題的核心是由誰來掌握生產資料。蘇聯現在自稱有兩種生產資料所有制。一種就是所謂“全民”所有制，另一種就是所謂集體所有制。工業方面一律屬於“全民”所有制，農業方面則分為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存在着兩種形態的所有制。

按照蘇聯過去的正式看法，一向認為集體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的形態落後，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集體所有制將逐漸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但是最近已經開始在說，集體農莊沒有必要向國營農場過渡。只要這兩者照舊擴大生產，規模越來越大，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最後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差別就會消失，從而到達共產主義社會。

佐久間：談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問題，我有一次在上法律課的時候，向教師提出這樣的問題：“說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同時發展下去，規模越來越大，最後它

們的差別將消失。到那時究竟是‘全民’所有制變成集體所有制呢？還是相反？或者兩者都不是，而產生另一種所有制形態呢？”那個教師訓斥我說：“不許你提那種別扭問題！”（笑聲）“你是個中國派，你提這個問題一定是含有某種意圖的。”（笑聲）

但是，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國營農場最近也和工業一樣，採用了“新經濟體制”。因此，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一樣，國營農場可以用它的一部份利潤和自行變賣不要的機械而得來的錢，隨意添置生產資料。也就是說，這實際上也是向集體所有制過渡。因此，蘇聯當局所說的這“兩者的差別將消失”，只能認為是一切所有制形態都過渡到集體所有制。

足立：一般地說，所謂“全民”所有本身在理論上就是奇怪的。因為，暫且假定我們現在承認蘇聯的理論，集體農莊的生產資料屬於參加該農莊的農戶集體所有，除此以外就不屬於任何人所有。可是國營農場和工業部門等國營事業的生產資料屬於“全民”所有，所以，集體農莊的農民也是所有者了。也就是說，今天的蘇聯是“全民”國家，國有就是“全民”所有。這樣說來，只有集體農莊的農民是雙重所有者。（笑聲）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師在被問及這個問題時也說：“確實有矛盾哩。”

騙人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

原田：蘇聯把國有部門即等於社會主義部門這個想法，擴大到荒謬的地步。在這個問題上，它有一套“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完全騙人的理論，把所謂新興國家的國有部門說成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部門。這個“理論”概括起來說就是：在蘇聯的援助下，阿聯、緬甸、阿爾及利亞、馬里這些國家，不是向資本主義而是直接向社會主義發展。因為究竟還不能說它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叫做“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這在過去是指印度，最近還把印尼和加納也算進去了。

在我們班上，這個問題受到了大家的批駁，老師因為無法說明，常常下不了台。可是，嚴重的是，勃列日涅夫到阿聯去，甚至發表了“阿聯在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的演說。蘇聯把這個“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說成是列寧的理論，就連政治經濟學的主任教師也無法為之辯解，只得說：“我不了解。”

這個“理論”並不是什麼列寧的理論，它恰恰忽視了最有決定意義的政權問題。把那些非但没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就連共產黨都沒有的國家，只因爲經濟的重要部門——從殖民主義者手裏沒收的部門實行了國有化，就說成是“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走向社會主義”，

問題實在嚴重。

還有，把宣佈共產黨為非法的國家、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納賽爾領導的阿聯，說成是“正在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笑聲）。赫魯曉夫還把“蘇聯英雄”的勳章送給納賽爾，這在蘇聯國內也不得人心。大家說，阿聯總統為什麼會是蘇聯英雄？（笑聲）

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和蘇聯對它的輕視

新谷：蘇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時，是一個經濟非常落後的國家。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建立了優越的制度，才發展成為今天這樣的大工業國。這正是社會主義所達到的偉大成就，因而才能隨時都有開水供應，蓋起便宜住宅，上醫院上學校都免費。但是，這些都只不過是社會主義給人民帶來的福利的很小一部份。像蘇聯現在的物質成果，只要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做出正確的努力，任何國家都是能够辦得到的。只就蘇聯在物質方面所達到的水平來說，除了軍事部門以外，實際上還趕不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如果以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消費物資的質和量作比較，蘇聯更是低得不在話下。可是，這十年來，蘇聯重視物的因素，輕視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思想的因素。忘掉了過去帶來偉大成就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精神。

在龐大機構中工作的人，如果思想變質了，將會怎麼樣呢？那個機構就會變成一個空殼，越是龐大，就越成為障礙。這樣，那個機構本身將土崩瓦解。由列寧和斯大林建立起來的、過去給蘇聯人民帶來幸福的制度，現在正在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從根基上加以破壞。

佐久間：聽柯西金的演說，篇篇都露骨地表現出非常低級下流的物質主義。他說：“我國的文化革命在很早以前就完成了。現在到了具體地腳踏實地建設共產主義的階段。（笑聲）以電影院為例，按人口平均計算，蘇聯的電影院每年都在迅速增加。蘇聯今天出版書籍的數量，居世界第一。”

但是，跑到電影院一看，所有放映的影片盡是間諜片、強盜片、武打喜劇片、醉鬼片和美國的西部片。在這種情況下，電影院越是增多，資產階級思想對人民羣衆的毒害越大。這就不是什麼接近共產主義了。出版物增加是好的，而問題在於出版些什麼東西，那些小說是些什麼內容。看看今天蘇聯的出版物，其內容實在不像話。

新谷：柯西金在談到“新經濟體制”的演說中，曾經這樣說：“有些人中傷我們，說我們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他們沒有看到今天蘇聯的權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

簡言之，他們竭力詭辯說，在無產階級的政權下，

不管怎麼吸收“利潤方式”，也不會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今天的蘇聯，早已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之下實行了“利潤方式”。這就只能是復辟資本主義，而不會是別的。

修正主義毀滅了社會主義

佐久間：特別是和朋友們談起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們都說：“社會主義國家還會侵略別人嗎？”我說：“現在如果還把蘇聯當作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去考慮問題，思想就會混亂。蘇聯現在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

我有這樣一個比方，把社會主義比做一架飛機。飛機的本質在於能飛。但是現在這架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不能起飛，只能擱在那裏。只從外表看問題的人，還說那是一架飛機。實際上這架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作為飛機的本質已經失去了。

一架飛機不飛行，放在野外任憑風吹雨打，機體自然要處處損壞。引擎壞了，已經不能飛的飛機的螺旋槳或翅膀沒人修理，因此，時間越久，必然損壞得越加厲害。不僅僅是自然地損壞下去，飛機越大，就越成為障礙，所以，許多人就來拆它的翅膀、螺旋槳。別人看到這架飛機，就會想：啊，飛機的殘骸放在野外沒有人管哪！

再過些時日之後，飛機殘骸便變成一堆爛鐵。以今天蘇聯的情形而論，如果比做不能起飛的飛機的話，它的機翼、機身已經嚴重地損毀了。也可以說，它已經成為棄置在野地上的一堆飛機殘骸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機翼和機身相當於經濟基礎。蘇聯已經大肆着手使社會主義基礎構造變質。所謂實行“新經濟體制”，等於再把飛機的螺旋槳全部拆掉。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因爲飛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了。引擎在這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等於社會主義的靈魂。爲什麼引擎會壞呢？那是因爲共產黨這個飛行員變壞了。

新谷：宮本修正主義，好比是給這架壞飛機抹機窗玻璃的清掃員。

足立：過去的蘇聯，不僅飛機是優秀的，駕駛員也是高手。但是後來換了糟糕的駕駛員，所以飛機不是撞到什麼，就是失事墜毀，最後飛機不能飛了。歸根到底，問題在於駕駛員。所以說，不管制度怎麼好，但是駕馭這個制度的人是起決定性的作用的。

新谷：歸根到底，是這個新駕駛員要讓那架飛機向哪個方向飛行。（笑聲）這裏的關鍵問題是，使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蘇聯和光榮的蘇聯共產黨變質到這種程度的現代修正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

佐久間：讓我再打一個比方。如果把馬克思列寧主

義比做一個人的身體，那末現代修正主義好比人體內發生的癌。修正主義這種癌，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人體內部發生，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人體就滅亡了。

對於從外部襲擊自己的敵人，立刻能夠發覺，但是對於在自己身體內部發生的、要把自己滅亡的敵人，却看不出。修正主義，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偽裝，出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營內部，所以很難識破它的真面目。

但是，不管怎樣痛苦、流血，如果不動手術切除人體內部發生的癌，就要危及人的生命。兩者的關係就是，或者消滅對方，或者被對方消滅。

足立：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和癌症採取什麼聯合行動。（笑聲）

八、東歐各國的印象和蘇聯侵略 捷克斯洛伐克

新谷：關於蘇聯的情況，我們暫時就談到這裏。下面想把話題移到東歐方面。去年八月，發生了以蘇軍爲首的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到今年，又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燒身自殺的人，等等。東歐是一般人所關心的地區。

只是，我們是作爲遊客到東歐各國去的，所以不像對蘇聯那樣，知道得不太詳細。不過，我們久居莫斯科，從那裏到東歐去看過，能够將兩者作個比較對照，這就可能和一般的到東歐旅行一次而得到的印象有些不同。

說到東歐各國，一言以蔽之，情況隨國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就來談一談到東歐各國去走了一趟後對各國的第一個印象也就是最初得到的印象，介紹一下各國都有些什麼特點。

保加利亞

新谷：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到保加利亞去看了一下。

談一談當時的印象，我感到保加利亞這個國家，是一個非常接近俄羅斯的國家。我說的非常接近，不是現在在東歐國家中，保加利亞在政治上同蘇聯保持着最緊密的關係的意思。首先，文字是俄文字母，詞彙也十分近於俄語，稍不注意，開始時會看不出保加利亞語和俄語的區別。起先，我以爲就是俄語，一看，總覺得有點怪，再仔細一看，才明白是保加利亞語。非常相像。錢也像，硬幣的形狀同蘇聯的戈比硬幣非常像。所以，你講俄語，保加利亞人也聽得懂。從蘇聯到了保加利亞，不怎麼有到了另一個國家的感覺，倒有點像到了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捷克斯洛伐克

原田：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過捷克斯洛伐克。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是斯拉夫民族，言語和俄語有不少地方相似。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人們也像我們在日本學英語一樣，在學校中要學俄語，所以許多人都懂俄語。但是我只要一開口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講俄語，他們馬上露出十分討厭的表情。

到布拉格時，當地人最初以爲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說話，也沒有人答理。他們知道我們是日本人後，就露出一副驚訝的表情，說：“日本人照理是說英語的，你爲

什麼要用俄語談話？”對俄國人的反感十分強烈。

捷克人民往往把蘇聯當作落後國家看待，另一方面，對西歐的嚮往和崇拜是根深蒂固的。他們說：“我國在戰前是屈指可數的工業國。可是，比起當時不相上下的德國來，今天我國還落後。”他們看到事實，感到焦急。他們還說：“我們是歐洲的一員。我們同俄國人不同。”這種意識比想像的還要強烈得多。

我們四個都沒有去過波蘭，聽去過波蘭的人說，那裏同蘇聯、東歐各國一樣，對美國、法國等的外國商品非常感興趣。據說，已經抓了四、五個偽造美鈔的集團。還據說，在那裏美元的黑市行情漲風無止境。

匈 牙 利

原田：我曾去過匈牙利。匈牙利在那些國家中，髮色稍微不同，被當作異己分子。那裏的民族，本來是亞洲血統。首都布達佩斯是一座古老的城市，風景非常美麗。在那裏，我們仍然被當作中國人。可是，和別處稍微不同，黑頭髮黑眼睛的人受歡迎。因此，就和捷克等國家不一樣，我們受到相當親切的接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笑聲）在生活、習慣方面，也感到有近乎亞洲的地方。

這裏的學校教育也教俄語，所以年輕人一般都懂俄

語，但是不願意用。這裏也同其他東歐各國一樣，使用英語和德語很普遍。特別是他們對德國的嚮往，超出我們的想像。強烈感到反蘇親德。

新谷：是啊，在東歐轉一圈，一般地感到，德國對這個地區的影響，比我們想像的要強烈得多。他們當然反對德國的侵略，但是對德國高度的文化和技術水平，確實羨慕。

佐久間：東歐國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法西斯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都進行了游擊戰一類的武裝鬥爭。其次，追溯這些國家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它們都經歷了非常複雜的過程。國境也是一會擴大一會縮小，分分合合，變化多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東歐各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先鋒隊的領導下，在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下，取得了獨立，也曾建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權而推進革命。這些國家過去都受過沙皇俄國的統治，後來又遭受納粹德國的侵略。因此，東歐人民具有非常強烈的保持民族獨立的要求。這一點可以說是東歐各國的普遍特徵。

東 德

佐久間：我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兩個暑假中，分別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去過。在那裏，仍然感

覺得到當地人強烈的反蘇情緒。這種感受可說是任何一個到東歐去的人都能體會得到的。像我們這些講俄語的旅行者，尤其能強烈地感到這一點。俄語一說出口，對方對你就不親切了，東柏林等地尤其厲害。

我在東柏林，住在大學的宿舍裏。我用俄語同住在同一房間的德國學生談話，可是他根本不理我。這個學生一句俄語也不講，全講英語。他只學了一年多的英語，而俄語因為義務教育，學了六年多。儘管如此，他還是講英語，不會講俄語。我問他這是為什麼？他說，在學校時雖然學俄語，但是沒有一個學生認真地學，先生也不認真地教，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了。因此真的不會講俄語。而英語和德語相近，加上拚命地學，所以會講。

我在東柏林問路的時候，德國人看到日本人迷了路，親切地把我帶到公共汽車站。亞洲人在那裏是很少見的。五、六個德國人陪着我，為不使我乘錯車，一直等到公共汽車來。在等公共汽車的人當中，有一個像是蘇聯軍人。我用俄語向他試探一下，他說是俄國人。我以為這下好了，遇到語言相通的人了，便同那個軍人談起來。但我突然發覺，陪我等公共汽車的德國人都走了，顯然是因為我同俄國人交談，他們心裏有反感而走的。

在公共汽車裏，我同那個蘇聯軍人談話時，周圍的乘客臉上都不高興。這個蘇聯軍人在德國已經駐了三年多，太太也去了，不住在兵營裏，而住在另外的地方。

我問他，你講德語不困難吧？他回答說：“不，我一句德語也沒有講過。”我問他，那是為什麼？他說：“俄語在德國是義務教育，用俄語可以講得通，所以我就全講俄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國軍隊有三十萬左右常駐在東德。老子是蘇聯人，把這裏給解放了——他們就是這樣一種情緒。所以，什麼都用俄語，也就引起了對俄語的反感，促使反蘇情緒更加強烈。

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聽到的一個笑話，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提出要建立海軍部。別人便問他：沒有海的國家為什麼要建立海軍部？他回答說：蘇聯不是也有文化部嗎？意思是說，蘇聯是一個落後國家，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國家，可是有文化部。所以，沒有海的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海軍部有什麼不可以？

足立：培養這種感情是不好的。但是，從這個笑話裏，反映出捷克斯洛伐克人一種自負的情緒，那就是在革命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資本主義比較發達，是西歐，而不是東歐，文化也發達。而且，這個笑話還包含着對於忘光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蘇聯的批判。蘇聯的資產階級大國主義的做法，越來越刺激這些小國的民族感情。類似這種反蘇情緒，實際上不僅存在於東歐各國，在蘇聯國內也有。蘇聯國內住着各種民族，有各種共和國，所以與其叫做反蘇，不如叫做反俄羅斯人的情緒更正確

些。

南 斯 拉 夫

原田：我也曾到過南斯拉夫，它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也和保加利亞一樣，語言非常接近俄語，文字則不相同。這裏和東歐各國一樣，聽說我在莫斯科學習，感到非常奇怪。他們說，你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爲什麼要特意到蘇聯那樣的地方去學習？蘇聯有什麼值得學習的？

有這樣一個笑話：有一天，美國總統約翰遜和蘇聯總理柯西金，加上東歐各國首腦，坐車出去遊玩。當汽車走到一個岔道口時，司機問約翰遜，向左開還是向右開。約翰遜命令說：“當然往右開！”司機留下一個往右拐的標記，便駕車向右邊走了。接着柯西金的汽車來到岔道口。柯西金命令向左拐，司機便留下一個向左拐的標記，開車向左走了。最後，東歐各國首腦乘的汽車來到了岔道口。汽車司機問他們往哪個方向開？東歐各國首腦經過短暫的協商後，給司機下了一道命令：立一個向左拐的標記，向右拐！他們便去追趕約翰遜了。（笑聲）

這個笑話是說：東歐各國首腦表面上是投靠蘇聯的，心裏却完全向着西方。

羅馬尼亞

佐久間：我雖沒有到過羅馬尼亞，但想談一談蘇聯對羅馬尼亞的看法。我曾兩次到過原屬於羅馬尼亞版圖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蘇聯一個加盟共和國的摩爾達維亞。特別是去年（一九六八年）年初，我在那裏呆了四個月左右。摩爾達維亞的語言同羅馬尼亞的語言完全一樣，只是摩爾達維亞在合併到蘇聯後改用俄國文字。羅馬尼亞用的是拉丁文字。文字雖然不同，發音却是完全相同的。

我到摩爾達維亞的首都基什尼奧夫後才知道，他們差不多都收聽羅馬尼亞的廣播。

蘇聯國內的民族問題

佐久間：摩爾達維亞原先屬於羅馬尼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合併到了蘇聯的版圖中。但是，摩爾達維亞的大學教育是用俄語進行的。所以，摩爾達維亞人感到不方便，想用自己祖國語言學習的心情是很強烈的。可是，基什尼奧夫大學也是全部都用俄語上課。只是到最近才用摩爾達維亞語對摩爾達維亞人上課，而且只限於蘇共黨史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門課程。這也不是容易得來

的。摩爾達維亞人想用摩爾達維亞語受教育，於是在學生中間掀起了簽名運動，徵集了大量的簽名，向蘇聯當局提出了這個要求。蘇聯當局進行鎮壓，把徵集簽名的首謀都抓進了監獄。我去年到基什尼奧夫時，聽說他們還在監獄裏。蘇聯當局的手法是，一面搞鎮壓，一面又答應他們的一部份要求。

因此，在摩爾達維亞等地，有着強烈的與其說是反蘇不如說是反俄羅斯的情緒。俄羅斯人同摩爾達維亞人打架，摩爾達維亞人揍了俄國人，這種事一下子就在摩爾達維亞人中間傳開了。有時候，他們還就這種事在各處牆壁上寫道：幹得好極了。

足立：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的與其說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如說是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而制訂的民族政策。在列寧、斯大林時代，曾經提出過正確的政策，可是現在，這種精神已經完全喪失了。因此，在全蘇聯，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已經有了裂紋。這裏包含着同蘇聯與東歐國家之間發生的種種問題一樣的問題。

新谷：蘇聯和東歐的關係裏，包含着俄羅斯民族和東歐各民族的關係這樣一個民族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紅軍摧毀了德國法西斯，相繼解放了東歐國家。那時蘇聯紅軍的軍旗上寫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把它改寫為“爲了我們的蘇維埃祖國！”。這是非常具有象徵性的，表明了蘇

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怎樣變了的。

蘇聯作為解放東歐的戰勝者，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執行的東歐政策，儘管在斯大林時代就有許多問題，但性質還是進步的，這是主要方面。然而到了現代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上台後，蘇聯就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拋到了九霄雲外，成為資產階級大國主義。這樣，蘇聯就以解放者自居，君臨東歐各國之上，在什麼事情上都推行優先考慮蘇聯一國利益的各種政策，因而使東歐各國自上到下，反蘇情緒普遍地強烈起來了。

足立：同樣的問題在蘇聯國內也存在。例如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合併到蘇聯，成為蘇聯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的。到過這三個加盟共和國旅行的人，和當地青年人一談起來就會了解，他們對俄羅斯人的蠻不講理和只顧自己利益的粗暴作風具有非常強烈的反感。對於強迫他們把學俄語當作一種義務，反抗也是強烈的。包括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在內，處於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各國的人們，認為位於他們西邊的德國是文化高的地區，而東邊的俄羅斯是野蠻的文化低的地方。在高加索，反俄羅斯的情緒同樣也是根深蒂固的。

同反社會主義聯結在一起的反蘇情緒

原田：東歐的人們認為，自己是歐洲人，俄國人

屬於歐洲的範疇。自己作為歐洲人，有傳統，文化也高一——這種自尊心或自負的情緒，非常強烈。捷克斯洛伐克等國更是如此。但是，在軍事方面，在實力方面，這些國家到底是趕不上蘇聯的，所以總是處在蘇聯的實力政策下，感到很别扭。

由於這樣一種氣氛，所以像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竟敢對抗蘇聯，實行捍衛本國利益的政策，在人民中非常得人心。

出現在東歐各國的反蘇情緒，常常和反社會主義情緒聯結在一起。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把今天的政治、經濟制度強加給他們的人和被強加的制度，都有反感。這裏就存在着東歐各國的悲劇：反對今天蘇聯的資產階級大國主義，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是聯結在一起的。

佐久間：赫魯曉夫掌權以後，立即強迫東歐國家推行“批判斯大林”運動。過去這些國家都有巨大的斯大林塑像，對斯大林崇拜得很。可是蘇聯一發生政變，這些國家黨的領導就向蘇聯新領導的方針看齊，採取同過去的路綫一百八十度轉彎的路綫。從此以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正站在革命運動的前列來工作，而是成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在他們本國的代理人或代言人。這種行徑，就不能獲得人民的真正信任。因此，這些國家的領導一失去人民的支持，就

靠蘇聯強制的力量來幹事了。不是採取符合國內實際、依靠羣衆的鬥爭的政策，而是爲了推行蘇聯大國主義強加的政策，當然也就不能不越來越強化官僚主義，行使實力硬幹。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前總統諾沃提尼，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完全不爲人民所信任。還有東德的烏布利希，從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過一點名聲，今天在東德國內不僅完全不受尊敬，也完全不被信任。連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的領導人在背地裏也說：“烏布利希，狗屁不如。”這是一位久居東柏林的朋友告訴我的。那麼，烏布利希今天爲什麼還會呆在領導地位上呢？無非是因爲有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大國主義的實力政策作他的強大後盾。羣衆的批判當然是針對國內那些傀儡一般的黨的官僚和他們的後台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

因此，人民對於這些叫做共產黨、掛着社會主義招牌、說話不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傢伙的不滿和批判，其實是對於既不是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又不是真正共產主義的不倫不類的東西的不滿和批判。但是，又很難走上追求什麼是“真”的方向。這首先是因爲，在這些國家，掌權的是假共產主義者，他們不斷地宣傳這就是社會主義，這就是共產主義。

西方的思想、文化乘機而入

佐久間：結果便是對於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反感，而把眼睛轉向了西方。美國和西德等帝國主義者就乘機而入，放手進行反宣傳。在這些方面，不僅是通過宣傳、廣播，還通過文件、電影等，西方的影響無孔不入地滲透進來。帝國主義自由自在地進行文化侵略，一步一步地建立了它們的地盤。

足立：歸根到底，赫魯曉夫搞的“批判斯大林”，為這些東西開放了門戶。在這些國家，出現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社會主義國家上層建築的變質，羣衆感情背離社會主義等情況，可以說比蘇聯還早。在這裏，政局不穩。背離了民心的政權，只是在蘇聯的強制力量的支持下，才得以勉強存在。在這裏帝國主義世界的風俗、習慣和嗜好比蘇聯早好幾年就流行開了，例如爵士樂、硬殼蟲、短裙、搖擺舞等。

沒有權威的東歐各國共產黨

新谷：把東歐各國和蘇聯在各方面作一比較，很有意思。如以黨的問題來說，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在人民羣衆中究竟有多大影響，得到多大的支持？

蘇聯的情況是，一般地說共產黨還有很大的權威，還幾乎不可能公開地批評它。人民羣衆不是不公開批評它，而是害怕它，要躲避它。

在大部份東歐國家，共產黨的權威一落千丈。比如聽到一個長期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學生說，他曾同一個捷克學生談話，在談了許多之後，那個捷克學生小聲地告訴他：“不瞞你說，我是捷共黨員”。他說這話好像怕被別人聽見。爲什麼不能大聲地說是捷共黨員，因爲一旦被人們知道，就會被人們擯棄。這便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是執政黨的黨員，却覺得無臉見人，在社會上很拘束。

這在蘇聯是很不同的。例如蘇聯的學生黨員就非常傲慢地公開說：“老子是共產黨員，同那些共青團的小子不同，比他們更高一級。”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並沒有在本國人民羣衆中間深深扎根。給人的感覺是，它們類似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和民主社會黨，沒有在一般人民羣衆中間扎根，所以只是一些政客們在那裏搞政治。

比蘇聯早一步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東歐

原田：在匈牙利，尤其是在青年中間，嚮往西歐的情緒非常強烈。在這一點上要比蘇聯嚴重得多。在匈牙利，稍微離開首都布達佩斯到農村一看，是一片廣漠的荒

地，也沒有自來水。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大得驚人。就是在城市裏，中心地區和其他地方也有很大差距，貧富的差距也很懸殊。人民羣衆對政治漠不關心，光想着自己發財。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萊德，在市中心排列着豪華驚人的大廈，而小胡同裏却是貧民窟。貧富之差比別的東歐國家更厲害。乞丐很多。

佐久問：在東歐各國，同蘇聯比較起來，共產黨的權威低。還有這樣一個類似的例子。我到斯洛伐克接近蘇聯國境的城鎮科希策時，有一個聰明認真的學生給我們做嚮導。當來到一所好像早先是貴族住宅的豪華建築物前面時，他說：“你知道這個建築物是幹什麼的嗎？”他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說：“這個建築物裏面，住着騎在我們捷克斯洛伐克青年頭上作威作福的傢伙。”你猜他說的是什麼，原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科希策市委員會。這是一個典型事例，它反映了人民對於黨和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領導幹部的感情，這些人在犧牲人民利益的基礎上稱王稱霸。

從蘇聯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離國境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有個城鎮叫切爾納，蘇捷首腦會談就是在這裏舉行的。這雖然是一個邊界上的小城鎮，但是到這裏便嚇了一跳：有五顏六色的霓虹燈等等，未免太資本主義化了。在布拉格街上走一走，就會懷疑“我們莫不是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男青年差不多都留着長髮，是英

國硬殼蟲型的，商店的櫥窗裏擺着奢侈品，還展出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只穿小得幾乎等於赤身裸體的游泳衣的女人照片。

我在莫斯科聽一個在日本某政府機關工作的旅行者說，他到過貝爾格萊德。一出貝爾格萊德車站，突然圍上幾個年輕的傢伙，說要幫他拿行李，帶他到旅館去。到了旅館，把行李放在走廊裏，進房間去呆了兩三分鐘。出來一看，行李全沒了，只剩下手上拎着的旅行手提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和東歐各國的關係

足立：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打敗了納粹德國，解放了東歐國家，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南斯拉夫變了，但是其他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保持着非常牢固的團結。

但是，這個狀態，沒有長期保持下去。到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搞批判斯大林以後，東歐國家過去所保持的團結開始出現了分裂。赫魯曉夫對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人，施加了非常大的壓力，強迫他們接受蘇共二十大決定的修正主義路線，並且讓他們把過去豎立在東歐各國的斯大林巨像

拆掉。對於拒不接受二十大路線的阿爾巴尼亞，赫魯曉夫就實行斷絕外交和經濟封鎖。

可是，這次赫魯曉夫下台了，勃列日涅夫出來了，他領導了蘇共二十三大。

我們聽說，在這個大會上，流傳着要恢復斯大林的名譽。東歐各國首腦聽到這個謠傳後，便向勃列日涅夫哭訴說：你不要恢復斯大林的名譽，你那樣做，我們就不能跟你走了，如果這樣一搞，又要引起嚴重的混亂。因此，最後在二十三大大上連斯大林的“斯”字也沒有出現。

在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朝着正確方向走的，而在具體作法上，如在民族政策等方面，粗暴地、不走羣衆路線地強加於人，也相當多。到了赫魯曉夫時代，在路線方面完全錯了，陷進了修正主義，開始搞資本主義復辟。這樣，蘇聯就全面地加強了資產階級大國主義的強加於人，從此以後，東歐國家急速地變為蘇聯的殖民地式的附庸國家。蘇聯在軍事機構方面，控制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機構方面，控制了經互會（註一），把東歐各國完全捆住了。

蘇聯實力政策的失敗

足立：經互會是按照所謂“國際分工論”，叫各國按

分工進行專業生產。這樣一來，東歐各國的工業結構出現了偏頗的現象，從而在經濟上不得不嚴重地依賴蘇聯。特別是那些被規定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就更不合算了。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相比較，一向就是落後的。蘇聯當局用它的質量粗劣、但售價昂貴的工業品，換取這些國家的低價農產品。東歐各國的農業生產率很低，而生產成本則很高。東歐國家每年被蘇聯這樣殘酷榨取，對於本國的經濟發展極端不利。在這種情況下，東歐國家想充分動員本國的潛力，發展本國的工業，建立平衡的工業結構，是理所當然的。

羅馬尼亞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惡化，是因為羅馬尼亞開發多瑙河流域時，蘇聯方面強行介入並想從中撈一把。這引起了羅馬尼亞從民族利益和經濟利益方面進行的反抗。這樣，蘇羅關係便發展到了今天這樣的情況。

在東歐國家中，凡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為了保衛本國民族利益作出反抗蘇聯姿態的領導人，都很得人心。歸根結蒂，雖然戰後經過了二十年，蘇聯仍未能抓住東歐各國人民的心。它只是憑暴力進行壓迫。

佐久間：有這樣一個小故事：有一天，天氣很晴朗，諾沃提尼打着雨傘在布拉格的街上走。有人問他，你為什麼要這樣？他回答說，因為現在莫斯科正下着雨。這類小故事，在羣衆中廣為流傳。到其他東歐各國去旅行，便可以發現故事的主角，由諾沃提尼變為烏布利希、卡

達爾或哥穆爾卡了。這清楚地表明了：一，諾沃提尼等東歐各國的領導人完全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他們被認為是蘇聯的傀儡；二，對後台老板蘇聯有反感。

倒向西方的東歐各國——旨在賺取 美元的遊覽事業

新谷：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到莫斯科留學時，還沒有發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我當時嚮往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而且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大概可以自由往來。但是，實際上到蘇聯一看，並非如此。

我一到莫斯科，立即發現中蘇關係已經很冷淡。當時，在《真理報》上幾乎看不到有關中國的消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到中國以及其他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去，已經很困難。同時，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到東歐去也已經很困難。

我想到東歐去，便到這些國家的駐莫斯科大使館去辦手續。這些使館非常官僚主義，態度十分冷淡。例如，到波蘭大使館去，對方突然問：“你有多少美元？”我回答說：沒有。於是又問：“馬克和法郎也沒有嗎？”我回答說：

“馬克和法郎也沒有。我是到在華沙的朋友那裏去玩。我到了那裏，我的朋友會照顧我的。”對方又說：“那我們要調查一下你所說的那個人，是否真的在華沙。如果在，

我們還要調查一下他是否有能力負擔你在波蘭逗留期間的費用。等調查清楚以後你再來。”從這以後，過了一個月，又過了一年，他們對我總是一句話：“國內還沒有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說，我有的是美元，那麼，就會當場給你發簽證。做法機械得實在叫人吃驚。

東歐各國比蘇聯更早地由政府出面大力地收買和搜羅美元。所以夏季到布拉格去的美國遊客一大堆，亂哄哄的。捷克政府爲了讓這些美國遊客多花一些美元，設立了很多出售男女用品的美元商店。

比東歐各國遲兩三年，在蘇聯也由政府出面開始拚命地搜羅美元。在莫斯科也設立了很多美元商店。這種商店裏，陳列着大量的在莫斯科的一般商店買不到的質量高的商品，價格十分低廉。但是，如果不用美元或西歐各國的貨幣，是買不到這些商品的。蘇聯人只能看一看。這樣一來，便出現了利用外國人進行大規模的投機買賣。例如在莫斯科，到一家最大的國營百貨商店去買東西，如果你拿外匯買，便把用盧布標明的定價減半，再折成外匯價格。

在美元商店經常看到陳列着日本生產的半導體收音機、照像機以及西方的香烟和酒類。蘇聯大概用木材換回日本的半導體收音機、照像機以及西方的商品，再把這些商品銷售出去，撈取美元。不管怎樣，美元商店是不能陳列木材出售的。（笑聲）就是這樣，蘇聯政府最

近爲了撈取美元，付出了簡直要叫人感動的努力。無論是東歐或蘇聯，都由政府帶頭，拚命地撈取西方貨幣，並用它來購買西方商品。這樣一來，人們要面向西方，是自然的發展趨勢。

原田：在捷克斯洛伐克，按照法定兌換率，一美元換十四克朗。但是，還有一種旅行者的兌換率，一美元換十八克朗，外交官的兌換率，一美元換二十八克朗。此外，還有黑市的兌換率，一美元換三十三到三十五克朗。我們到了布拉格的火車站，一個年青人走過來問：“你是旅行者吧？有沒有美元？兌換吧！”

佐久間：在布拉格街道上，可以看到大批從奧地利開來的遊覽大轎車。在那兒，我遇到了一個日本人，他說，他在維也納聽說辦理捷克斯洛伐克的入境手續很簡單，所以就想試試看，於是到了這裏。只要有外匯，不管是什麼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熱烈歡迎。

其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的邊境附近有個城市，叫做卡羅維發利。兩年前曾在這裏舉行過歐洲共產黨會議。這裏，從中世紀以來，就一直是歐洲屈指可數的溫泉城。這裏的外國汽車擠得水泄不通。街上到處都是美國人、西德人、法國人。這裏最大的一家旅館的宇號，叫做“莫斯科飯店”。（笑聲）

新谷：在東歐各國中，在政治上與蘇聯關係最親密的是保加利亞。在保加利亞的街上行走，令人吃驚的

是，有懸掛着“殼牌公司”招牌的加油站，掛着那個無人不知曉的貝殼標誌。國際石油壟斷資本的殼牌公司已經在保加利亞登陸了。

原田：在布拉格的銀座——瓦茨拉夫大街的盡頭，可以看到東洋人造絲公司的霓虹燈。每年夏天，在布爾諾舉行摩托車比賽。我一到那裏，一些年青人知道我是日本人，便走過來，大談什麼“本田”牌、“鈴木”牌、“山葉”牌等，表現出他們對日本的摩托車的情況很熟。

新谷：在布拉格市內跑的有軌電車，簡直像上個世紀的遺物，四四方方的，連門都沒有，很破舊。說風流倒是風流的。但是，莫斯科市內，跑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製造的有軌電車，坐起來很舒服，走起來不震動。這使人感到，蘇聯讓捷克斯洛伐克生產好車輛，然後又據為己有。

足立：像東德或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工業水平高的國家，在經互會中是出超的。它們手頭都有盧布。但是，盧布再多也沒有用。拿盧布買不到什麼東西。想買的東西，只有西方有。想買西方的東西，但沒有外匯。所以，就引進西方遊客，開設美元商店。

來自西方的經濟侵略——引進外資

佐久間：但是，用這種辦法賺取外匯，是有限的。於是，便開始從西方引進外國資本。例如，在波蘭建設

了福特工廠。我記得那是西德的福特工廠。最近，意大利的非亞特汽車公司在莫斯科建廠。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到處都有“可口可樂”。

在經濟系開了一門“國際經濟”課。在課堂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同是一個德國，西德獲得了發展，而東德發展很遲緩，這是為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西德沒有因為戰爭而遭到破壞，而東德遭到了徹底的破壞。也就是說美帝國主義非常狡猾，在戰爭末期，只對東德進行了全面空襲。此外，蘇聯的副教授還有自己的說法：戰後，美國對西德大量投資發展生產，所以西德發展速度驚人。

而東德却相反，當地的一些工廠設備都被蘇聯當成戰爭賠償而掠走了。一方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大量投資；而另一方是蘇聯取走機械設備，因此，不產生差距倒是怪事。這個教師自己是這麼說的。蘇聯總說自己的照像機和手錶好，很驕傲，豈不知這些東西都是用戰後從德國運來的機器製造的，而且這以後並沒有進步和發展，全都成了過時的東西。

新谷：東歐國家之所以要把眼睛轉向西方，還有一個原因。戰後二十多年，東歐國家的生產設備早就該更新了。但是，蘇聯的機器產品，從技術水平來看，是根本不行的。而本國又沒有能力製造。因此，便想從西方國家進口最新式的機械設備。要進口，卻又沒有美元。西方國家便利用這個弱點，進行經濟滲透。

原田：捷克斯洛伐克在五十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是百分之九點四，六〇年起驟然下降。六三年更嚴重，竟然是負百分之零點六。所以，人民羣衆鬧事也是很自然的事。

足立：波蘭在革命勝利以後一步也沒有前進，仍停滯在原來的狀態。就拿文化這一個方面來看，波蘭攝製的一些影片即使原封不動拿到日本，通過資產階級演出公司放映，也會受到歡迎。因為影片充滿着資本主義的頹廢、墮落、虛無主義和絕望。再從農業方面來看，在那裏，單幹是主要形式，集體化根本沒有進展，而且也不想搞社會主義集體化。既然這樣，我認爲是不能叫做社會主義的。我甚至懷疑波蘭是否曾經有過社會主義的時代！

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的老前輩

佐久間：一般說來，南斯拉夫無論如何也是修正主義的老前輩。南斯拉夫幾年前幹的事，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模仿，捷克斯洛伐克現在幹的事，過幾年後蘇聯也會照樣幹。所以，有趣的是，只要仔細看一看南斯拉夫變化的過程，就可以了解東歐的其他一些修正主義國家和蘇聯很快也會和南斯拉夫一樣發生變化。

南斯拉夫瀕臨亞德里亞海，是一個風光秀麗的地方。一到夏天便有許多西方遊客。住在海邊的人家爲西

方來避暑的遊客，來晒日光浴的人提供房屋。這在日本叫“民宿”。他們這樣幹一夏天，一年不勞動也可以生活。東歐的其他一些國家也想和南斯拉夫一樣，招徠大批西方旅客前來觀光遊覽，賺一些遊覽費過活。

原田：在捷克斯洛伐克，到近幾年前為止，還有反蘇和反政府的學生運動。“五一”勞動節夜晚，學生們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獨立運動發源地的廣場上，舉行示威游行。這在幾年前遭到禁止了。開初是提出反蘇口號，政府還允許，等到出現反政府口號以後，政府便下決心禁止這種游行了。這就是說，反諾沃提尼的空氣在青年中間廣泛地擴展了開來。被諾沃提尼政府下令禁止後，學生們便採取不合法的形式仍然繼續搞，市民中也有人支持。政府終於壓制不住而解除了禁令。這是兩三年前的事情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青年、 學生的示威游行

新谷：剛才談到的在勞動節之夜學生們舉行反政府游行的事，我到布拉格去的時候就聽說了。這是反蘇反共的游行，是反革命的反動游行。他們人人舉着標語牌在街上游行。馬路兩旁擠滿了許多觀眾，又是鼓掌又是照像。聽說他們還把街道兩旁的有色人種的外國人拉到

游行隊伍裏毆打。有一次一個黑人挨了打。恰巧他是來自古巴的黑人留學生。古巴方面馬上提出嚴重抗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低頭認罪。古巴方面還要求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這類事件，可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回答說很難保證。於是古巴政府把在捷克的留學生全部撤回國。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聽說在捷克斯洛伐克學校裏進行這樣的教育：我們的生活現在所以艱苦，是因為我們“援助”了各個新興的獨立國家。是那個所謂的“援助”啊！（笑聲）如果問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你們是怎麼想的？他們說，我們生活所以苦就是因為上述原因造成的。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人還有一種傳統的叫作“歐洲中心主義”的情緒，覺得自己是歐洲人而高人一等。這些事加在一塊，就發生了毆打黑人的事件。所以，聽說在布拉格的亞非拉各國留學生走路時都帶一把護身用的小刀。

原田：我在布拉格街上走，就有人把我當成是“中國人”，用英語罵我。有一次在總統府前面，有一個青年人特地把小汽車開到我跟前停下來謾罵。我氣憤極了，就用俄語叱責了他一頓，他才溜走了。他們認為中國人好戰，要破壞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生活。

新谷：這件事是說明東歐各國怎樣對青年進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教育的一個好例子。

足立：齊奧塞斯庫領導的羅馬尼亞，在東歐各國中

採取特殊的外交政策。

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各國不同的是，不搞反華運動而跟蘇聯對抗。除阿爾巴尼亞以外的東歐各國，都在蘇聯的授意下放開嗓門參加了反華大合唱。在羅馬尼亞的廣播和報紙上，直到今天也閉口不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羅馬尼亞爲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大國主義外交政策而進行的勇敢鬥爭，在國際上常常起到好的作用。

宮本修正主義一伙打着“獨立自主”的招牌。但是只要是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上，就不可能有“獨立自主”就是國際主義路線這樣的怪事。如果認爲：只有一個黨打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黨的招牌，那麼這個黨走向哪裏，就可以由這個黨自己決定，這就必然導致真正的戰鬥團結的瓦解。只是看表面招牌，而不去研究其內容和路線，那麼即使想團結，這樣的團結也絕不會實現，即使實現了，也必定是假團結。

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獨立自主”路線

原因：今天，構成宮本一伙判斷事物的最高標準，就是對下次議會選舉是有利還是沒有利。“獨立自主”的理論也是由此產生的。

如果說“獨立自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話，那麼在這次捷克問題上就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們不了解外國發生的事情。各個國家想要做什麼，可以任意去做。因此我們不去評論那些對日本無直接影響的事。”這樣不就行了嗎？宮本一伙的下級黨員中也就有這種人，他們對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困惑不解，他們說：“不要去管在外國發生的事情吧！”

在這次“捷克事件”發生前不久，宮本一伙採取鼓勵捷克斯洛伐克搞“自由化”的態度。它在打給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義領導的電報中說：“你們要怎麼幹，聽便吧！”可是當蘇軍果真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反對蘇軍侵捷的輿論越來越強烈的時候，他們便慌慌張張地出來辯解，既像是“批評”捷克領導，又像是開始“干涉內政”了。

他們所以要進行辯解，歸根到底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期望這次事件不要給下次選舉帶來不良影響。因此，他們不是真正站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的。比如說，對於去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捷克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再生運動”的所謂“自由化”運動，宮本一伙不去觸及這個事件的本質，即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問題。以後，當蘇聯進行武裝侵略時，他們又迴避這是因為蘇聯已經墮落成爲社會帝國主義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也迴避了蘇聯現在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還有，宮本一伙過去一直主張的要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結成統一戰綫、採取聯合行動的論調是否正確的問題。而現在，他們甚至對這個他們認為是最最重要的問題也佯裝若無其事。

新谷：宮本修正主義還有這樣一個慣伎，當發生某個問題的時候，他們就發表冗長的文章，講一通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的話來掩人耳目。（笑聲）到了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宮本一伙就更不知所云了。但是宮本一伙的基本觀點是：既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個“再生運動”是批判斯大林的捷克斯洛伐克版，是“獨立自主”傾向的發展，因而基本上是支持的。但又把蘇聯看作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隨之也就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國家還進行侵略嗎？這一點是宮本修正主義無法擺脫的一個矛盾。（笑聲）

足立：如果以為只要堅持“獨立自主”，不論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什麼，因為它對日本革命沒有直接影響，所以也就可以不管了，那麼，就可以不要什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了，只要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就夠了。蘇聯也好，捷克斯洛伐克也好，它們的方向和南斯拉夫是一致的。可是宮本修正主義說，南斯拉夫是敵人，而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朋友。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是“莫斯科宣言”（註二）和“莫斯科聲明”（註三）所公認的。

“宣言”和“聲明”都是妥協的產物，其中既有正確的

提法，又有錯誤的提法。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黨遵守“宣言”和“聲明”，就連宮本一伙也沒有遵守。宮本一伙只列舉“聲明”和“宣言”中對自己有用的一些提法，把它叫做“革命原則”，並且說什麼要根據這些“原則”團結起來。如果這樣的話，蘇聯豈不是也可以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部份而稱之為“革命原則”了嗎？宮本一伙搬出就連他們自己也沒有全面遵守的“宣言”和“聲明”，來顯小自己立場的正確，只能說是滑稽可笑而已。

宮本一伙的特徵之一，就是常常只看形式而輕視內容。所以，他們不去具體地分析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現實情況，就想憑一張破紙到處修修補補來解決問題。宮本一伙也是現代教條主義的典型。

新谷：現代修正主義已經篡奪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改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是當代共產主義運動所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全面地正確地解答了這個問題的，是毛澤東主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然而，宮本修正主義在這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中，拋出了“獨立自主”路線。如果是這樣，那麼蘇聯五十年來，一貫是獨立自主地幹的，儘管如此還是變修了。只舉這樣一件事便可證明，“獨立自主”路線絕對克服不了現代修正主義。

宮本一伙大肆玩弄形式邏輯，企圖說明自己立場的正確。但是仔細一看，宮本一伙的形式邏輯，全是實用

主義的東西。如果要遵守“宣言”和“聲明”的話，就應當貫徹始終才對。可是却不如此。比如說對待中國，只因爲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說什麼中國共產黨現在連黨也不是了、國家也崩潰了，我們不能同它打交道了。可是中國共產黨不也是“宣言”和“聲明”所公認的嗎？這麼一提，他們就啞口無言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人民自己主動進行的。所以，我想，他們會對這場革命說：請隨便吧！其實不然，他們還是像瘋狗一樣狂吠不止。這樣，宮本一伙的所謂“理論”完全是支離破碎的，破綻百出，無法彌合，瀕於破產。

宮本一伙墮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只因爲他們喪失了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的態度，先是死死抱住現成的公式不放，然後就玩弄形式邏輯，是他們採取了這樣一種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不相容的作風的結果。在今天的世界上，自稱爲“共產黨”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多得很。他們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實的、真牌的，只有進行具體的調查才能搞清楚。哪一本書上也沒有寫着誰是真牌的誰是冒牌的。

比方說，蘇聯老早就正式地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開始復辟剝削制度，侵略和壓迫別的民族。但是，只是因爲名字還叫做“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宮本一伙就強詞奪理地詭辯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比方說，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它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爲行動指南，而

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想法，“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具體解釋，它適用於落後的俄國，而不適用於今天發達的捷克斯洛伐克。列寧主義的本質，歸根結蒂就是斯大林主義，世人都承認它如何地壞。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只存在於深遠的人道主義之中，我們現在必須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可是宮本一伙還把這個根本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看作兄弟黨。爲什麼呢？因爲這是“宣言”和“聲明”所規定了的。（笑聲）現在，我們來談談去年八月二十日發生的以蘇軍爲首的華沙條約組織五國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侵略的問題。

從諾沃提尼到杜布切克——捷克斯洛伐克 “自由化”的發展和蘇聯等五國軍隊的侵略

佐久間：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在談到蘇聯武裝侵略之前，要從去年一月以來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各個事件中去研究。談到去年一月到八月發生的各個事件，其初期是，杜布切克爲了上台執政而表演的醜劇。這個時期，蘇聯是支持杜布切克的活動的。到了後半期，杜布切克所點燃起來的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活動，已經升級到超出了杜布切克和蘇聯所設想的範圍。

正像已經談到的那樣，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對諾

沃提尼所採取的向蘇聯一邊倒政策的反感、對捷克斯洛伐克黨和政府的官僚主義、腐敗、墮落的批評，以及反對在這些東西背後的蘇聯資產階級大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各項政策的空氣，長年累月地聚積起來了。特別是諾沃提尼的不得人心，已經達到了不可挽救的程度。

在這個時候爬上來的杜布切克，巧妙地煽動人民羣衆中的不滿情緒，甚至利用諾沃提尼官僚體制下的貪污事件，以及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之間的矛盾，把諾沃提尼趕下了台。蘇聯因為很清楚地知道諾沃提尼不得人心，所以想拋棄諾沃提尼，而以杜布切克來換馬，便支持杜布切克奪權。諾沃提尼一旦被蘇聯拋棄，就完全喪失了力量，所以幾乎毫無抵抗地交出了政權。杜布切克一掌握政權，《真理報》馬上就用整整一版的篇幅詳細地登載他的經歷，歡迎他的上台。杜布切克上台後不久，就到莫斯科去朝聖了。

後半場戲便由這兒開演。杜布切克是利用國內反諾沃提尼、反蘇、反社會主義的空氣上台的。但是他上台後，這些空氣也就自然越來越得勢，遠遠地超過了杜布切克和蘇聯所設想的範圍而更大地膨脹起來。所謂“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綫，本來是蘇共二十大提出來的，對蘇聯來說應該是什麼問題的。但是推行“自由化”的結果，捷克斯洛伐克要從蘇聯的統治下跳出去，不按蘇聯的意旨行事，這就很難辦了，而且捷克斯洛伐

克又和西德問題聯系起來。由於這些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企圖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而剛要和西德恢復邦交的時候，蘇聯採取了突然出兵進行控制的舉動。

原由：去年年初，在華沙和布拉格，學生運動幾乎同時高漲起來。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我們當時在莫斯科是這樣聽說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國青年委員會爲了支援越南人民，組織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指責政府。在這種形勢下，又開始揭發了在軍隊內部有人私吞和侵佔了支援越南人民的資金。被追查的軍人，攜帶軍事機密文件和八千萬美元，逃到美國去了。而且這些高級軍官都是諾沃提尼的嚮囉。杜布切克很巧妙地利用人民對這件事的批判的高漲情緒，把責任全部轉嫁給諾沃提尼，趕走了受諾沃提尼庇護的人，而建立起自己的領導權。

杜布切克是斯洛伐克人，後來移居蘇聯的吉爾吉斯共和國，在那裏度過了少年時代。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政治學院學習，當時的講師就是勃列日涅夫。看了他的經歷，蘇聯判斷他是親蘇派，而歡迎他上台。

杜布切克是作爲反對諾沃提尼過於向蘇聯一邊倒作法的勢力的頭目爬上去的。所以，杜布切克在國內如果不繼續打着“反蘇、反諾沃提尼”的旗號，便會失去人民的支持。以杜布切克推翻諾沃提尼爲誘因，捷克斯洛伐克國內要求改變歷來親東方的外交政策而親西方，拋棄形式上叫做社會主義的東西，大胆地推行資本主義復

辟，這樣的空氣突然高漲起來了。

西德的威脅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

新谷：驅使蘇聯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他們對西德軍國主義的恐怖心理，這種心理在俄國人以外的人看來，已經達到瘋狂的狀態。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捷克斯洛伐克搞所謂“自由化”，想要復辟資本主義。所以，蘇聯才出兵加以阻止。可是搞“自由化”的老祖宗就是蘇聯，即使“自由化”搞得稍稍過火一點，也不至於發動戰爭。如果說因為搞了“自由化”就出兵，那就應該出兵到南斯拉夫，但是並沒有這樣做。不但沒有出兵，反倒向南斯拉夫討好。

如果以搞了“自由化”為理由而出兵，那麼東歐各國也都在以各種形式搞“自由化”，蘇聯就得到處出兵了。只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同德國問題有關係，會影響蘇聯的安全，所以蘇聯才反對。因而並不是反對“自由化”本身，更談不到因此而出兵。僅就同西德恢復邦交的問題來說，也可以這樣說。東歐各國中最先和西德恢復邦交的就是蘇聯。如果說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想要和西德恢復邦交所以才出兵的話，那麼羅馬尼亞和西德恢復邦交時為什麼不出兵呢？所以只能說，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恢復邦交

將對蘇聯的安全產生直接影響，蘇聯是非常神經質的。

如果說因為捷克斯洛伐克要擺脫蘇聯的影響，不按蘇聯意圖行事，所以蘇聯才出兵的話，那為什麼不出兵到羅馬尼亞去呢？羅馬尼亞不但不照蘇聯旨意辦事，而且一有事就和蘇聯頂牛。

所以，在看這次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時，不看它同德國問題的關係，便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蘇聯的行動。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的與西德和蘇聯都接壤的國家，所以對蘇聯來說，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接近的話，蘇聯就會直接感到西德的威脅。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是位於羅馬尼亞這樣的地方，那麼問題就會和現在大不相同了。

據報道，發生這次侵略事件時，蘇軍侵捷先頭部隊首先開進捷克斯洛伐克與西德的接壤地區。當布拉格市民問那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聯士兵“你們到這兒來幹什麼？”的時候，他們回答說：“因為西德要侵略，所以我們要來保護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德國侵略。”聽到這些話，我們便可以明白，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考慮的是德國問題，並利用德國問題來給侵略行為尋找正當的理由，騙取了蘇聯人民的支持。在今天的蘇聯國內，只要把西德的威脅作為藉口，無論做什麼都可以說服人們。

展望未來，蘇聯決不會主動從捷克斯洛伐克撤兵而

將繼續賴在那兒。這是因爲：首先，這次蘇聯侵捷刺激了西德，西德和西方今後將更加增強軍事力量，因而蘇聯越來越不會後退了。其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駐軍便可經常干涉捷克內政。因此，我想蘇聯今後一定會把蘇軍長期駐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

作爲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佐久間：蘇聯害怕德國軍國主義，這是鐵的事實。但它還有另一個側面，即蘇聯作爲社會帝國主義，它要東歐各國向它臣服。

我們可以把這一情況同美帝國主義的情況做一比較。美帝國主義是真的害怕中國。但是，美帝國主義以此爲藉口，組織了反華軍事包圍圈，在中國周圍的一些國家設置了大量的軍事基地，並且駐紮軍隊，奴役這些國家，並使它們變成殖民地。我認爲，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現在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東歐各國所幹的勾當，和美帝國主義在亞洲所幹的勾當是如出一轍的。這就是說，蘇聯非常害怕西德，這是事實，但另一方面，以此爲藉口，企圖從軍事上、政治上控制東歐各國。

原田：中國或西德是否真的對美蘇兩國形成了軍事威脅呢？中國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決不會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侵略。西德則作爲帝國主義國家，不能說沒

有再度侵略東歐各國或蘇聯的可能性。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來看，西德單靠本國的力量是沒有能力侵略東歐或蘇聯的。它只有和美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才可能發動這種戰爭。事實上西德今天親納粹勢力的再起，其背後就是美帝國主義在撐腰。但是蘇聯却和美帝國主義打得火熱。

總之，事情是這樣的：對於蘇聯來說，所謂來自西德帝國主義的威脅，今天在客觀上並不存在。相反地，蘇聯本身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西德帝國主義的威脅作為藉口，對東歐國家進行侵略，把這些國家納入自己的殖民地範圍。

足立：最近西方資產階級報紙也在大事鼓吹美蘇進行競爭性的“和平共處”。這就是說，美帝、蘇修兩大國要平分世界，各在自己的勢力範圍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從蘇聯今天的戰略來看，蘇聯的本意就是要盡可能地保持歐洲的現狀，騰出手來全力“遏制”中國。而宮本顯治一伙充當了蘇聯的走狗。蘇聯在亞洲接二連三地提出新花樣來，在中國周圍形成一個包圍圈，企圖孤立中國。但是，在歐洲，沒有採取積極的措施去打開現狀。

特別是在德國問題上，力求與美帝國主義取得默契，共同維持現狀。可是和蘇聯的如意算盤相反，在東歐國家，新問題一個接一個地發生。這次蘇聯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與其說是指望在盡短的期間解決捷克斯洛伐

克問題，不如說，蘇聯非常焦急，企圖在問題表面化以前，就以力服人，以便盡可能早地把力量傾注東方。

與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阿爾巴尼亞人民

原田：一國青年的意識形態和心情，是展望這個國家的前途的重要標誌。

有個日本記者，到東歐的每一個國家走了一趟之後，回到莫斯科，和我談起對東歐國家的印象。他說，他訪問阿爾巴尼亞後獲得了兩點強烈的感受：一點是阿爾巴尼亞還很貧窮，特別是農村貧窮；另一點就是阿爾巴尼亞青年的剛毅頑強、朝氣蓬勃的精神，這是在其他國家所沒有看到的。他們在恩維爾·霍查的領導下，進行着艱巨的建設工作。他們說：“我們現在勞動，不只是爲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建設，也是爲了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由於阿爾巴尼亞拒絕蘇共二十大決定的現代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就壓迫她，甚至採取了斷絕邦交的措施。由於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接壤，所以也有可能遭到南斯拉夫的侵略。但是阿爾巴尼亞在這些艱苦的條件下，朝氣蓬勃地從事建設。

佐久間：我記得，阿爾巴尼亞工業原本是極其落後的，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似乎只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也不够發達。革命後過了十年，赫魯曉夫一下子把在

阿爾巴尼亞的蘇聯專家全部撤走。蘇聯的這種經濟壓迫，對阿爾巴尼亞的打擊是非常大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爲了把革命進行到底，經受了一切困難，不斷地進行了鬥爭。

足立：在東歐，現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只有阿爾巴尼亞。其他國家，雖然各自都有些微妙的不同，但是，都被現代修正主義者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並且已經陷於混亂狀態。

共產主義運動總是帶國際性的。真正堅持革命的共產黨，無論是中國或阿爾巴尼亞，必然同世界革命聯系起來提出它們的路綫。一個黨是否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是判斷它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標誌之一。這和宮本一伙打出的所謂“獨立自主”的旗子一比較，就立刻是非判然。南斯拉夫在很早以前就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的道路”這一形式，提出過“獨立自主”。這些國家的目前情況怎樣呢？在南斯拉夫，從去年起甚至不再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了。“五一”勞動節本來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勞動人民的節日。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一定會起來反對修正主義

新谷：現代修正主義給人民帶來了重重的苦難。因

此，各國人民正在起來鬥爭，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反革命罪行。雖然在蘇聯和東歐各國，人民的反修鬥爭現在還剛剛開始，但是可以相信，這些國家的人民必然日益覺醒，最後一定會贏得自身的解放。我們可以舉出這些國家人民起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例子。

原田：在反修的最初階段，任何一個國家首先總是由學生、青年和知識分子打先鋒。例如在莫斯科，有些知道我們是支持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按照毛澤東思想進行鬥爭的青年，他們來到我們身邊，解開自己的上衣，讓我們看到他們上衣裏面左側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上衣右側內袋裏面的《毛主席語錄》。然後，他們對我們翹起大拇指，意思是說：“真偉大！”像這種情形，我已遇着好多次了。

我到東歐國家去旅行時了解到，在東歐的大學生中，也到處有人組織毛澤東思想學習會。儘管他們的人數還不多。特別是在東歐國家留學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學生，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更是活躍。

佐久間：有消息說，在蘇聯國內，已經建立了一個名為斯大林小組的革命組織，這表明蘇聯人民內部已經開始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强有力的鬥爭！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到了列寧格勒，住在一所大學的宿舍裏，那裏的學生告訴我這樣一件事：

可能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列寧格勒大學的教授、副

教授、講師和大學研究生、學生等一百幾十人被蘇聯當局逮捕了。據說被捕者都是文科各系的師生。這些批評現在蘇共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路線的人越來越多地集結起來，雖然他們還未達到結社的階段，但已形成類似沙龍或小組那樣的集體。他們特別指責目前在農村、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上的路線是根本錯誤的。他們的活動，被秘密警察知道後，派人打入他們的集體，把他們全部逮捕了。這表明，蘇聯人民雖然處在那麼嚴厲的統治下，但是已經生氣勃勃地開始用行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路線了。

我們可以相信，蘇聯人民一定會站起來爭取自己的解放。

（註一）經互會是西方給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起的名稱。在蘇聯，簡稱為 SEV。這是一個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設立的東歐國家的國際性經濟組織。

（註二）指社會主義國家的黨代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參加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典禮時發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宣言》。

（註三）指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發表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